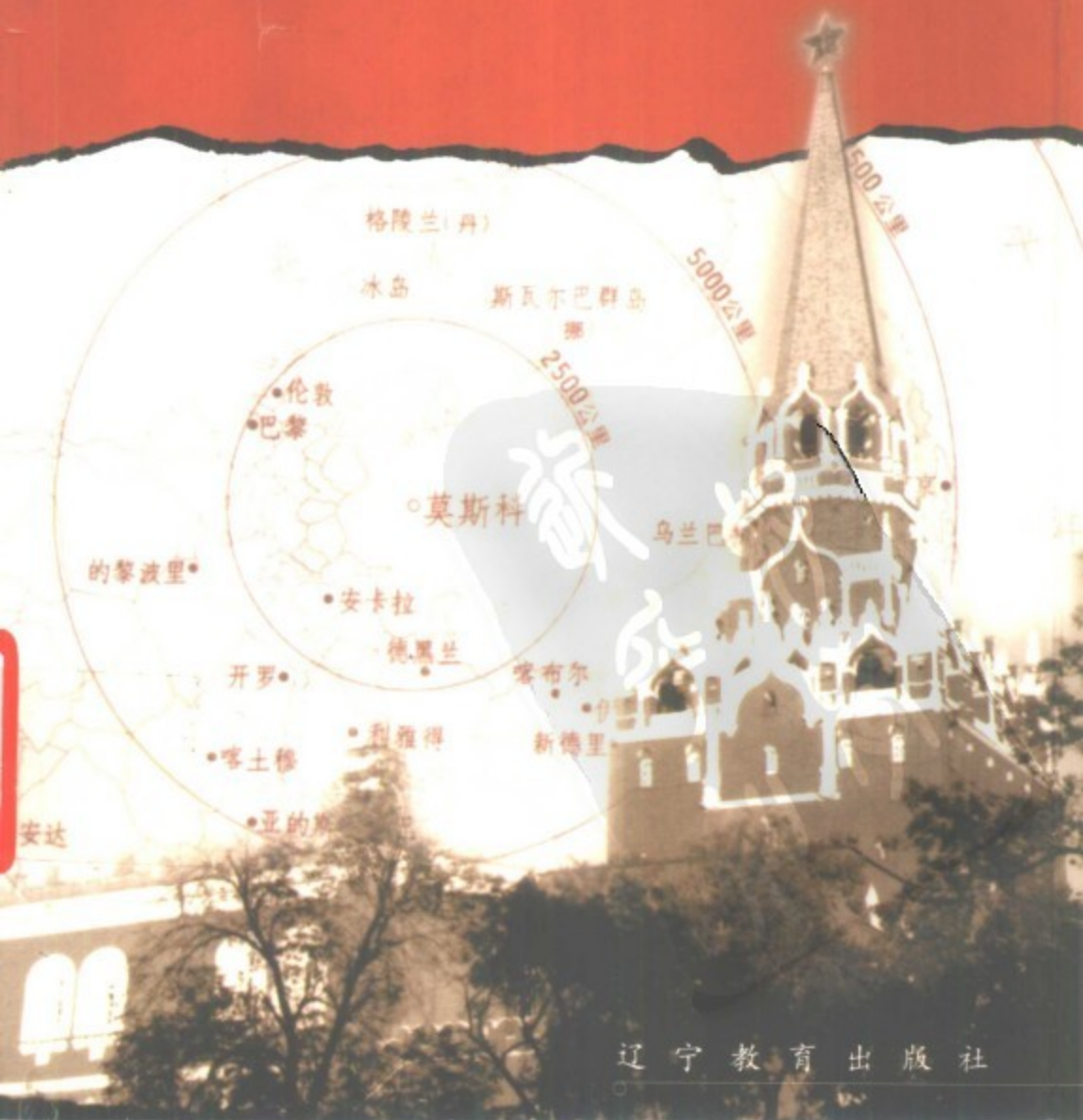


安德烈·纪德 著 郑超麟 译

从苏联归来

附：答客难



I 565.65
J 158

安德烈·纪德 著 郑超麟 译

从苏联归来

附：答客难



辽宁教育出版社

03253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苏联归来——附：答客难/(法)安德烈·纪德著；郑超麟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1

ISBN 7-5382-5404-8

I. 从… II. ①安… ②郑… III. 随笔-法国-现代 IV. J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337 号

编辑策划	万象书坊
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杨菲菲 夏兰兰
美术编辑	谭成荫
封面设计	张红
责任校对	马慧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
发行	辽宁万有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199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5.375
字数	110千字 插页 4
印数	1—5 000册
定价	8.50元

出版说明

本书含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二书，为郑超麟先生六十年前翻译，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译者署名“林伊文”。今合为一册，并改署本名。此次重印，除对原译本中一些人名、地名、专用名称及某些标点符号用法，按现行标准及用法统一外，其余一律未加改动。

在本书付印过程中，郑先生于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在上海逝世，享年九十八岁。郑先生生前对此书出版极为关心，为之撰写新序，并在临终前数次询问印制情况，但终于未及亲见此书出版，了此世纪夙愿，是一遗憾。我们谨以此书的出版，表示对这位在他的个人品格上堪与纪德比肩无愧的世纪老人的深切悼念。

万象书坊

一九九八年九月

1143/05

六十年前一场世界性争论

——译者新序

郑超麟

六十年前，即一九三六——三八年之间，有一场争论，起初发生于法国，随后蔓延于世界重要国家，包含我们中国在内。

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表示了他拥护苏联的态度，于是在当时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便发动各国同情苏联的名人和群众纷纷拥护纪德，给他以各种赞誉。而且苏联政府邀请他去访问苏联。原想访问回国后纪德一定会发表文章更加歌颂苏联的。想不到纪德回国后的文章，却辜负了苏联政府的期望。他发表了《从苏联归来》一书，揭露了苏联的阴暗面。于是，亲苏的群众和名人又纷纷指责纪德忘恩负义，不仅收回给纪德的种种赞誉，而且直接对纪德个人以人身的攻击。参加这个反纪德的合唱团中，也有另一个著名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

我们中国也不甘落后，亲苏的名人在短期内也发表文章攻击纪德或翻译外国反纪德的文章。

中国过去崇拜纪德的作家们也一反过去对纪德的态度，反对纪德了。

我的战友们，在纪德亲苏时并不崇拜纪德，当纪德“反苏”时也不攻击纪德。我们找到了一本《从苏联归来》的法文原本，由我翻译成中文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一年以后，我又翻译了《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一书。此二书，当时也曾发生了一定的作用。

近年，罗曼·罗兰在旅苏时写的日记经过五十年的封存以后出版了。大家看了这本书，又联想六十年前罗曼·罗兰同纪德的争论。过去认为罗曼·罗兰是对的，现在认为罗曼·罗兰并不一定是对的，于是，都想找六十年前出版的纪德的两本书来看看。

这就是又引起六十年前那次争论。我及我的朋友费了许多力气才找到了当年我翻译的那两本书。现在我想重新出版这两本书，供争论的人参考。时代已经改变了，我想争论的结果不会同从前一样了。

此二书初版是相隔一年分别出版的。此次重版，则合订为一本，书名也改为《从苏联归来——附：答客难》。以下的文字同时适用于这两本书，以此作为它们的新序。

* * *

《从苏联归来》出版于一九三七年，距今已有六十一年了。世界和中国，在这期间，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书中所反对的，主要是当时苏联流行的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怎样呢？现在，不仅被崇拜的个人已经不存在了，而且连苏联这个国家也已灭亡。即以这个译本而论，出版时中国还是在受国民党的统治，不仅我这个译者，姓名不能写在书报上，连我的身体也监禁在国民党的中央军人监狱中。纪德此书的法文原本就是我的战友们从狱外设法送进狱中给我翻译的，我利用当时奉命翻

外国军法的机会，偷空译出，然后送出狱外的。

著名作家楼适夷先生，当时也同我监禁在这个监狱中，也同我一起翻译军法。他曾回忆此事：

有一次，他翻译法国纪德的《从苏联归来》，有人说，这本书是反苏的，别看它。可我还偷偷地作了他的译稿的第一位读者。我为此事还挨了难友们的批评。我不大服气，我记得一节，是纪德游苏时，到电报局去打电报，电文中提到斯大林的名字。电报员要他必须在“斯大林”上面加上“伟大的”字样，他没有加，这电报就打不出去了。（见《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九年第三期楼适夷文《记郑超麟》）

按当时一同翻译军法的，只有我是一个是托派政治犯，其余十余人都是中共方面的政治犯。我晚上住在小房间，他们集中住在大房间里，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

由楼适夷的回忆可以知道，纪德此书具有战斗性。我刚译好，尚未付印，就引起了一次争论。我出狱后，听说销售很多，重印了好几次，发生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也引起了争论。但我出狱后已经全面抗战时期了，人们已不去讨论拥苏反苏问题了。不过，解放后，我入狱，我译的《从苏联归来》一书还是被列入罪证，公安局的审讯员斥责道：你译的动反的《从苏联归来》的书阻止了好多青年人投奔延安！

由此我知道，平生所译的书，除了《共产主义ABC》在“大革命”时代发生过很大的政治作用之外，这本《从苏联归来》当时也曾发生了较小的政治作用。

所以，此次由于罗曼·罗兰的旅苏日记封存了五十年之后公开出版，重新使人对于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发生兴趣，使人急于

知道这两个法国有名的作家先后相隔一年游苏感想有何异同，我的这个译本就从尘封的图书馆书架上被人找出来了。我看了倍加亲切，同意重新出版。

纪德为了回答当时人对于他的“反苏”的攻击，曾再写一本书，名为《我的〈从苏联归来〉再润色》，也是我翻译的，改名为《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也是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当时正在抗战期间，销售不多，图书馆没有收藏，想找一本却没有找到，便要放弃了。刚写到此处，忽然得到朋友来信，说他找到此书了，正在复印寄给我。我也是喜出望外。

我急于写完此序，不能再等待这第二本的纪德书寄来，便在此序中说说对于罗曼·罗兰和纪德两大作家发表议论。

纪德的朋友王尔德曾指着纪德的嘴说：“这张嘴是不会说谎的。”纪德游苏，看到好现象就表示赞美，看到坏现象，便如骨鲠在喉不得不吐。他明知写了并出版了这本《从苏联归来》，必然会招来所有亲苏的人的攻击，但他不管后果如何，写好还是发表了。罗曼·罗兰的日记，字里行间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是不满意的，但他只用暗示却不敢明写，又要封存五十年。

在纪德的第二本书（简称《答客难》），很少理会别人对他的攻击，惟有罗曼·罗兰对他的攻击，他是特别痛心的。我译这第二本书时，至今已已有六十年整了，内容也不记得，只记得纪德如下的话，即“罗曼·罗兰对我的攻击使我痛心，这只老鹰已经筑好它的窠了”。这个反击，看似很轻，其实很重。

我老了，再过两年就满百岁，适逢中年时翻译的书今年又能重版问世，这也是晚年的一件喜事。

一九九八年四月四日



郑超麟(一九〇一·四·十五—一九九八·八·一)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八日摄于上海

目 录

六十年前一场世界性争论——译者新序

郑超麟

从苏联归来

论纪德与《从苏联归来》(代序)	5
自序	14
一	18
二	26
三	34
四	45
五	51
六	58
附录	60
高尔基下葬时在莫斯科红场的演说	60
对莫斯科学生的演说	63
对列宁格勒文学家的演说	65
反宗教斗争	67
奥斯特洛夫斯基	70

一个集体农场	71
波尔塞伏	73
流浪儿	74
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	
译序	79
一	81
二	85
三	91
四	96
五	102
六	106
七	110
八	114
九	119
附录——	124
旅伴(一)	124
(二)	126
旅途随笔摘录	131
书信与凭证	141
纪德答爱伦堡	162

从苏联归来

我敬献本书于

欧珍·达比之灵

本书就是我在他身边,为着他,
所见闻的所思想的种种之反映。

《荷马语诗》献于德美忒女神的，曾说：这位伟大女神到处奔走访寻她的女儿的时候，来到克列乌斯的宫廷里。那里，她化作一个保姆，没有人认识她。王后梅檀奈委托她照顾一个新生的孩子，小德谟风，这孩子就是后来的特里卜托廉，农业劳动的倡始者。

每晚上，当一切门户都关闭，所有的人都睡着的时候，德美忒便从那柔软的摇床上抱起这个小德谟风来，把他安放在热烘烘的火炭床上，表面看来是很残酷的，其实是由于一种深切的爱，意在使这小孩转化为神。我在想象中，看见这伟大的德美忒，如何弯着腰，向着这神采焕发的婴孩，把他看作未来的人类。他也经受得起火炭的烘炙，这种烘炙使得他健壮起来。在他身上，有某种超人的、壮伟的和非常荣耀的东西在酝酿。但愿德美忒的大胆的尝试能实行到底，他的非常的期冀能实现出来！可是据传说，梅檀奈不放心，由于一种母性的溺爱所引诱，有一晚她打破这实验室的门进去，推开这位女神，排除那在酝酿中的一切超人的东西，并拆毁了火炭的床，如此，为救护孩子，她竟失却了神。

论纪德与《从苏联归来》

——代序

谁假使知道一点安德烈·纪德之生活与思想的演变，那他就不能否认他是思想忠实，生活严肃而且是言行一致的人。

他生长于新教徒的家庭，幼年度着严格的禁欲生活：睡木板，洗冷水，中夜祈祷，他热烈地遵守着纯洁生活的一切戒条。

随后他慢慢变了，他痛感到以道德律压制自然情欲的不合理，于是他就彻底纵欲，鄙弃一切道德的规律；可是不能自欺的人，那是决不能长期沉溺于荒唐的泥坑的；于是这位思想家又苦闷了，幻灭了，甚而至于想到了自杀。

然而纪德毕竟是一个勇于生活的人，他决不能完全消极，苦闷的结果终于使他在人生问题的新见解上，又找到了内心再平衡的支持点，这就是“伦理人”与“自然人”的调和。纪德这时，不仅鄙弃了“灯红酒绿”的夜生活，同时又根本反对任何压制人性的宗教。

此后纪德愈加注意到社会问题了，那当然是时代使然。因他对穷苦人的同情，痛恶资本制度，但他同时却酷爱着个人人格

的自由发展!

刚果的旅行,使纪德发现了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的一切罪恶;回来写成了《刚果旅行记》,把法帝国主义的凶相暴露无遗,赢得了法国统治者的同声毒骂。

一九三三年法西斯在德国的胜利,以及法国在经济与政治上所遭遇到的严重危机,又使我们这位天才的作家走向共产主义;使他成为热烈的苏联之友。

由禁欲而纵欲,由纵欲而消极,由消极而再平衡;由单纯的人生思考走向社会的观察,由现社会的认识而反对资本制度,痛恨帝国主义,最后拥抱了共产主义,这一过程无论在纪德的生活与思想上,都是有机地发展着的,而那发展中的每一个转变,又都经过了痛苦的思索与深刻的探求。

王尔德说,“你的嘴永远不会说脏”,这真是对纪德之确切的定评。

纪德之拥护苏联既不是偶然与投机的行为,那末他对于苏联的观念与态度,当然也不能与时流一样地随声附和,简单做苏联统治者的应声虫了。

纪德的新著:《从苏联归来》,即表示出这位老作家(现在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对于苏联国家与共产主义之热烈的同情,以及对于苏联现当局专横堕落的忠实批评。

纪德之出版此书,是经过了长期内心的矛盾的;他深知它将一切苏联的敌人所恶意利用,他又预见到苏联当局及其一切拥护者将向他狂吠;可是最后他还是克服了这些顾虑,决定说出自己的真话,因为依他自己的话说来,最重要的还是“人类的将来,与人类的文化问题”。

书终于出版了(虽然法国共产党首领加兴曾特地和他谈判了几次,叫他不要付印),最难堪的当然是苏联的现当局,于是就动员它那庞大的宣传机关,集中了火力向这位“昨日之友”进攻,罗曼·罗兰称他“丧尽了良心”,《真理报》上骂他是“说谎者”,是“法国的旧作家与俄国轻滑的白党的杂色混合物”,是“骗子”,以及其他一切难堪的名字。

可是我们只要平心静气来读一读他的小书,再如果愿意多费一点时间来研究苏联的现状,那我们不得不承认纪德的“笑与泪”,却正是他“良心”之所在!

见苏联大众之热情、亲切与活泼而欢笑,同时因官僚们之专横、腐败而流泪;这不是真正苏联之友所应具有的态度吗?

《真理报》痛恨纪德之“不说真话”;但我们在《笑与泪》那篇文章中,却显然地找出了“不说真话”的倒是《真理报》自己,在那篇文章中有如下的一段:

纪德在周游格鲁吉亚后,自动的,出于自己诚意的(他在自己的小册中也承认),打了一个电报给斯大林,电报中充满着祝贺与赞叹的口气。

但是究竟在小册子中,纪德是怎样写的?究竟那所谓“祝贺与赞叹”是怎么回事?请读者翻阅本书第四章中关于这一段的描写吧,此地我们不再多谈了。那末为什么《真理报》撒这样的明显的谎话呢?因为苏联的民众是决不会读到纪德的原书的呵!

最后,我还想谈一点关于纪德游历苏联,及其对苏联采取批评态度的直接原因。

据普通的传说,纪德之游历苏联是为了送高尔基的葬,其实

这是表面的。最重要的，还在于他受到了老友维多·绥奇的影响。因此，为了更明白纪德此次“转向”的理由起见，我觉得必须将维多·绥奇之为人及其致纪德的公开信同时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维多·绥奇给纪德的信

维多·绥奇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与英勇的战士，是纪德的老友。他参加过西班牙、法国与俄国的革命运动，因反对俄国现当局的政策而被捕流放，去年因法国各作家（纪德在内）的抗议始得被释出国。他的名作有《第一次俄国革命的一年》，《狱中人》，《文学与革命》等书。这封信是一九三六年五月在布鲁塞尔写的，正当纪德游历苏联之前。

亲爱的安德烈·纪德：

你最近在巴黎召集的国际作家保障文化大会上当了主席。在这会上，关于苏联的思想权问题，只谈到了我的事情，而且还仿佛违反了大多数到会人的意志。在那个时期，我知道你曾尽力设法要把我那些文稿从莫斯科的检查处中救出来。那里还有我所有个人的信札，我所有的回忆，我所有的笔记，与所有我生平积集起来的珍贵的稿子……你替我帮的忙，以及你对那些保护我而又不愿听我发表意见的朋友采取了一个公正的态度，我很为感谢。假使我个人的事情你能感到兴趣，那末在我致马格特曼因·巴迟的一封信中，你一定能发现一些对于这一问题的教训，兹将该信附上，如你还要我做别的事情，很愿效劳。

实际上，在目前所进行着的伟剧，很少与你我有关。不过你现在已处身于革命者之列了，安德烈·纪德。请让一个共产主义

者很直率地把我们的最高统治者讲给你听听吧。我记起了你杂志上的几页,其中你说你在一九三二年接受了共产主义者的原理,因为它保证了人格的自由发展。(现在我没有书籍,也没有空闲的时间去找寻你的原稿,所以只有凭记忆来重述你的思想。)读着这几页的时候,我正在莫斯科,心里怀着一个极矛盾的感情。开始我很快活,因为看见你走到了社会主义,这主义是在很久以前,即从我热情的年轻时代以来,就已信仰了的。嗣后,我鉴于你所说的话与我所陷入的实际完全相反,又觉痛心。当你杂志上的几页,映入我眼帘的时候,我周围的人们正陷于这样一个情形之中,即他们甚至不敢冒险地去拿一本杂志来看,因为他们相信,政治警察每夜都有前来搜查的可能……我对你说吧,当我读你那本杂志时,所发生的一种感情,正像一个处身于前线战壕中的兵士,收到了一份从后方寄来的报纸,在上面他发现了一些歌颂那“最后一次为正义而战”的诗文。我自己问问自己,难道你对于我们的斗争,对于革命之被它内部的反动所损害,能一点都不知道吗?在那时候,一个工人假使要发表一点意见,不管他的声音多么温和,但也已立刻会被开除出党、工会与工厂,且会被监禁与流放。……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这是怎样的三年呀!这时期的显著特征,为基洛夫事件以后的大批屠杀,列宁格勒居民之成群流放,几千名共产主义者被囚禁,以及集中营之充塞,这些集中营确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假使我真能了解你,亲爱的安德烈·纪德,你是时常有睁眼看生活的勇气的。那末你总不能对于这一个实际情形闭着眼睛吧。否则你就再没有向工人说一句话的道德上的权利了,因为对工人们而言,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简直是他们

身体与心灵的创造，是他们生活的最高意义。

你要谈到思想的情形吗？那是一个绝无内容的枯燥教条，硬生生地放到各种思想的领域里去；而且在一切的书藉与刊物上，都是没有例外地，在一字一句重复着或简单地注释着独裁者所说过话。历史每年都在彻底地修改着，百科全书在重编，各种丛书被重新审查，为的要到处涂去托洛茨基这一个名字，并且要把列宁同伴们的名字加以删削或污损；科学完全为一时的鼓动服务。他们昨日骂国际联盟为英、法帝国主义的卑劣工具，今天却发现国联是和平与人类进步的工具了……讲到作家的情形，即那些以替代其他不会讲话的人作喉舌为职业的人们，他们的情形如何？我已经见到高尔基了，他把回忆列宁的作品中某些列宁所说的话重写了一次，在最后的一版上，有几页上的话，简直与第一版上所说的话完全相反。……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流派，是一种文学上的官派，它组织得极可赞美，报酬也颇为丰富。讲到别人就不同了……那位在精神上与我们伟大的亚历山大·勃洛克相伯仲的作家，即现代俄国思想史的著者——依凡诺夫·拉索姆尼克怎样了呢？当一九三三年我在狱的时候，他也在那里。人们证实那位象征主义的老诗人符拉地米尔·比也斯特在流放地中自杀了，难道不是真的吗？他的罪状是很大的，即他沉醉于神秘主义。可是这里还有一些各等各样的唯物论者呢：那个著述关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有名作者——黑曼·孙道密斯基，在沙皇时代曾被判处死刑的，他是第一次苏维埃百科全书的发起人，最近被判处十年集中营的徒刑，这又是什么原故？不过这两个都是过去的无政府主义者，那末再请你容忍一下，让我再把一些共产主义者，十月革命的战士以及高等的知识分子讲

几个给你听听吧(我举出这些名字来是很觉得痛苦的)。阿尼雪夫,他著有《内战史论》——是俄文中一部最忠实与最简洁的一部史论;还有高尔巴切夫、列列维奇、凡尔定这三位文学的批评家与历史家。这四个人都因为同情季诺维也夫派的嫌疑,现在集中营中。下列这几个人是托洛茨基派,他们的待遇更苦——因为他们最坚决,已经监禁和流放了八年了。这几个人是——列宁格勒农学教授定格尔希瑞特脱;社会学教授格里高利·耶可文;以及我们年轻与伟大的桑采夫,他在长期绝食之后,于一月间死去了……安德烈·纪德,我这里所提到的只能限于作家,因为不然的话,整个的篇幅只能填写英雄们的名字了,我那种只谈作家的阶层精神,很觉抱愧,请原谅。那位俄国社会主义的先锋——可以资为模范的巴查洛夫(俄文《资本论》的名译者——译者),失踪已经五年了,他现在怎样呢?还有那马克思恩格斯学院的创办人——梁赞诺夫又怎样呢?他在上乌拉尔斯克的监狱中经过了长期的斗争,不知死活如何!历史家苏洪诺夫,他给我们写了一本最可纪念的——《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历史》,他现在怎样了呵!人们强迫他牺牲良心,他因为意志不坚而同意了,但他是付了怎样的代价啊!

人道方面的情形怎样?你一定会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多讲一点吧。那样疯狂的一种压迫,无论国内发生了怎样的危机,都不能为它来辩护,只有最黑暗时代的警察才会发明出这种制度来。最叫人吃惊的是那种肆无忌惮的可怕的警察机关的行动,多少人受了它的毒害呢?而且在苏维埃的监狱中,正在养育着各派真正的反革命。他们昨天还是苏联的公民,明天可以成为它的敌人。对于这一种制度,人们只能找到一个解释,即官僚

们惧怕自己政策的后果，所以在那一无权利的群众之上，建立起施行绝对统治的法规，统治的官僚们对于自己也失去其管束力了。现在我们要谈到工资问题了。一般地讲实际工资跌得极低；至于劳动立法，那也糟糕得很，官僚们可以胡乱地执行！那种国内身份证的制度，剥夺了人民迁居的权利；为反对工人及甚至反对小孩的法律，简直痛苦得要人的命；连坐的法律极其残酷，只要一个人犯了罪，全家都要受到无情的打击；还有一种，凡工人无护照越过苏联国境者处死（对于那不能领出国护照者，此法亦有效），与他接近的一切亲友悉遭流放。

我们正在建造一条反法西斯的阵线，但在我们的后方有这许多的集中营，这是多么妨碍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呢？任务再不是简单的了，你可以看到，它再不属于那些专喜简单化的人了。无论新的国教主义，或什么神圣的谎言，都不能阻止肿疡的流脓了。保护革命的阵线，现在不再简单地在维斯土尔与满洲了。在无产阶级的内部来保护革命，即反对那反动的统治，不使它逐渐消耗那工人阶级胜利品的最大部分，这已成为极迫切的任务了。只有在这一个意义上说来，苏联还寄托着我们现代人之最大希望，即苏联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说出它最后的遗言。

亲爱的安德烈·纪德，也许你能从我这一封痛心的信中得到一点东西吧！我希望你能够如此，我愿你决不要闭起你的眼睛，你应该看到那些新元帅的后面，看到那机巧的宣传，看到这些行列，游行的队伍，以及那些大会，这都是旧世界的老把戏！——你要看到革命的实际情形，它已经快要沉溺了，它在向一切的人呼救！请你同意我吧：人们对于革命的服务，并不在于掩盖它的毛病，或蒙住它的真面目来骗人的呀！

在你的身上,极适切地代表着这一西方伟大的知识阶级,这一知识阶级如果对文明有过很大的贡献,那么它对无产阶级总还得多多的请求原恕,因为它没有了解一九一四年的大战,因为它完全忘记了光荣的俄国革命,更因为它没有充分地保障劳动者的自由。现在,这一知识阶级终于怀着同情转向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来了,苏联已成为此种革命的化身。那么这一知识阶级应该凭着他们的良心,在盲目与明视这两者之中选择其一。让我告诉你吧,谁要是想为工人阶级与苏联服务,那他就非睁开眼睛不可。让我以那些人的名义要求你鼓起勇气,要求你具有那明视真实的勇气!

你虔诚的朋友维多·绥奇

一九三六年五月,布鲁塞尔

自序

三年以前，我宣布过我对于苏联的爱和钦佩。那里正在进行一种空前的实验，这实验使得我们的希望之心大为高涨，我们期待由此造成巨大的进步，造成一种力量足以牵引全人类前进。为参与这个改革，是值得活下去的，——我想，——而且值得牺牲自己生命去赞助的。在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精神里面，我们都坚决向往苏联的光荣的未来，亦即是文化的未来；这话，我们三番四覆地说过了。我们愿意还能再说这话。

在未到苏联去以前，那里若干新近的决议，似乎表明方向在转变，业已使得我们疑虑不安。

那时我写过如下的话（一九三五年十月）：

正因为人们对于苏联的攻击是愚蠢和下流的，所以今天我们才用顽强的力量去拥护苏联。等到将来我们停止这个拥护时候，那些狂吠者恰正要开始称赞苏联；因为将来他们所称赞的必定是苏联的妥协，苏联的屈服，以及那些足以使别人说出“你们看哪！”这类话的事情，但是由此苏联也就离开了它当初所追求的目的了。但愿我们的目光，始终注

定这个目的,即使将来有上述的情形,也能不从苏联转移开去。(《法兰西新评论》,一九三六年三月)

然而未曾更广泛考察以前,我还是保持信任态度,宁愿怀疑我自己的判断,所以到莫斯科四天以后,于高尔基下葬那天在红场演说时,我仍旧宣告:“文化的命运,在我们精神中,是与苏联本身命运相联系的。我们拥护苏联!”

我时常说过:凡要始终一贯坚持自己的意见,往往会发生不诚实的危险;我认为当着多数人的信念和自己的信念成了问题时候,尤其需要诚实。

倘若当初是我弄错了,那么最好的事情便是赶快承认我的错误;因为在这里,我对于那些受这错误所牵引的人,是负有责任的。在这事情里头,顾不到所谓“自我尊严”,而且我本也很少所谓“自我尊严”。在我的眼睛看来,这里头有些事情比我自己还更重要,甚至比苏联还更重要:这就是人类,它的命运,它的文化。

然而当初果真是我弄错的么?凡是留心这一年多以来苏联的发展的人,将会判定究竟是我转变了,还是苏联转变了。这里所说的“苏联”,我是指治理苏联的人而言的。

别的比我更内行的人,将要说:这个方向转变是否表面上的;而我们所视为的一种背离,是否先前某种设施的必然结果。

苏联“正在建设当中”,这话须得不断地提起来说。由此,到这个在诞生中的巨大国土做一次旅行,才有非常的意义:似乎人们在那里参与未来时代的分娩一般。

那里有好的事情也有坏的事情;我应当说:有最好的事情也有最坏的事情。最好的事情时常是依靠巨大的努力然后获得

的努力,并非无论何时何处都能获得所愿的事物。有时人们可以想:还未得到。有时最坏的事情伴随最好的事情而来,而且多过一倍,人们几乎可以说:最坏的事情乃是最好的事情的结果。于是人们从最光明走到最黑暗,突如其来地,使人仓皇失措地。时常有这类事情,即是:旅行家根据先定的判断,或者只见到这一方面,或者只见到那一方面。苏联的朋友往往拒绝看那坏的方面,至少拒绝承认这一方面;以致关于苏联的实话往往被人带着恨说出来,而谎言则被人带着爱说出来。

我的精神却是这样的:对于我所愿意永远称赞的人,我总更加严厉些。凡一味恭维的人,乃为不善表示其爱;所以,我认为说话时,不装假,不姑息,则贡献给苏联以及它所代表我们的事业的,还更重大些。以下我的批评,恰正是为了我对于苏联及其奇妙成就之钦佩而发的,也是为了我们所期待于它而发的,尤其是为了它允许我们去希望而发的。

苏联过去对于我们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它不仅是一个选取的祖国,还是一个向导,一个榜样。我们所梦想的,所敢希望的,我们的意志和力量所倾赴的,在那里实现出来了。总之,那是一个国土,那里乌托邦正在转化为现实。巨大的成就早已充塞了我们的希冀的心。最困难的事情,好像已经做过了:我们正在欢天喜地用一切受苦的民众名义,同它结立一种盟契,一同冒险前进。

我们感觉到息息相关至于何种地步呢,以致到了倾跌的时候?然而这个倾跌观念已经是不能容许的了。

若是某些默契的诺言没有实现,那应当归罪于谁呢?应该由原初理想负责么?或者毋宁归咎于后来的背离自身,后来的

失信、从权等等，无论这些有多少理由可以辩护？

*

这书里，我表白我个人的感想，关于苏联自己带着喜悦和应有的骄傲显示给我们看的事物，以及关于此外的我所能看到的事物。苏联的成就，大部分都是可以钦佩的。若干国土早已呈现幸福的笑容。我从前在刚果旅行时候，总要离开总督差派的汽车，而设法去同一切事情和任何人物发生直接的关系，以增进我的知识；那些赞许我这办法的人，难道要责备我，说我到苏联来不当有这种顾虑，说我不当不让人家蒙蔽了么？

*

我不抹杀这个事实，即是敌党将从我这书获得表面的便宜，在他们看来“爱秩序心，是与暴君的趣味相混同的”。^①倘若我的信念不是始终坚定而未动摇的，我将为此踌躇不愿出版甚至写下我这本书。然而我始终确信：一方面苏联终归要克服我所指出的重大错误，他方面，——这是更重要的，——一个国家单独的错误也决不会败坏一种国际的大同的事业之真理。谎言，以至于知而不言，似乎是便利的，继续说谎下去也是便利的，然而如此也就太便利于敌人了；反之，真理无论如何痛苦，它伤人，只为的要医好他。

^① 见托克维尔：《美洲民主政治·导言》。

同劳动者民众直接接触，在作场，在工厂，在休养院，在花园或在“文化公园”，我都感受到深刻的快乐。我觉得在这些新同志中间一种友爱迅速建立起来，我的心花怒放了。所以我在那里所照的相，现出更多的微笑，以至更多的笑，这是我在法国所不常见的。而且在那里，有好多次由于过分的快乐，我的眼睛充满了眼泪，爱和柔情的眼泪；譬如在索契附近，顿巴斯矿工的休养院……不，不，那里并没有什么先期准备，什么矫饰；我是有天晚上突然到那儿的，未曾预先通知他们；但立刻我就同他们亲密起来了。

还有那次出其不意的探访波尔宗附近儿童营地的事情。这营地很朴素，几乎简陋，然而小孩子表现何等的幸福，健康，好像要把他们的快乐奉献给我一般。说什么才好呢？语言是没有能力来表现如此深刻又如此简单的一种情绪的……但为什么说到他们，而不说到其他的人呢？格鲁吉亚诗人们，大学生们，尤其做工的人，我对于他们当中好多人发生了热烈的感情，我不断地惋惜我不懂得他们的话。但在微笑中，顾盼中，已经表示了多情

的雄辩了，我怀疑，即使用语言说出来，是否能增加更多的感情。应当说，那里，我到处都被人看作一个朋友；一切人的眼光而且还表示别的东西，还表示一种感激。我愿意再领受这个感激；这点也就推动我起来说话。

*

人们最情愿引你去看的，都是最好的成绩；这是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十分自然的事；但我们也有好多次突如其来地进入乡村学校、幼稚园、俱乐部，那里人们并未曾想到引我们去看，然而那里与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多的不同。我所最钦佩的恰是这些地方，因为那里并没有一点准备给人参观的。

*

我所看到的一切儿童团营地，小孩子都是漂亮的，营养很好（每天五餐），照料很好，可说是受优待的；他们都是快乐的。他们的眼色是明亮的，信任的；他们的笑没有狡狴，没有恶意；外国人，在他们看来也许有点可笑的，但我从未曾在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发现一点讽刺的痕迹。

比他们年纪大些的，那些青年身上，我们也常常见到这种欢喜幸福的同样表情；他们也是漂亮的，健壮的。他们傍晚，工作做完以后，就聚集在“文化公园”，而这“文化公园”都是不能否认的成功；尤其是莫斯科的“文化公园”。

我时常到那里去。这是一个娱乐的地方，有巴黎“月园”（Luna - Park）那么宽大。人们一进园门，仿佛到另一个世界。在这群青年人、成年人和妇女中间，到处都是认真的，端谨的；没有一点愚蠢的和庸俗的行为痕迹，没有狎昵，没有放浪，甚至没有戏谑。人们到处感到一种欢乐的热情。这里，游戏组织起来；

那里人们跳舞；普通，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指挥着，监督着，一切都按照完全的秩序进行。宽阔的圆圈形成起来，无论何人都可以参加进去；但旁观者总比跳舞人多得多。此外还有民间的跳舞和歌唱。大部分都只有一个简单的手风琴伴奏着。这里，在这栅栏围绕着的，然而可以自由进入的地段，一些人在练习种种武术；一个训练员传授人，指点人跳绳索的技术；稍远一点有器械体操的种种设备；人们耐心等待轮流到自己的时候；人们在锻炼身体。另外一个宽大地方划出来，作为球队的地盘；游戏者的健壮、温雅和漂亮，是我百观不厌的。再远一点是安静的游戏：战棋，象棋，以及好多比赛灵巧和耐性的小游戏，都是做得非常之巧妙的，其中某些我还不认识；那些比赛体力、敏捷和灵活的多种游戏也是我在别处未曾见过的，我不能去描写它们，但其中有些一定可以在法国大受欢迎的。这些足够使你好几个钟头应接不暇。有一部分给大人的，有一部分给小孩的，又有一部分地盘给最小孩子的；那里，他们找到小房屋，小火车，小船，小汽车，以及好多同他们身段相配称的小东西。在一条宽阔道路上，接着静的游戏之后（爱玩这种游戏的人多得很，有时需等待很久，才有一个空的桌子轮到你坐下去），又有些木牌，上面贴些谜语之类。我再说一遍：所有这些都有一点俗气；这个广大的人群，都是端谨，正直，尊严和守礼；可是没有受一点拘束，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这个人群，除了小孩子以外，几乎都是工人组成的，他们来这里锻炼身体，休息，娱乐或学习（因为这里也有教室、讲演厅、电影、图书馆等等）。莫斯科河上还有溜冰场。这里，那里，在这广大公园之内，又有一个临时教授站在小木台上讲学；那是常识，历史或地理的功课，并有种种图表以为讲学之

助；那又是应用医学、生理学、陈列着人体解剖模型的画板等。人们一本正经地听着。我说过了，我从未发现一点讽刺的痕迹。^①

可是这里还更好些；一个露天小剧场；大约有五百个观众在台下拥挤着（没有一个空位），在宗教般静穆当中，听着一个演员吟诵普希金（《欧根·奥涅金》）里面的一首歌）。在公园的一角，近进门之处，是降落伞区域。这是那里十分流行的一种运动。每隔两分钟，三张降落伞，就有一张从四十米的塔上高处脱落下来，将一个初试的人颇为残暴地抛落在地面。这样，谁肯去冒险呢？可是人家趋之若狂；人家等待自己的轮次；人家排了长队等待。我还不曾说起草地上的大剧场哩，那里有几次演出，观者将近两万人。

莫斯科文化公园是最广大的，其中各种游戏也设备得最好；列宁格勒文化公园则是最美丽的。但现在，苏联每个城市都设有文化公园，此外还有儿童花园。

自然，我也参观过好多工厂。我知道，而且反复地说：要工厂的工作进行顺利，得依赖于一般生活的舒适和快乐。但这方面事情，我的说话并不在行。其他的人负责说这一方面的事情，而我是同意于他们的赞美的。惟有心理上的问题才是我分内之事；这里，我所注意的就是这类问题，特别是并几乎唯一是这类问题。倘若我从侧面牵涉到社会问题，那我仍是立足在心理学

^① “那么，你以为这是好的现象么？”我的朋友 X 喊道，当我向他说这意见时候。“讽刺，反证，批评，是有相互联系的。小孩不会讽刺，大了就是易信和驯顺的，那时，你，讽刺家，又要批评什么‘附和主义’了。我是喜欢法国西式嘲谑的，即使是拿我做嘲谑对象。”

观点上去看的。

*

年华愈大，我对于自然风景愈少兴趣，少得很多，无论这风景是如何美丽；但对于人类的兴趣，则是与年俱增了。在苏联，人民是可钦佩的：格鲁吉亚、卡黑底、阿布哈兹、乌克兰的人民（我只说到我所见过的），在我看来，尤其是列宁格勒和克里米亚的人民。

我参加过在莫斯科的青年节，在红场上面。克里姆林宫对面房屋，悬挂彩布和绿叶，掩盖了它们的丑陋。一切都是壮丽的，甚至（这里我赶紧添加一句说，因为我不能时时刻刻说）都是十分美妙的。可赞美的青年人从四面八方来这里给人检阅。行列经过足有好几个钟头之久。我想象不到有如此华美的景致。显然，这些完美无疵的人物，都是训练好、准备好的，从一切人中选择出来的；但能够产生这些人物的国家和政制，怎能不受人赞叹呢？

那是以前几天，当高尔基下葬时候，我也见过红场。我看见这同一的民众；同一的民众，然而完全不同的，在我想象中宁可说是与帝制时代俄罗斯民众相似，他们排成长队，长久地，无穷无尽地在那“大柱厅”里面高尔基灵柩面前经过。这次可不是这些苏维埃民众中最美的最强的和最快乐的代表人了，而是要来就来的悲伤的人，其中有妇女，尤其小孩，有时还有老人，几乎都穿得不好，有时而且好像很贫苦的。一条静穆的、忧愁的、沉默的长行列，好像从过去时代来的；他们秩序井然地好久才过尽，比那容光焕发的行列一定长久得多。我自己留在那里很久，观察他们。高尔基是这些人的什么人呢？我不大清楚：一个导师？

一个同志？一个兄弟？……无论如何总是一个死者。一切人，甚至最年幼小孩的面孔上，都可以看出一种凄惨的表情，但也有，而且尤其有一种向外放射的同情力量。这里说不上什么肉体的美了，但我看见面前经过的极大数量的可怜人，拿着比美更可钦佩的一种什么东西献给我的眼光；他们当中有多少的人，我愿意抱来紧压在我的心胸啊！

无论在何处，都没有像在苏联，那般轻易，直接，深切和热烈，去同一切的人和任何的人相接触。强烈的同情线索，立刻，——有时看一眼就够，——就纠缠起来。是的，我不能设想，苏联以外其他地方，人们能够那般深切那般强烈觉到人类的感情。虽然语言不通，我在别处还未曾感觉到有这么繁多的同志和兄弟的；为了这，我宁愿拿世界上最美丽的自然风光去交换。

自然风光，我以后还是要谈的；但我要先叙述我同一队青年团员初次交接的经过。

这是在那送我们从莫斯科到奥尔忠尼启则（从前叫做符拉底高加索）去的火车上。旅程颇远。弥雪儿·柯尔佐夫以苏联作家协会名义给我们交涉到一个很舒适的专用车厢，我们出于意外地得到这样安逸的位置，我们六个人：耶夫·拉斯特，季友，赫巴，雪夫灵，达比和我；还有我们的翻译兼游伴，忠实的女同志波拉。除了我们的设有睡床的房间以外，我们还占有一个大厅，我们就在那里吃饭。没有比这还好的了。但有一点使我们不高兴的，便是不能够同火车上其他的人相往来。起初几次停车时，我们都走下月台来，结果发现有一队特别可爱的游伴正占据着隔壁的车厢。这是一队青年团员，放了暑假，到高加索旅行去，希望攀登卡斯贝克高山。我们交涉结果，终于打开隔离的门，立刻

就如同这些可爱的邻居攀上交情了。我从巴黎带了好多灵巧的小玩具来，与苏联所有的完全不同。这些玩意儿可以给我机会，去同语言不通的人交往。这些小玩具从这个人手里传到那个人手里。青年男子和青年女子玩弄着，没有解决玩时发现一切难题，他们是不肯罢休的。“一个青年团员从不自认失败，”他们笑着对我说。他们的车厢是很狭小的；这天天气特别地热；这些人同那些人拥挤在一起，人们窒息着；这是很好玩的。

我应当补充说：“对于他们当中好多人，我并不是一个陌生人物。有些人读过了我的著作（多半是《刚果旅行记》），而且由于高尔基下葬那日我在红场演说，一切报纸都登载过我的肖像，他们立刻就认识我了，并非常敏感接受我对他们的注意；但没有比我更敏感接受他们的同情表示。不久就举行一场大辩论。耶夫·拉斯特很懂得俄国话，而且能说，他给我们解释说：我拿出来那些小玩意儿，他们觉得极好玩，但是他们自问：安德烈·纪德自己爱玩这玩意儿，这事是适宜的么？耶夫·拉斯特解释说：这类小游戏可以休养他的脑力。因为一个真实的青年团员，念念不忘服务，总是拿事物的用处去判断一切事物。哦，无需说什么大道理，这场时时给笑声打断的辩论，本身就是一种游戏。但他们的车厢内缺少一点可呼吸的空气，我们于是邀请其中十几个人到我们的车厢里来，这天晚会就在这里延长下去，人们歌唱民间曲子，甚至跳舞，在大厅所能容许的范围之内。这个晚会，对于我的游伴和我，都是这次旅行最好的纪念之一。我们怀疑：在其他国家是否能有这样突兀和自然的友谊；在其他国家青年人

是否这样可爱的。^①

*

我说过，我对于自然风景很少兴趣……。然而我还愿意说——一说高加索的可赞叹的森林，卡黑底入境处的，巴敦附近的，尤其波宗上面巴枯良尼的森林；我没有见过，我也想象不出有比这更美丽的：任何初生的树都现出大树的胚胎；神秘的小径穿过森林，那里白天没有过完就到黑夜了，人们想象得到那个小“大拇指”也要在那里迷困的。我们穿过了这个奇妙的森林，走到一个山湖去，人们恭维我们，说这里以前没有一个外国人到过。没有这点，已足够使我赞美这个山湖了。湖滨没有树林的地方有一个奇异的小乡村(塔巴茨枯里)，一年当中有九个月埋在雪下；我是很高兴来描写它……多么可惜我不是纯为游玩风景到这里来！或者当作一个博物学家来此探险，那时发现这里有好多新的植物，发现这高原上面也有我的花园内的“高加索轮锋菊”，将多么快活！……但这不是我到苏联来所要寻找的。我所关心的，是人、是众人、是人所能做的和人所已做的事物。吸引我的，使我迷困的那个非常繁密的森林，乃是社会问题的森林。在苏联，这些问题煽惑你、迫逼你、从各方面挤压你。

① 在苏联，青年期延长非常久，这一点，我也很喜欢。这点，我们是不大习惯的，尤其在法国(但我相信，一切拉丁国家都是如此)。青年时代是富于期望的；在我们国内，一个青年人很快就使人不敢对他期望什么。过了十四岁后，什么都固定了，对于人生的惊讶不再在他的脸上，也看不见一点天真。小孩子不久就成了青年人。游戏的事情也就丢开了。

二

在列宁格勒，我很少看见新建的市区。我所赞美的列宁格勒就是圣彼得堡。我没有见过比这还更美丽的城市，比这还更和谐的石与金^①与水的结合。这城市可说是普希金或波德莱尔所梦想的。有时，它也令人想起雪里古的图画。城中大建筑物都十分配称，好像莫扎特一首交响乐中的那些“乐想”一般。“那里一切都有秩序和美”。精神在其中舒适而快乐地飘荡着。

我并不打算说起那个奇妙的“隐修院博物馆”；所有我能说的话，我都觉得不够用。然而我要顺便赞美那种智慧的热情，它尽可能地在一幅图画周围搜集同一画师的其他作品，足以增长我们知识：研究，略图，底稿，以及其他足以解释一幅杰作渐次形成过程的东西。

从列宁格勒回来以后，莫斯科的建筑愈加相形见绌了，而且使人精神觉得受挤压和不愉快。莫斯科的房屋，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丑陋的（不仅最新建筑如此），而且相互间没有配称。我

^① 指铜圆盖和金尖顶。

知道莫斯科正在变化中,这个月就与那个月不同;这是一个在形成中的城市;一切都表明这点,人们到处可以感觉到。但我害怕起手就没有弄好。人们凿石,掘土,拆墙,毁屋,重新建筑,而这些又都像是漫无计划的。可是,虽然丑陋,莫斯科仍是一切城市当中最吸引人的城市:它强有力地生活着。丢开房屋不说吧:这里使我关心的乃是群众。

在夏天几个月中,所有的人差不多都穿白衣服。每一个人同所有的人相仿佛。除开莫斯科街道以外,别处没有这样感觉到社会平等的结果: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其中每个成员好像都有同样的需要。我夸张了一点;但也夸张不多。一种非常的一致性支配了人们的服装;无疑地各人精神上也是这样,可惜眼看不见。正为如此,每个人才觉得快乐并表现快乐。(人们缺乏一切的东西太久了,所以有了一点东西也觉得满足。当邻居没有更多的东西时,自己所有,自己就满意了。)必须细密考察,才能发现差异。第一眼看去,这里,个人是混合在群众里面的,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以至于谈到人事时候,似乎不需说“众人”,而说一个“人”就够了。

现在我就沉没在这人群当中;我洗了一个“人类浴”。

*

这些人在这大商店门前做什么呢?他们排队;这队直长到邻近街道去。他们在那里大约有二百人至三百人,很安静地,很耐烦地等待着。时辰还早;大商店还未曾开门。三刻钟之后,我又在这条街经过:同一的民众仍在那儿。我很惊异:能先进去的人有何用处呢?他们能得什么利益呢?

“什么?你问他们能得什么利益么?……惟有先进去

的人才买得到东西哩！”

于是，人们给我解释，说报纸宣布到了一大批的什么东西（我记得是椅垫）。也许有四百件或五百件，可是要买的人将有八百，一千，甚至一千五百。不到晚上，这货物就要一件不剩了。需要量是那么大，顾客是那么多，以致以后好久仍将是求过于供，而且超过很多。人们仍没有满足需求。

几个钟头之后，我走进那个大商店。规模很大。里面拥挤不堪。但卖货的人并不慌乱，因为包围他们的那些顾客，一点儿焦躁的表示都没有；每个人都静待自己的轮次，坐着或站着，有时手里抱一个小孩子，没有挂号，然而秩序一点也不混乱。若是必要时候，人们将在那里度过一个早晨，一个整日，那里的空气，从外面进来的人，起初觉得是不可呼吸的，后来也就习惯了，像习惯于一切事物一般。我本来想说：人们听天由命了。但俄国人比听天由命还要好些：他们似乎在等待中感到快乐，而且有种快乐使得你去等待。

分开群众或者为群众所涌动，我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看遍了这大商店。里面的商品几乎都是使人望之却步的。人们甚至可以相信，为限制需求之故，种种衣料物品，故意做得尽可能地粗拙，使得人们万不得已时才去购买。我本来想买几件东西，带回来给朋友做纪念；可是一切都是丑陋的。然而，人家对我说：这几个月以来，已经大大努力去提高品质了；如果细心寻找一下，如果肯费必需的时间，就可以在这里或那里发现若干新近产品，也是很可爱的，很可保证未来进步的。但要提高品质，首先须有充足的数量，好久以来数量都是不够的，现在终于够了，但也是刚够。此外，苏联人民，对于提供的一切新货品，似乎没有一样

不喜欢,对于我们西方人认为丑陋的东西也是如此。我希望,增加生产之后,不久就可以使人有所选择,使得最优良的品质生存而逐渐淘汰劣等的货色。

这个提高品质的努力,尤其注意食粮方面。这一方面还是有很多事情急待做的。但当我们指责某种食粮的低劣品质时候,耶夫·拉斯特反而钦佩最近奇异的进步,他到苏联旅行这回是第四次了,上一次还在两年以前。尤其蔬菜和水果,除了极少数以外,不是低劣的便是平凡的。这里,同其他国家一样,美味的食物让位于平凡的食物,即让位于出产最多的食物。西瓜(Melon)多得不可思议,但没有味道。波斯人有一句粗鄙的谚语,我只听人用英语引用过,现在我也只愿用英文引用它,即说:“Women for duty, boys for pleasure, melon for delight.”这谚语用在这里就不正确了。葡萄酒时常都是好的(我尤其常常怀念卡黑底·秦南达里地方美味的土产酒;啤酒也过得去)。有些熏鱼(在列宁格勒),可惜不能运输到别地方去。

*

人们既然还缺少必需的东西,自然不能关心到奢侈的用品。如果,在苏联,人们没有生产或没有更早生产那足供饕餮大嚼的东西,这是因为普通的胃口还有许多未曾吃饱。

趣味的优美化,须在能够比较的时候。现在还没有什么可选择的,还没有什么“某人穿得更好”一类的话。人们给你什么,你只好拿什么;只有拿或不拿的问题。自从国家成了制造家、顾客兼卖主时候起,品质的提高就与文化的进步成正比例了。

于是我想到(虽然我反对资本主义)法国的那些人,他们,从大工业家直到小商人,都在深思熟虑:发明什么东西去迎合顾客

趣味才好？他们当中每一个人都用何等巧妙的计谋去改善货物品质以图制服竞争者！所有这些，国家是不管的，因为国家没有竞争者。品质么？——“有什么用处，既然没有了竞争？”人们对我们说。人们便拿这话过于轻易地解释了苏联一切物品的低劣品质和顾客的缺乏趣味。顾客纵有“趣味”，也是不能满足的。不，这不是竞争的问题，而是将要到来的要求的问题；文化将渐渐发展这个要求，这里的进步正是依赖文化的。在法国，一切无疑都要走得快些，因为要求早已存在了。

然而还有这一点：每个苏维埃国家都有各自的民间艺术；现在怎样了呢？有好久时间，一种平等倾向不理睬这个艺术。但这类乡土艺术又走运了，现在人们保护它们，复兴它们，人们似乎明白了它们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一个聪明的领导机关，不可以，譬如，重用旧时印布花纹，交付顾客使用或至少任其选择么？再没有比目前出产品更带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俗气了。莫斯科大商店门面陈列的货品使人恶心；至于旧时印成的布料，则是很美丽的。这是民间艺术，但这又是手工制品。

*

我再说到莫斯科民众。使人惊心的，便是他们的非常的松懈。若说他们懒惰，那无疑是过火了的……。但“斯达哈诺夫运动”这个新奇的发明，正为打破他们的松懈而发的（旧时人们使用鞭子）。一个国家，所有工人都在做工，本无所用其斯达哈诺夫运动。但在苏联，自从民众得到自由以后，大部分人都松懈下来了。虽然如此，却有这样的成就，也就令人惊叹。治理的人费了多少努力，是没有人说得出来的。为明了这个努力之伟大，应当先能估计俄国民众自然的“出息”之微少。

在我们参观过的进行得极好的一个工厂中(我是外行的;我凭信心称赞那些机器;但我极恳挚地赞叹其中的膳堂、俱乐部、工人宿舍,以及为工人幸福、教育、娱乐等设备的一切东西),人家介绍一个斯达哈诺夫运动者给我,以前我曾见过他的大肖像张贴在墙壁上面。人家对我说:他五个钟头之内做了八天工作(也许是八个钟头之内做了五天工作,我记不清楚了)。我冒昧问他们说:这话不含有当初他用八天来做五个钟头工作的意思么?但我这话问得太不好,他们宁愿不回答我。

我听人说过,有一队法国矿工来苏联旅行,在参观某矿山时候,为表示友谊,请求替苏联矿工代做一班工作,并无需怎样奋勇,他们所做的已经是斯达哈诺夫运动的成绩了。

人们可以自问:苏维埃制度再加上法国工人的体质,热心,意识和教育,将做出何种的成绩。

在这令人悲观的现象之下,除了斯达哈诺夫运动者以外,再添加一代热心工作的青年人,以为快乐的酵素,使得整个面团都发酵起来,那当然是很对的。

*

群众这个惰性,我认为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斯大林所解决的最紧要最重大的问题之一。突击队运动是由此发生的,斯达哈诺夫运动也是由此发生的。差异工资制之复活,也在这里得到说明。

*

我们参观过苏虎姆附近一个模范的集体农场。这农场已有六年历史了,初时经过艰苦的挣扎,今天已是最繁荣的集体农场之一了。人们叫它做“百万富翁”。一切都是顺利的。这农场占

地很广。气候水土帮助它，栽种的东西茂盛得很。每幢住宅都是木料筑成，建立在木基架上，离地颇高，样子很别致，好看；周围各有一个颇大的园圃，种满了果树、蔬菜、花。这个农场去年获到惊人的赢利，因此储备了大注公积金，并提高工资至每日十六卢布五十戈比。这个数目是怎样规定的呢？恰是把集体农场看作一个资本主义的农业公司，依照这样公司分配红利给股东方法来计算的。因为这是一个成绩：在苏联已经没有为若干个人而剥削大多数人的事情了。这是伟大的。那里没有什么股东，分配赢利的是工人自己（自然指集体农场工人说的），也无需向国家缴纳什么。^① 这将是尽善尽美的，倘若没有其他穷苦的集体农场。因为我懂得每个集体农场都是自主的，这里谈不到互助问题。我误会了么？我希望我是误会了的。^②

我参观过这个很繁荣的集体农场的好多幢住宅。^③ ……我要说出每幢住宅给我的使人不快的奇怪印象：一种完全消灭个性的印象。每幢住宅都有同样的丑陋家具，同样的斯大林肖像，此外绝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一件个人物品，没有一点个人纪念。各个住宅都可以互相交换的；那些集体农场人员本身似乎就是

① 至少人们三番四次这样对我说。但我以为所有这些“材料”，未经查考的，都是可疑的，同在殖民地得到的一般。我可以相信，这个集体农场享有特权，比其他集体农场免纳百分之七出产税；还不说三十五至三十九卢布的丁税。

② 我把若干更详细的材料放在附录里面。我还可以引用其他的材料。但这些统计数字不是我的事情，纯粹经济问题出于我本行之外。此外，这些材料即使恰是别人供给我的，我也不能保证其真确。殖民地习惯，使得我对于“材料”不敢信任。最后，尤其因为这问题，专门家们讨论得很够了，我不再涉到这个问题了。

③ 在许多其他的集体农场更说不到私人住所问题；人们住宿在大寝室里。

可以互相交换的，他们由这家搬到那家，甚至自己都不觉得。^①如此当然容易获得幸福的！所以人们告诉我，集体农场人员都喜欢共同生活。他们的房间只是睡觉用的窝巢；他们的生活乐趣都是在俱乐部、文化公园，以及一切集会地方过的。人们还能期望什么更好的呢？全体的幸福只有解消各人个性才能得到。全体的幸福只有牺牲个人才能得到。为要获得幸福，那么随声附和吧！

•

^① 这个消灭个性的现象，使我设想，那些在大寝室睡眠的人，是比那些能够个性化的人，更少感受互相混杂和缺乏静默机会之痛苦的。在苏联似乎一切都有这个倾向。但这个消灭个性的现象可以看作一种进步么？在我，我是不敢相信的。

三

在苏联，预先规定，对于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许有一种以上的意见。而且那里的人，精神也被调练成这个样子，使得这个附和主义对于他们竟成为容易的、自然的、不觉得的，以至于我不敢设想这里面含有虚伪的成分。这些人果真是实行过革命的人么？不是的，这些是享用革命利益的人。每天早晨，《真理报》教他们以合宜知道，合宜思想，合宜相信的事情。超出这个以外，是不好的！以致人们每次同一个俄国人谈话，恰像同所有俄国人谈话一般。并非每个人都严谨遵从一个口号，而是一切都安排得使他不能离众独异。你试想想：这种精神调练是从最柔嫩的幼年时代就开始的！……由此可以说明那些非常的顺受；有时你，外国人，会觉得这种顺受是很可惊奇的；由此又可以说明某些幸福可能性；这使得你更加觉得奇异。

你替那些排队等待几个钟头的人诉苦么？但他们以为这样等待是十分自然的。面包、蔬菜、水果，你认为不好么？但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人家拿给你看的这些布料，这些物件，你认为丑陋么？但这里没有什么选择。除了去同那不大令人留恋的一个

过去时代相比较以外，一切比较之点都被除去了，如此你只好满足人家拿给你的东西了。这里，紧要的乃在说服人，说：人们是再幸福没有了；说：其他地方都没有这里幸福。要做到这个地步，唯有细心隔绝同外界一切交通这个方法（我所指的外界，乃是国境以外）。感谢这个方法，所以在相等的甚至显然低下的生活条件之下，俄国工人也自以为比法国工人更加幸福，更加幸福得多。俄国工人的幸福是由希望，信任和无知构成的。

*

我非常难以将这些感想整理成个系统，因为问题在这里是交互错综纠缠不清。我不是一个专门家，经济问题是在心理反映之下才引起我的兴趣的。在心理学观点上，我却能很清楚解释为什么要做成这样一个严谨封固的瓷瓶，为什么要把边境布置得密不通风：在新制度尚未成立而事情往后不会进行得更好时候，护持着这样一种幸福，对于苏联居民的幸福乃是有重大关系的。

我们赞许苏联有一种非常的冲动，向着教育，文化。但这个教育只教那些足使人的精神庆贺现状并称颂“福哉，苏联，唯一有希望的！”的东西。这文化都朝着一个方向，它没有一点无所为而为的东西，它积蓄着；不管马克思主义如何，这文化却差不多完全缺乏批评精神。我知道，那里人们替那个所谓“自我批评”大吹大擂。我在远地很钦佩，我想这批评若是认真而诚恳去做，一定要造成新奇效果。但我很快就不得明白：这批评除了一些告发和谏劝（食堂里汤煮得不好或俱乐部讲演厅内地扫不干净等等）以外，只在考究：这个或那个是合乎“路线”，还是不合乎“路线”？人们所讨论的并不是路线本身。人们所讨论者，乃

是要知道这件工作，这个行为，这种理论，是否符合于这个神圣路线。想将这批评推远一点的人，有祸了！在范围之内由你怎样批评都行，在范围之外则不允许的。历史上本有这类先例。

再没有别的东西比这个精神状态更有害于文化。后面我将解释这点。

苏维埃公民对于外国事物异常无知。^① 不仅如此，人们还说服他们说：其他一切国家都远不如苏联。这个幻想是有意培养的；因为如此，每个人；即使不甚满足的，也要歌颂这不使他陷于更恶劣地位的现行制度。

由此产生出一种自大心理。我举数例如下：

每个大学生规定学一种外国文。法文是完全被抛弃的。他们认为值得学的，是英文，尤其德文。我很惊奇，他们说得那么不好；法国一个中学二年级学生外国文比他们还要好些。

我们问过的人中，有一个给我们这样解释（用俄国话说，耶夫·拉斯特给我们翻译）：

几年以前，德国和美国还有几点可以给我们学习，但现在我们无需向外国人学习什么了。那么，说外国话有什么好处呢？^②

而且即使他留心外国发生的事情，他们首先留心的却是：外国人对他们作何感想。他们所关心的，乃在知道我们是否充分

① 或至少只知道那他们认为足以鼓励他们的东西。

② 看见我们没有隐蔽下来的惊愕之后，这学生确又添加几句话：“我懂得，现在我们都懂得：上面的话是一种不合理的推论。外国语文虽然再不能给我们学习到什么，却还可以当作教育工具的。”

称赞他们。他们所害怕的，乃是我们不十分知道他们的功绩。他们所期望于我们的，并不在于指教他们，而在于恭维他们。

这个儿童花园中的可爱的小女孩(这花园本是值得称赞的，同其他供给青年的设备一样)，包围着我们，拿些问题窘迫我。她们所要知道的，并不在法国有儿童花园与否，而是我们在法国是否知道苏联有这样美好的儿童花园。

人们给你提出的问题往往使人惊愕，使得我迟疑不敢在这里写出来。人家将以为是我杜撰的。当我说巴黎也有地下铁道的时候，人们带着怀疑神气微笑起来。难道我们只有电车，只有公共汽车么？……有个人问(这不是一个小孩，而是一个受教育的工人了)：法国有学校没有？另一个人知道得多些，耸耸肩：学校么，法国人有的，但人们在学校里鞭打小孩。他认为这话是有可靠来源的。至于法国一切工人都是非常不幸的，这点更无待说，因为我们还未曾“革命过”。在他们看来，在苏联以外尽是黑夜。除了几个无耻的资本家，一切的人都是在黑暗中挣扎的。

有教育的并很“杰出的”的小姑娘(阿迭克营地只容纳天才的小孩)，十分惊异起来，当话谈到俄国电影，我说《夏伯扬》和《喀隆施塔德》两片在巴黎大受欢迎时候。人们本来告诉他们，一切俄国片子都不准在法国开演的。告诉他们这话的人既然是他们的教师，我便看得很清楚，这些小姑娘怀疑的，都是我自己的话。法兰西人这么爱吹牛啊！

在人们刚向我夸耀的一只铁甲舰上(“完完全全在苏联制造的，这只兵舰”)与一群海军军官谈话时候，我冒昧地说：“我恐怕苏联的人知道法国的事情，还没有法国人知道苏联事情那么清

楚。”座中起了一阵喃喃声音，显然是不以为然的，说：“《真理报》对什么事情都载得很详细。”忽然有个人，离开人群，喊道：“要叙述苏联所做的新的，美的和伟大的事业，全世界所有的纸张都还不够用。”

上面说的阿迭克模范营地，这个培养模范儿童、神童、小才子、小学士的天堂（为这原故，使我更喜欢得多的是其他的儿童团营地，那里虽然朴素些但较少贵族气），有一个十三岁男孩；他是从德国来的，若是我没有听错的话，但早已给苏联调练过了；他引导我穿过他所赞美不置的公园。他像背书般说：

你看：这里，过去不久什么都没有。……忽然有了这个梯子！苏联到处都是这样：昨日什么都没有，明日什么都有。你看：那里，那些工人，他们怎样做工！而且苏联到处都有这类的学校和营地。自然不是完全同这里一样好的，因为这个阿迭克营地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斯大林特别关心这个地方。来到这里的小孩都是超凡出众的。你等一会可以听一个十三岁小孩奏乐，他将是世界上最好的提琴家。他的天才在苏联这样受人看重，人们赠给他一个历史上有名的提琴，一位旧时很驰名的造琴家所造的提琴^①。还有这里：你看这堵墙！有人敢说它是十天之内筑成的么？

这小孩的热情显得这么诚实，以致我不忍将这堵仓促筑成的墙早已现出的裂缝指给他看。他只愿意看，只能看那足以助

^① 这谈话之后不久，我就听到这神童用他的斯特拉狄瓦留斯提琴，弹奏帕格尼尼的几首乐曲和库诺的一首杂曲；我应当承认，这弹奏是使人毛骨悚然的。

长他的骄傲的事物；他在兴奋中还添加一句说：

“连小孩都要惊异的！”^①

*

这小孩子所说的话(别人教他说的,也许是背熟的),我听着很有意思,所以当晚就记录下来,现在详细写在这里。

然而我不愿使人信为我从阿迭克没有带来其他的回忆。不错:这营地好极了。一个巧妙地整顿过的斜坡,分做一层层坪地由高而低直达海滨。凡是为小孩子幸福、卫生、运动、娱乐等所能想象得到的设备,都聚集在并排列在坪地和斜路上面。所有小孩都表现健康,幸福。他们失望得很,当听到我们说:我们不能留到夜里:他们已经准备升起传统的营火,已经在下面花园树上挂起彩旗,来欢迎我们了。本来准备晚间举行的各种游艺,唱歌跳舞等,我要求都在五点钟以前作完。回去的路程是很远的,我坚持入夜以前必须回到塞瓦斯托普城里。这事做得很对,因为陪我到那里旅行的欧珍·达比就在那晚生病了。起初一点看不出来,他能够完全享受小孩子们为我们举行的种种游艺;尤其那个可爱的塔吉斯坦地方小姑娘的跳舞,她叫塔马尔,我相信她就是盖满莫斯科墙壁那些图画上斯大林抱吻的女孩子。这跳舞的好看和这女孩的美丽是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是苏联旅行中最美的纪念之

① 我同欧珍·达比谈起这自大心理,他本是个极端谦虚的人,对此有特别深切的感想。他正在重读《死魂灵》第二册,便拿此书给我,指着端书果戈理一封信中间如下一段要我看:“我们中间好多人,尤其青年人,都过分地夸大了俄国人的优点;他们不去发展这些优点,反而只想拿来夸耀,拿来对欧洲人叫喊:‘外国人哪,你们看哪,我们好过你们哪!’——这种骄傲是非常有害的。既激恼别人,又伤害自己。世上最好的行为,将因自夸而低贱……。在我,则与其矜夸,毋宁暂时的败兴。”——果戈理所痛恨的这个俄国式骄傲,却受今日的教育所发挥和鼓励。

一”，达比对我说，我跟他一样想。这是他的最后一天幸福日子。

索契的旅馆是最娱人的一个，它的花园是很美的，它的浴场是很舒适的，但那些沐浴旅客，就要我们承认法国没有这样好的浴场。为礼貌原故，我们忍住，没有告诉他们；法国有比这好的，有比这好得多的。

不；这里可钦佩的，却在于这个半豪华的舒适的旅馆，是交付民众使用的，——倘若住在这里的人不又是特权分子的话。一般说来，最有功绩的人得受优待，但有个条件，即他们须是随声附和的，须是“在路线之内”；惟有这种人才享有这个权利。

在索契可钦佩的，却是城市四周无数的休养院，一切都是设备得极好的。所有这些都是为劳动者而建筑的，这是很好的。但就在近旁，人们看见那些用来建筑新戏院的工人时，心里更觉得不舒服，他们工资很少，居住在卑陋的宿舍里面。

在索契可钦佩的，却是奥斯特洛夫斯基。（见附录）

*

若是我称赞索契旅馆，那么对于苏虎姆附近的西诺卜旅馆，我将说什么话呢？那是好得多了，而且可以拿来同外国最美的，最好的和最舒适的沐浴旅馆相比较。它的美丽花园是旧时代留下来的，但它的房屋却是最近才建筑的；布置得巧妙；无论外观或内部都是最妙的；每个房间都有浴室，都有专用的平台。家具是优雅的，烹饪是上等的，是我们在苏联尝过的最好的烹饪之一。西诺卜旅馆是尘世间人类觉得最接近于幸福的处所之一。

旅馆旁边设有一个苏维埃农场，为供给旅馆食品之用。我赞许其中一个模范的马厩，一个模范的畜栏，一个模范的猪圈，尤其一个最新式的大鸡埘。每只母鸡脚上有一个环子，标着号

码；母鸡生蛋期间都有详细登记；每只母鸡有自己生蛋的小箱子，生蛋时关进里面去，生过之后才放出来。（我就不懂：这样小心经营，而我们在旅馆吃的蛋都不是最好的。）我再说一点：人们进去这些地方，须将双脚踏在染有药水的地毯上使皮鞋消毒。牲畜就在旁边经过；那是很不好的。

人们若是跨过那划定苏维埃农场界线的壕沟，便到了一列卑陋的房屋。那里每四个人合住一间长二米突半宽二米突的房子，每人每月两个卢布租金。苏维埃农场所设饭馆，每餐就值二个卢布，这种奢侈，每月只得七十五卢布工资的人，是享受不到的。他们面包之外还有一条干鱼，就觉得满足了。

*

我并不反对差异工资制；我也同意：这办法是必需的。但生活条件之差异应有方法补救。我害怕，生活条件差异不惟不减轻，反要加重。我害怕，不久会形成一种满足的劳工资产阶级（当然是保守性的），可以同法国的小资产阶级并驾齐驱。

到处我都见到这个预兆。^① 我们既然不能——可惜！——

① 新近禁止堕胎的法律，使得那些工资不够供养一个家庭的人，恐慌起来。这法律也使得其他的人恐慌起来，但那是由于别的理由的，即：当初不是答应过，这个法律将经过一种全民表决，将征询民众意见，以决定是否公布及施行么？广大多数人（或公然或暗中）宣布反对这个法律。人们不理睬公众的意见！这法律还是通过，当时引起几乎普遍的惊愕。报纸自然只发表赞成的文章。但我同好多工人作私人谈话时候，对这问题，我只听到一些怯怯的咒骂，只见到一种埋怨的无可奈何的表示。这个法律，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公平的。他回答那些很可惋惜的滥行。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于更早的另一个法律，禁止同性恋爱的，又作何感想呢？这法律将犯此罪的人都算作反革命者（因为直至于性的问题，非附和主义也是受法律制裁的），判以五年流刑，若不悔改，仍须判刑。

怀疑；虽然经过革命，好多人的心还是蕴藏着资产阶级本能。卑鄙的、享乐的，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因为人的改造不是可以纯然从外面做到的），所以我十分担忧，看见这类本能，现在在苏联给最近几种决议所间接提倡着，鼓励着；这类决议在法国获得使我们惊心的喝彩。跟着家庭（当作“社会细胞”），承袭和遗赠之恢复，个人利益和私产之兴趣就抬头起来，压下同志友谊，均分财物和共同生活之需要。并不是人人如此，无疑的；但好多人确是如此。于是人们看见形成了一些社会层，即使不是阶级；形成了一种贵族。这里我说的不是功绩上和人格上的贵族，而是会打算盘的附和主义的贵族，他们到下一代就要变成金钱的贵族了。

我的恐惧是夸张了么？我希望是夸张的。何况，苏联过去已对我们表现过；它是能够突然转变的。但我恐怕，为扑灭今日治理者所夸奖的和鼓励的这个资产阶级化过程，不久就有一个突然转变之必要，像当初停止新经济政策时候那么剧烈。

看到那些属于或自认属于“好的方面”的人，对于“底下人”之轻蔑或至少漠视，怎能不令人痛心呢？“底下人”，譬如仆役，^①小工，男女“日工”，总之：穷人。苏联没有阶级了，这我知道。但有穷人。有很多的穷人；多得很，我却希望不再看见穷人，或者确切点说：正为不要再看见穷人，我才到苏联去。

^① 由此反映出来，便是仆役何等谄谀，何等卑躬屈节；我说的不是旅馆的仆役，那大多数是极知自尊的，然而对人还是很恳挚的，我所说的乃是那些替治理者，替“负责人”做事的仆役。

还应当说一点：那里慈善事业以及简单的布施已经不流行了。^① 国家负担这事情。国家负担了一切，旁人就无需救济了，这我也知道。由此产生出人与人之间关系上某种冷酷，虽然大家都讲同志友谊。自然，这里不是指同等人的关系而言；但在那对上面说的“底下人”的态度中，自大心理却是十分猖獗的。

*

这个小资产阶级精神状态，我怕在那里渐渐发展起来；在我看来，这是彻底反革命的。

但在今日苏联人们所称为“反革命”的，却完全不是这个，甚至却是差不多同这个相反的。

今日人们所视为“反革命”精神的，正是同一个革命精神，正是当初摧毁半腐朽的帝俄旧制度的那个发酵素。人们喜欢能够设想，一种洋溢于外的人类爱，至少对于正义的无上需要，充满了人的心。但是革命一经完成了，胜利了，稳定了，于是就再没有人理会这个了，于是鼓舞当初革命家的那些感情，现在就成为障碍物了，有如服务过了的事物一样。我拿这些感情去比拟人们建筑拱门时候所用的支柱，一旦拱门建筑好，这些支柱就被丢开了。现在革命胜利了，现在革命稳定下来了，驯服了，妥协了，有些人或者说：聪明了，于是那些还受这革命酵素所鼓舞的人，那些认为所有这些一步一步的退让都是变节的人，便成了障碍物，便受人鄙蔑，被人消灭。那么与其玩弄字眼，宁可承认革

^① 然而我急需添说底下的话：在塞巴斯托普公园里有个残废的孩子，只能扶着拐杖走路，在游人坐的长凳前面经过。我长久观察他，他在求乞。他向二十个人求乞，有十八人给他钱；但无疑，给钱的人，只是为他的残废而感动的。

命精神(甚至干脆地:批评精神)业已不流行,业已不需要,——不更好些么?现在人们所要求的,乃是顺受,乃是附和主义,乃是赞美苏联所行的一切;现在人们所努力去求取的,乃是不使这赞美成为无可奈何的,而要使之成为情愿的,甚至热烈的。最使人惊奇的,便是人们居然达到这个目的。他方面,最少的抗议,最少的批评,也要受最严重的处罚,而且不久就被压服下去了。我怀疑:今日在其他的国家,即算在希特勒的德国吧,“精神”能比这里更少自由、更低头、更恐惧的(更受恐怖所吓怕了的)?

四

在苏呼米附近一家精炼煤油工厂里(那里一切都是设备得很好的,食堂、工人宿舍、俱乐部;至于工厂本身,我是凭信任称赞的),我们走近了“壁报”,这依照习惯贴在俱乐部一个大厅里面。我们没有工夫读完所有的文章,但在“红色救济”一栏内——原则上,外国新闻都登在这栏内——我们觉得奇异,我们竟找不到一点关于西班牙的提示,而那几天从西班牙来的消息却是令人忧惧的。我们没有隐藏我们的有点伤感的惊讶。人们感觉一点轻微的不安。人们感谢我们指出这个缺陷来:以后一定要注意这个的。

那天晚上,宴会。照例有无数次举杯祝贺。当人们为了全体客人和每个客人的健康都干杯以后,耶夫·拉斯特站起来,用俄国话提议:大家为西班牙红色阵线之胜利干一杯酒。人们热烈拍掌,但我们看来,似乎带有某种程度的拘束;立刻,像回答一般:为斯大林而干杯。轮到我时候,我举起我的杯子,恭祝德意志,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政治犯的健康。人们拍掌,这次则是十分真诚的;人们碰着杯,喝着。以后,立刻又是:为斯大林而干

杯。可见对于受法西斯主义戕害的人，在德国以及其他地方，人们是知道采取何种态度的。至于西班牙的纠纷和斗争，那么一般的和特殊的意见正在等待《真理报》的训令，《真理报》此时尚没有表示。还未知道应当怎样思想以前，人们是不敢冒昧表示意见的。过了几天以后（我们已经到了塞瓦斯托波尔），这才有一种广大的同情波浪，从红场出发，弥漫于各地方报纸，到处也进行自愿的捐输，以援助政府军。

*

在这工厂的办公处，有一幅象征性的大图画很引起我们注目；人们看见：中央，斯大林正在说话，政府要人分坐在他的左边和右边，正在拍掌。

斯大林的肖像到处皆是，他的名字说在各人嘴里，无论什么演说都必带有称颂他的话语。尤其在格鲁吉亚，我无论进入什么房子，哪怕是最贫苦的最卑陋的吧，都看见斯大林的肖像挂在墙上，无疑地在从前挂神像的地位。崇拜么，爱么或惧怕么？我不知道。无论何时何地都见着他。

*

从梯弗里斯到巴统旅途上，我经过戈里，诞生斯大林的小城。我想，在这里打封电报给他，以答谢苏联的接待，那无疑是合礼的，——我们在苏联到处受人祝贺、欢迎，待同上宾。我再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机会了。我叫汽车停在邮局门口，拿出电报稿子。大意这样说：“在我的美好旅行途中经过戈里的时候，我感到恳挚的需要，向你致敬……”但这里，翻译的人停住了：我不能这样说话。这“你”字是不够的，倘若这“你”字指的是斯大林，这是不合礼节的。应当添加一点什么。当我现出一点惊愕的时

候,人们就互相商量。人们向我提议添加:“你,劳动者领袖”,或“人民导师”,或我记不起来的别的什么。^① 我认为这是荒谬的;我抗议说斯大林自己是超出这类胁肩谄笑之上的。我争论没有用。没有办法。人们只肯在我同意添加这类字句条件之下,接受我的电报。现在既然是翻译问题,而这翻译,我自己又不能审查的,我争得厌倦之后,只好屈服了,同时卸除了一切责任,并愁苦地想到这类事情将助成在斯大林和人民中间划下一条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也发现,我在苏联几次演说,^②翻译时,常有类此的修改,因此我宣布:在我此次旅行中,用俄文发表的任何文章,我都不承认是我的。^③ 就在这里宣布了。

然而我不愿将这类细节上的更改,大部分又是无心的更改,看作含有什么恶意;毋宁说是表示帮助他人的愿望,这他人不熟悉当地习惯,却极愿使得自己言辞和思想不与当地习惯相乖违。

斯大林在制订第一次和第二次五年计划时候,表现出那样聪明,那样灵活,来一步步地修改他所认为应当修改的事情,——使得人们自问:比这更坚定的恒心是否可能的;这个渐次脱离原初路线,这个离开列宁主义,是否不是必要的;倘若再

① 似乎我杜撰出来的,不是么?不,可惜!请大家不需向我解释,说这是几个笨拙然而热心的下级人员所干的事情。不是的。跟着我们一道,参加这个讨论的,还有好多地位颇高而且无论如何对于“习惯”都十分熟悉的人物哩!

② X给我解释说,照这里习惯,我所用的“命运”二字若指的是苏联命运,就应当加上一个形容词。我终于提议加上“光荣的”这个形容词,X说这是可以得到各方面赞同的。反之,他请求我删去那加在“君主”头上的“伟大的”三个字。君主不会是伟大的。(见附录)

③ 人们冒充我的声口,说:法国青年不了解我,不爱我;又说:从今约定,除了给民众之外,我再不写作什么了!等等。

坚持原初路线下去，是否非要求民众一种超人的努力不可。无论如何，这里面总有令人左右为难之事。若不是斯大林使人失望，便是人，便是人类使人失望。人们当初所企图的，所要的，经过这么多斗争，流过这么多的血以后所自以为快要得到的，——这些难道是“超出人力以上的事情么”？还须等待么，听天由命么，将希望放到更遥远的未来去么？以上便是人们在苏联苦心焦虑研究的问题。这问题来到你的脑筋里，已经够你受的了。

经过这么多月，这么多年的努力，人们应当有权利自问：他们终于可以抬起一点头来么？——额头从来未曾比这更低屈过的！

*

说是离开了原初理想，——这一点是绝无可置疑的。但人们同时可以怀疑到：当初人们所要的本是不可能的么？这里面是倾跌么？还是恰当地和无可争论地顺应于那些非所逆料的困难？

这个从“神秘”到“政治”的过渡，无可避免地要造成一种“堕落”么？因为这里不是理论的问题；这里人们来到实践范围了；应当计及“人事的，纯人事的”，应当计及敌人。

斯大林的多量决议，最近尤其差不多一切决议，都同德国有关，都由于惧怕德国而产生出来。家产，私产和遗产之恢复，可由此得到一个有效的解释；原来是要给苏维埃公民以一种感情，有个人利益可以保护的感动。但如此，渐渐地，原初的冲动就麻木下来了，消失了，而眼光就停止朝前面看了。人家将告诉我说：这是必要的，紧迫的，因为一个侧面攻击会使得事业塌台。但顺应又顺应，事业就自己衰败了。

另外一种恐惧，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和所谓“反革命精神”。因为有些人不肯将这类妥协设想为是必要的；所有这些顺应，都被他们看作失败。这个离开原初路线的事实，说是可以解释的，可以求原谅的，也许，他们眼睛注意的，却是这个事实本身。但今天，人们所要求的，乃是顺从精神，乃是附和主义。凡是不肯宣布满意的人，都要被视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如此，人们要自问：列宁有灵，他今日还肯回到这个地球上来么？……

*

斯大林无论什么时候都对的，这话等于说：斯大林无论什么事情都对的。

*

人家允许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离那还远得很。不错：专政，显然的；但那是独夫的专政，而不是无产者共同的专政，不是苏维埃的专政。这里不应当抱幻想，应当干脆承认：这不是人们所要的。再进一步，我们将要说：这恰好是人们所不要的。

在一个国家之中消灭反对党派，或简单不让其发言，不让其产生，——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这要激起恐怖主义的。若是国内一切公民思想都是一致的，这对统治者自然很便利。但在这个贫乏前面，谁还敢谈什么“文化”呢？没有对抗力量，“精神”怎能不偏向一方发展呢？所以我想，这是最聪明的事情，去倾听敌党的意见，必要时扶持敌党，一面防止他们做祸害事情：打击他们，但不消灭他们。消灭反对党派，——这点，幸而无疑的，斯大林并没有多大成功。

人类不是简单的，应当明白此点；一切简单化，统一化，

以及从外部去简约之企图，永远是讨厌的，有害的和可笑的。因为亚达里的麻烦事情总是逃脱的以利亚辛；希律的麻烦事情总是逃脱的神圣家庭。

一九一〇年，我写过这样的话。^①

^① 见《新的托辞》第一八九页。

五

未到苏联去以前,我写过如下的话:

我相信:一个作家的价值是与鼓舞他的革命力量相联系,或者确切点说(因为我没有那样糊涂,只承认左翼作家有艺术价值),是与他的反抗力量相联系的。这个力量存在于波秀哀、麦多布里杨,以至今日的克罗德尔,正如存在于莫里哀、伏尔泰、雨果及好多其他的人一般。在我们的社会形式当中,一个大作家,一个大艺术家,本质上是反对附和主义的。他逆潮流前进。这话拿来对但丁说,对塞万提斯说,对易卜生说,对果戈理说……都是真的。这话拿来对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作家说,似乎不是真的;约翰·阿丁顿·塞蒙士说得很好:“这时代戏剧作家所以这样伟大……,乃是因为他们(作家们)生活和写作完完全全同整个民众一致的。”^①这话拿来对索福克里斯说,无疑不是真的;对荷马说,也一定不是真的,在我们看来,希腊自身就是假手于荷

① 见 John Addington Symonds—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Morsid Sesies.

马而歌唱。这话或者会不是真的，到了将来，那时……但正因为这个原故，我们的眼光才带着这么忧愁的疑问转移到苏联去呀！革命的胜利，将允许它的艺术家受着潮流所涌动么？因为问题提出来：若是转变过后的社会国家，夺去了艺术家一切反抗动机，那将成什么样子呢？倘若艺术家只好让潮流涌去，而无所用其起来逆抗潮流，那他将做什么事情呢？无疑，在还有斗争，而胜利尚未完全得到保证时候，他可以描写这个斗争，而且以战士资格助成其胜利。但以后……我到苏联去以前，便是这样自问。

*

“你懂得的，”X 给我解释，“群众所要求的绝不是这类东西；我们今天所要的也绝不是这类东西。他从前作过一部很杰出的很受欢迎的舞曲（“他”，指的是肖斯塔可维奇；有些人对我谈起他，总是用这种普通谈起天才者才用的口气）。但是倘若民众看完一部歌舞剧，走出戏院的时候，不能哼着剧中的调子，那么这剧有什么用处呢？（哦，原来如此！可是 X——他自己也是个艺术家，而且很有教养的——在说这话以前却只同我说些其他的伶俐的话。）今天我们所要的，乃是一切的人都能懂的作品，而且要立刻能懂。肖斯塔可维奇自己若是不明白这点，人家就会用再不去听他这一办法，去使他明白的。”

我反对这话，我说：最美的作品，以至于后来变成最通俗的作品，有时起初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赏鉴；我说：贝多芬自己……于是我拿一本书给他，这书我刚带在身边：请你读这段：

好多年以前，我（这是贝多芬在说话）也在柏林举行一次音乐会；我贯注了全神，以为这次一定有点成功，我希望

得到有力的喝彩。可是你看：当我把我的最好的灵感都演奏出来时候，竟连一点欢迎声音都没有。（《歌德通信集》第二卷 287 页）

X 同意我，认为一个贝多芬者在苏联遭受这样的失败，是难得抬起头来的。

“你看，”他继续说，“在我们这里，一个艺术家首先须在路线以内。否则，最美妙的才能也将被视为‘形式主义’。是的，这个名称是我们找出来，用以安置于我们所不想看所不想听的东西头上的。我们要创立一种新的艺术，同我们这伟大民众相配称。今日艺术应该是民众的，否则不是艺术。”

“如此，你们将驱迫你们的一切艺术家都入于附和主义了，”我对他说：“那些最好的艺术家，是不愿贬低或仅屈抑他们的艺术的。你们将强之缄默。你们自以为替文化服务，荣耀它，保卫它，但它将反对你。”

于是他抗议，说我的推论是资产阶级式的；说他确然相信：马克思主义既然在好多其他领域成就了如此伟大的事业，一定也能产生艺术的作品。他添加几句说：现在所以没有这新作品产生，乃因人们还重视那些属于一个完全过去时代的作品。

他愈说下去声音愈高；他似乎在讲演或在诵读论文。我们谈话是在索契旅馆的厅堂里。我离开他，没有回答他的话。但过了一会，他到我的房间找我，这回低声说道：

“哦，我懂得的……但是刚才‘人们’听着我们谈话……而且不久我的展览会就要举行。”

X 是个画家，他正要展览他的最近画成的作品。

*

当我们来到苏联时候，那场关于形式主义的大辩论还在余波未息。我努力去了解人们所谓“形式主义”究竟指的什么。结果我觉得是这个意义：任何艺术家，若是多注意一点形式，少注意一点内容，便要被人指责为形式主义。我们得赶紧添加一句：所指的内容，值得去注意的（或确切点说：得受容许的），只是当这内容朝着一定方向时候。艺术作品若是全无倾向，因此全无“意义”（“Sens”——这里，我是拿字眼做游戏^①），就要被判定为形式主义的。说实在话，我写这“形式”和“内容”几个字时，不能不觉得好笑。但若是看到这个不合理的区分将决定了批评时候，人们毋宁是要哭的。这也许在政治上有用；但你们在这里就不要谈起什么文化吧。从批评不能自由行使时候起，文化就处于危殆状态了。

在苏联，一件作品无论如何美，若不是在路线之内，就要受排斥的。美，被人看作一种资产阶级的价值。一个艺术家无论如何天才，若不是在路线之中工作，公众的注意就要从他转移开去，或被别人从他引开去：人们所求于艺术家，所求于作家的，是要他随声附和；做到这点以后，其余一切都可给他了。

*

我在梯弗里斯看见一个当代图画展览会；不去说到它，也许是件慈悲的事情。但总之这些艺术家都达到他们的目的了，这目的就是在感化，说服，求取同意（斯大林生活上一些片段用作这些图画的主题）。哪，一定的，这些人不是“形式主义者”！不幸的乃是他们再不是什么画家了。他们使得我联想起阿波罗：

^① 按 Sens 一字，法文有“方向”和“意义”两个意义。——译者

这位日神为替亚默特服务，不得不熄灭一切光线，以此他就做不出一点有价值的事情，——或至少与我们有关的事情。但苏联，无论革命前或革命后，在造型艺术方面都没有什么十分可观的。我们还是谈文学去吧。

“当我年轻时候，”X对我说，“人家介绍我们读这本那本书，禁止我们读这本那本书；我们的注意自然是向着禁止的书的。现时最大的差别，就在于青年人只读人家介绍他们去读的书，甚至不愿意去读其他的東西。”

所以，举个例说，陀思妥也夫斯基今日找不到读者，而人们不能正确地讲：究竟是青年人离开了他，还是别人使得青年人离开了他；——好多人的头脑都是经过调练的。

“精神”若是必须符合一个口号，那它至少会感觉到它是不自由的。但它若是被调练成这个样子，使得它再不等待什么口号而作出回答，那它就连自己被奴役的意识也丧失了。我相信，人们倘若告诉苏维埃青年，说他们思想不自由，那他们是要十分惊奇并提出抗议的。

某种事物的价值，往往只当我们失却这事物之后，我们才认识到；因此，游过一次苏联（或游过一次德国，那是不待说的），就可以使得我们估计到我们在法国还能享受的那个无可估计的思想自由价值，——可是时常给我们滥用了。

在列宁格勒，人们请我准备一篇小演说，在文学家和大学生们的一个集会上说。我到苏联那时还只八天，正在入境问禁时候。所以我把演说稿子拿给X和Y审查。人们立刻就给我暗示：这篇稿子是不在路线之内的，而我预备要说的话是不合时宜的。果真如此！以后我自己都明白了。总之，这篇演说，我是没有机

会去宣读了。下面就是：

人们时常问我关于苏联现在文学的意见。我要解释，为什么我一向拒绝表示我的意见。这样，同时又允许我修订高尔基下葬日我在红场演说中某一点。我在那里谈起了苏维埃共和国胜利所提出的“新问题”，我说：将这些问题提出于历史并供我们考虑，这绝不是苏联的最小光荣之一。对于我，文化的未来既然密切联系于这些问题之解决，那么再谈到那上头来，并加以若干修订，这不会是没有用的。

.....

大多数人，甚至最好分子所组成的，从来不会叹赏一个作品中那些新颖的、潜能的、使人惶惑的东西，他们只叹赏那些他们早能认识的东西，换一句话说：平凡的东西。正如有资产阶级性的平凡，也有革命性的平凡。应当明白这点。应当知道：一个艺术作品的深刻价值及其传世理由，并不是其中用来附和某种学说的东西（即算这学说是最健全的，最好的吧），而是其中提出新疑问并预告未来疑问的东西，而是回答那还未曾提出的问题的东西。我很害怕：好多作品，现在是因为含有一种纯粹马克思主义精神而得到成功的，不久之后或将在那些将要来的人鼻子面前发出一种难忍的病床臭味；我相信：最有价值的作品将唯一的是那能够排除这类顾虑的作品。自从革命胜利了，安定了和凝固了以来，艺术便遭遇到一种可怕的危险，几乎同受法西斯主义最残暴压迫的那么重大的危险：即是一种正统的危险。艺术屈服于正统，艺术就完了，哪怕这正统是最健全的学说。艺术

沉落于附和主义之内。胜利的革命所能贡献和所当贡献于艺术家的，首先是自由。没有自由，艺术就丧失了意义和价值。

瓦尔特·惠特曼为林肯总统之死写了一篇最美的诗歌，他的最美的诗歌之一。但这篇自由诗若是被迫而写的，惠特曼若是奉了命令及附和一种已定的经典，则这篇哀歌将失去它的德性，它的美；或宁可以说：惠特曼将不会去写它。

既然最大多数人的称许、喝彩、欢迎和拥护，自然趋向于那为群众所能立刻接受和赏鉴的东西，即附和主义，那么我就担忧地自问：今日光荣的苏联之中，会没有一个波德莱尔，一个济慈或一个乐波，默默无闻地生活着，挣扎着，正由于他的价值，而不能引起人注意么？然而我关心的却是这类的人，因为明天成为最伟大的，正是当初受人轻视的这些乐波，这些济慈，这些波德莱尔，甚至这些斯汤达尔啊！^①

① “但是，”他们将说，“那些济慈，那些波德莱尔，那些乐波，甚至那些斯汤达尔，今天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在我们眼中看来，那些人的价值只在于反映垂死的和腐朽的社会那一点，他们就是这社会的悲惨的产物。若是他们不能产生在今天新社会里面，那是他们的不幸，而是我们的大幸，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从他们以及他们一流的人学习的。今天能够教育我们的作家，乃是完全顺应于这新社会形式的人；凡是阻害上面那些人的，反而可以激励我们这类的作家。他们是会受称赞、庆贺和喝彩的。”

“如此说来，我恰好相信：这些喝彩家的著作是很少价值的；为发展自己的文化，民众去读他们，并没有什么用处，为发展文化，最好的，乃是那些促人反省的东西。至于所谓镜子文学，即那只限于反映（一个社会，一个事变，一个时代）的文学，那我已经说过我的意见了。自己照镜（和自己赞美）也许是一个很稚幼的社会的头一个关心事情，但如果这个最初的关心变成了唯一的、最后的关心，那就未免太可惋惜的了。”

六

塞瓦斯托波尔,我的旅程的最后阶段。苏联无疑有比这更有趣或更美的城市,但没有比这使我如此留恋的。这里比苏呼米或索契较少准备些,较少选择些,我在这里重新找到整个俄国社会,俄国生活,连同它的缺点,它的劣迹,它的痛苦(可惜!),在它的胜利,它的成绩旁边,——这成绩使得人或允许人得到更多的幸福。随着日子变化,光明减淡黑暗,或者反之加浓黑暗。但正如看到最光明的东西一样,在这里,我也能够看到最黑暗的东西;一切都使得我——有时痛苦地——留恋于这个地方,这个联合的民众,这个新水土,它扶助未来,意外事情也能够在这这里爆发出来。……我所离开的,就是如此模样的国度。

*

但已经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烦恼,窘迫着我了:回到巴黎之后,我怎样说才好呢?怎样回答我所预感的问题呢?人们一定等待我的一贯的判断。怎样解释,我在苏联,一时这么热,一时又这么冷呢(精神上的)?重新宣布我的爱的时候,难道应当隐匿我的异议么?应当称赞一切而以此扯谎么?不。我很明白:

若是我这样做,我反将贻害苏联自身,同时也贻害它在我们心目中所代表的事业。但若把这二者联系得太过于密切,以至于将我们在苏联所惋惜的事情硬派给那个事业去负责,——那也是一种很严重的错误。

*

近来,苏联给予西班牙援助这事,对我们表明:苏联还能够重新振作起来的。

苏联还没有终止来教训我们并使我们惊奇。

附 录

高尔基下葬时在莫斯科红场的演说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

马克西姆·高尔基之死，不仅使得苏维埃诸国悲伤，全世界也是如此。由高尔基传达给我们的俄罗斯民众的大声疾呼，已在最遥远的国土获得了回应。所以今天，我不仅表示我个人的悲哀，而且表示法国文学界以及欧洲乃至全世界文化界的悲哀。

文化，好久以来就是某一特权阶级的御用品了。要学习知识，先须有闲暇；先须有一个阶级劳苦工作，然后极少数人才能享用生活，求取知识；文化，文学和艺术的花园，仍然是私有财产，唯一能够享受的，并不是最聪明的人，最能干的人，而是那些从幼年起便丰衣足食的人。人们无疑可以看出智慧并非必然伴随财富而来的；在法国文学史中，莫里哀，狄德罗，卢梭，都是平民子弟出身，但他们的读者仍是那些闲暇的人。

当十月大革命激发俄国极下层群众起来时候，西方的人就

说,甚至相信:这个从底下掀起的大风浪将淹没文化。文化不再成为一种特权时候,岂非遭遇倾覆危险了么?

正为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各国作家在一种紧迫使命的感情中团结起来:不错,文化遭遇危险了,但这危险并非从革命的和解放的势力方面而来,反是从那企图压服并击破这个势力而把精神蒙蔽起来的党派方面而来。危害文化的,乃是法西斯主义,乃是狭义的、人为的民族主义,这个主义与真实的爱国主义,与那对自己国土的深切的爱,是没有相同之点的。危害文化的乃是战争,而那种传播仇恨的民族主义必然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战争。

我本来应当到现在伦敦开会的“国际保卫文化大会”当主席去的。关于高尔基健康的令人不快的消息,迫得我匆忙赶到莫斯科来。在这饱经光荣的或悲惨的事变的红场上,在这千万人目光所注视的列宁坟墓前面,我以那在伦敦集会的作家名义和我自己名义,高声宣布:拥护、保卫并重新荣耀文化之使命和责任,现在落到国际革命伟大势力肩上了。文化的命运,在我们精神中,是与苏联本身命运相联系的。我们拥护苏联。

犹如在各民族特别利益之上,有一个共同的大需要将各国无产阶级沟通起来;同样,在各个民族文学之上,也开展出一种文化,由各国特殊文学中真正活的和人类的东西所构成的文化:“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斯大林这样说。

我时常说,一个作家愈有特异性,则愈能引起普遍的兴趣,因为他表现最个人性的事物,由此就表现最人类性的事物。俄国作家没有一个比马克西姆·高尔基更带俄国人性。俄国作家没有一个人说的话,比高尔基更受全世界的人所倾听。

昨天，我参加民众的队伍，在高尔基灵柩面前经过。这无数女人、小孩及形形色色劳动者，是我百观不厌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就是他们的代言人和朋友。我含着忧愁，想到，这些群众若在苏联以外其他国家，是不许来到这个大厅的：恰是他们，要在文化花园面前碰到一面可怕的牌子，写着：“私人产业，闲人免进”。我的眼睛充满了泪珠，当我想到，在他们看来是那么自然的事情，而在我，西方人看来，却是那么奇异的时候。

我想，在苏联一定有了十分惊人的新事业。自今以前，世界一切国家中，凡是有价值的作家，或多或少，几乎都是一个革命者，一个战士，或是有意识的，或是非意识的，或是公然的，或是暗中的，他都为反对某件事情而思想而写作。他安置一种反抗的叛逆的酵素到人的精神和心里面去。法官，政府，权威和传统，若是稍有远见的，一定毫不迟疑地把他看作敌人。

现在，在苏联，却破天荒第一次提出完全不同的问题：即一个革命作家再不是一个反抗的人了。^①恰好相反，他适合大多数人的愿望，全民众的愿望，尤其可赞许的就是适合民众领导者的愿望。这问题的消灭或转变，起初使得人头脑晕眩。但这一点将不是苏联及其继续震动我们旧世界的奇妙事业的最小光荣之一，即是：在新的天堂中，连同新的星宿，兴起闻所未闻的新的问题。

马克西姆·高尔基有这个奇特的和光荣的命运，即他把这新世界同过去时代联系起来，并同将来时代联系起来。他认识了前日的压迫和昨日的悲壮的斗争，他也曾强有力地助成了今日

^① 这里我说错了，可惜不久，我就承认这个错误。

的和平而荣耀的胜利。他把他的声音借给那些还不能自己发言的人，和那些因为他而从此能自己发言的人。

从今以后，高尔基属于历史的了。他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找到他的位置。

对莫斯科学生的演说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诸位同志，苏维埃青年的代表人！我愿意你们明白，为什么，站在你们中间，我的感情是如此激动。为这原故，我须得对你们谈一谈我自己。你们表示给我的同情，使得我非如此做不可。这个同情，我相信，我配得领受一点的。我想，我这样想和这样说，并非过于自夸。我说我配得，乃是因为我晓得等待你们。我等待好久了，但带着信任心，带着这个确信，认为总有一天你们会来的。现在你们果真在这儿了，你们的欢迎多多补偿了我当初所遭遇的长期冷静、寂寞和不被人了解的生活。确然不错，我是把你们的同情当作真实的补偿的。

当《共同》杂志，由路易·阿拉贡同志的倡议和主持在巴黎创办时候，曾向法国每个作家征求意见：你为什么人写作？我没有回答这个征询，我也向阿拉贡解释过我为什么不回答。我所能够说的话，却属真理，虽有自夸嫌疑，就是说：我永远是为那些将要到来的人写作的。

喝彩不喝彩，我都不在乎；当时喝彩只能从资产阶级方面来的，——我是这个阶级出身，而且，不错，现在还是这个阶级一分

子,但我异常鄙视它,恰好因为我对它认识得很清楚,而且我觉得,我身上所有的好的方面都是起来反对它。我的身体既然不健康,不敢希望活得长久,于是也甘心未及见成功即离开尘世。我情愿将自己看作一个身后成名的作家,像我欣羨其纯粹光荣的那些人一样,他们死时几乎是无名的,他们只为未来而写作,譬如斯汤达尔,波德莱尔,济慈和乐波。我时常对自己说:我的著作的对象此时还未诞生哩!我也有一种痛苦的然而足以自励的感想,即我是在沙漠中说话。在沙漠中说话,说得很好,因为没有回声来妨害你的语调,因为不必顾虑自己的话的反响,除了诚实之外什么都不管。这里应当指出一点,即当公众的趣味是矫揉造作的时候,当习惯压服了真理时候,诚实反而被人看作是矫揉造作。是的,我被人看作了一个矫揉造作的作家。人们用不读我的著作的手段,来使我觉到这点。

我上面列举的伟大作家都是我最钦佩的,他们的榜样安定我的心。我甘心在生时没有看见一点成功,而坚决相信未来会报偿我的。同别人保存成绩单一样,我保存着我的《地粮》一书销售清单。在二十个年头内(从一八九七年到一九一七年),刚刚售去了五百本。这本书没有受公众和批评家所注意。没有一篇论文批评它;或者确切点说,只发表了二篇论文,朋友写的。我说以上的话,是为着这本书后来非常的成功以及它对于今日青年一辈的影响而说的。

这不仅是我的《地粮》的历史。一般说来,我的每本著作的初期失败,恰是与其价值和新颖成正比例的。

我不愿由此得到一条荒谬的结论,以为唯有平凡的书才能希望得到立时的胜利。不是。这绝不是我的思想。我不过要

说：一本著作，一件艺术品，它的深刻的价值并非都是立刻可以认识出来的。同样，艺术作品并非仅以现在为对象。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乃是一些“预知”，须待稍迟方能了解；那些唯一的完全地只适应于立时需要的著作，不久就有成为全无价值的危险。

新俄罗斯的青年人啊！你们现在懂得为什么我这样欢喜将我的《地粮》呈献给你们了。因为未来寄托在你们身上。未来不是由外而来的；未来是在你们里面。而且不仅是苏联的未来如此；因为其余世界的命运将依赖于苏联的未来。未来，——就是你们这些制造未来的人。

注意啊，小心啊！你们负有重大的责任。你们前一辈同志慷慨牺牲他们的血汗而获得胜利，你们可不要休息在这个胜利上面。天上一堆乌云给他们排开了，这乌云现时还使世界好多国家黯然无光。你们不要袖手旁观啊，不要忘记，我们的眼光，从西方，充满了爱、期待和广大的希望，紧紧地盯住在你们身上。

对列宁格勒文学家的演说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

列宁格勒的魔力、壮美和陈迹，立刻就迷住我了。固然，莫斯科对于我的心和我的精神有极大的意义，而苏联的（光荣的^①）未来也强有力地在那里刻画着。但在莫斯科，我没有触起其他的历史纪念，除了拿破仑的征服，这个徒然的努力接着就是

① 人家暗示我，说这里须添加“光荣的”这个形容词。

大失败；至于在列宁格勒，则好多建筑物都使得我回忆俄国和法国间最亲切的和最丰饶的精神交往。这些过去时代的交往，这个精神上竞赛，我很喜欢地认为是当时文化所能做到的最宽宏的最普及的最新颖的和最勇敢的事业，一种预告，一种准备，一种非意识的约言；是的，预约着我们今日革命的国际主义所应当实现的东西。

但有一点须得指出的，即是过去的交往始终是个人的，是伟大精神对(伟大^①)君主的交往，是伟大精神相互间的交往。至于今天建立的而为我们所从事的交往，则是深刻得多了；今天的交往乃是出于民众的本意，而且将形形色色知识者和劳动者溶为一炉，这却是自今以前从未见过的。所以我不是以我自己名义说话的；我向你们重述我对于苏联的爱时，也是表示法国广大劳动群众的感情。

倘若我和我的同伴来到你们中间，同时也带来精神交往的新的可能性，那我是全心愉快的。我永远反对什么种族的界限。有些民族主义者以为这界限是不可逾越的，是永远阻止不同民族间相互了解，使得他们精神不能沟通，使得这个民族精神不能进入那个民族精神的。这里，我很喜欢对你们说：自从我的青年时代以来，对于当时人们所指为斯拉夫灵魂的不可了解的神秘，我就特别亲爱地向往了，以至我觉得我同你们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互相密切沟通起来：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以后，梭罗古勃，谢德林，契诃夫，高尔基，——只举出死去的人来说罢。我读他们的著作的何等的热情，我可以这样说：用

① 人们请我删去“伟大”二字，因为这词是不适宜于形容“君主”的。

的何等的感激，因为他们除了最特异的艺术之外，还赠给我以最惊人的启示，关于一般人类以及我自身；他们开发他国文学所不曾涉足的灵魂区域，而且用着细腻、强力以及爱的范围以内的坦白，一下子便占据了灵魂的最深处，一面是最特殊的，一面又是最人性的。我尽我的力量，不断地使法国人去认识，去爱过去俄罗斯文学以及当今苏联文学。我们时常知道得很少，而且从这民族到那民族，我们也能犯着严重错误和很可惋惜的疏忽；但我们的求知心是很热烈的，同着彼尔·赫巴和我一道来的其他同志，耶夫·拉斯特，雪夫灵，达比和季友，也是如此；其中有两个是党员。他们同我一样，都预祝这次苏联旅行能使我们更加明了，并允许我们在我们回去之后使得法国民众更加明了，——他们对于苏联所应给予我们旧世界的新礼物，非常渴想知道。你们在这里所给我们表示的同情，鼓励了我。我喜欢以那还留在法国的好多人的名义敬向你们表示我们的亲切的感激。

反宗教斗争

我没有看过莫斯科的反宗教博物馆；但我看过列宁格勒的，那是在圣以撒大教堂之内，这教堂的金顶闪烁在城市之上，十分好看。大教堂的外观很美，内部则丑恶不堪。现还保存着的大幅宗教画，足够引人去咒骂上帝；这些图画确是很丑陋的。博物馆本身却远不像我所害怕的那么胡闹。这里问题乃在拿科学去对抗宗教神话。那些精神上懒惰的人，若是看了各种光学仪器，天文学，博物学，解剖学，统计学等图表，还不明白，则另外有若干指导员在旁边帮助解释。这还是得当的，不太使人难堪。这

是瑞可侣式的和佛拉马利翁式的，而不是雷奥·达文西式的。譬如教士就要受一番打击。但在那以前几天，我却在列宁格勒附近到彼得霍夫去的路上，遇着一位教士，一位真正的教士。只看他的外貌，就已经比参观苏联一切反宗教博物馆都更有效果了。我不想去描写他。怪模怪样的，卑鄙的，可笑的，他似乎是布尔什维主义所发明的一个稻草人，用来吓走乡村的宗教感情的。

反之，在我们到达某地以前不久，我们去拜访的那个很美的教堂中，那个守护教堂的修士的可赞叹的面貌，都是我所不能忘记的。他的行步何等尊重，他的容采何等高贵，他表现何等愁苦的无可奈何的傲气！他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个手势，也没有交换过一次眼光。我一面观察他，没有让他知觉，一面就想到《福音书》上的“*tradebat antem*”，波秀哀就是从那里得到一种雄辩的动力。

塞瓦斯托坡尔附近那个古物博物馆，也设在一个教堂之内。^① 里面壁画还保存着，无疑是为着画得惊人地丑陋而保存的。旁边附有解释的字句。在一幅基督肖像之下，写着：

传说中人物，实无其人。

*

苏联在这个反宗教战争中所取的方法，我颇疑其不巧妙。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颇可以一味信赖历史，颇可以一面否认基督的神性，甚至基督的存在，排弃教会的教条，拆穿启示，一面纯从人道上和批评上看视一种教训，这教训当初曾给世界以一

① 在索契附近也有这样一个教堂，我们曾在其中看见一次跳舞。在正祭台，一对一对舞侣，随着音乐，在跳狐步舞或探戈舞。

种新的希望和非常的革命酵素。颇可以说：教会本身如何背叛了这个教训，《福音书》这个解放学说又如何被人利用去做恶事，而且教会朋比为奸。无论如何，总比不理，比否定，更好些的。人们不能使得当初没有这个东西。现在，在这问题上，人们将苏联民众维持于无知之中，使之没有批评的防卫，没有抗毒素，以抵御一种时刻使人担忧的神秘主义瘟疫。

不仅如此，我的批评是先从最狭隘方面说的，从实践说的。对于《福音书》及由彼而来的一切事物之无知和否定，不能不很可悲惨地使人类、文化陷于贫困。我不愿意人家猜疑我，并从此嗅出一种原始教育和信念的臭味。我对于希腊神话也是这样说的，我相信神话也是一种深刻的常备的教训。我以为：去信仰神话，乃是不合理的；但不承认其中所含的真理，而以为可以含笑耸肩弃之不顾，那也是不合理的。至于说宗教能妨害精神发展，能印入皱纹于思想之中，那我早知道；我并以为最好当使新人解除这一切。我也承认：迷信，由于教士帮助，在乡村以至于到处（我访过从前皇后所住的房子），养成一种可怕的道德上污垢；我也懂得人们感到需要，一下子把这一切都倾泼出去；然而……德国人有一句极好的成语，法文里面我找不到相当的，这成语可以表示我的带有点不愉快的意思，即说：“人们将小孩子和洗浴水一齐倾泼了。”这是没有判别和过分匆忙之效果。也许这洗浴水是肮脏的，发臭的；我也不难同意这话；甚至于肮脏到了连小孩都顾不得的程度；人们没有检查，就一下都倾泼了。

现在我听人说，为了顺应精神，为了宽容，人们重新铸钟给教堂用；于是我非常害怕，我怕这是一个出发点，从此浴盆将重新装满脏水，……而小孩子不见了。

奥斯特洛夫斯基

我只有用最深切的敬意，才敢说起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们若不是在苏联的话，我可以说：那是一位圣者。宗教并未曾养成比他更好的人物。这就是证据，证明宗教并不是养成这人物的唯一的力量。一种热烈的信心已经够了，并无需希望未来的报偿，无需其他的报偿，除了履行一种艰苦使命以后的这个满足心。

由于一件事情，奥斯特洛夫斯基眼睛变瞎了，而且完全瘫痪了。似乎他的灵魂，因为失却了同外界接触的差不多一切的机会，找不到地基来扩展，只好向高度方面去发挥了。

我们包围在他的床边，他好久未曾离开这张床。我坐在他的床头上，伸手给他，他抓着，我应当说：他抢着我的手，像抢着一条联系生命的带子一般；在我的访问的整个钟头之内，他的瘦削的指头不停地抚摸我的指头，互相纠缠着，并将一种使人颤栗的同情传达给我。

奥斯特洛夫斯基不能看了，但他说，他听。他的思想这样活跃和紧张，没有什么事情能使得他分心，除了有时肉体痛苦以外。但他并不诉苦。他的消瘦了的美容，不管这个慢性的死亡痛苦，仍然能够现出微笑。

他居住的房间是光亮的。花园里，鸟语花香，从开启的窗户进到房内来。这里是何等的平静！他的母亲，他的妹妹，他的朋友以及访问他的人都悄声静气地坐在离床不远的地方；有几个人记录他的说话。我告诉奥斯特洛夫斯基，我看见他这样坚定，

我自己也异常振作起来。但这个赞誉似乎使他惶恐不安：应该赞美的是苏联，是这业已完成的巨大的努力；他只关心这个，而不关心他自己。我有三次向他告别，怕他疲惫，因为我不能设想有如此坚定的热情。可是他求我再留一会儿，人们觉到他是需要说话的，我们走了以后，他还是要继续说话。对于他，说话就是写作，就是叫人记录起来。所以他还能够写（叫别人记录）这本书，^①来讲述他的生平。他对我说，他现在正在著另一本书。从早晨到晚上，甚至到深夜，他都在工作。他不断地口说，人们记录下来。

我终于立起来要走了。他请我吻他。当我的嘴唇放在他的额上去时候，我几乎忍不住我的眼泪；我忽然觉得，我好久以来就已认识他了，现在离别而去的乃是我的一个老友；我又觉得，这是他离开我们，而我是在向一个临终的人告别……但是，人们对我说，好几月以来，他就是这样子一息仅存了，惟有热情在这孱弱不堪的躯体中，维持住了这个将近熄灭的火焰。

一个集体农场

如此，每日工资是十六卢布五十戈比。这并不算多。但集体农场的大队长，——我的伙伴洗浴去时（因为这个农场正在海滨），我同他谈了很久的话，——给我解释说：这里所说的“劳动日”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名称，一个好的工人一天能够得到二

① 按指奥斯特洛夫斯基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译者

“日”甚至三“日”的工资的。^①他拿各人的折子和账单给我看，所有这些单据都经过他的手。那上面不仅记着劳动的量，而且记着劳动的质。那些分队长报告他这类材料，他根据这些报告作成支付工资的单据。这需要一种颇为复杂的簿记法，而他也承认：他有点担负不了；但他还是很满意的，因为从年初一起（我们谈话那日是八月三日），他个人已经积下相当于三百个“劳动日”的钱了。这大队长管辖五十六人，他和这些人中间还有几个分队长。如此便成为一种等级制；但每“日”工资单位，大家都是同样的。此外，做了集体农场工作之后，各人又可以耕种各自的园圃，而享受其出产物。

这个工作就没有固定的和规定的钟点：每个人没有紧迫事情，什么时候爱去做，就去做。

这就使得我提出一个问题：其中没有人供给的劳动较少“劳动日”本位么？可是没有，没有发生这种事情，——人们回答我。无疑地，这个“劳动日”不是平均的劳动日，而是容易做的一种最低限度。此外，过分懒惰的人将很快被排除出集体农场以外，而集体农场是有很大利益，大家都争着加进去，成为其中一分子。但没有用：集体农场人数是有限制的。

这种享有特权的集体农场成员，每月大约能得六百卢布。熟练工人有时所得还多些。至于占极大多数的不熟练工人，则每日工资自五卢布至六卢布。^②简单的小工所得还更少些。

① 一个“劳动日”细分为十等分来计算。

② 我应当指出：在理论上，一个卢布值法国三个法郎，换言之，外国人到苏联时，须用三个法郎去买一个卢布票。但卢布的购买力并不超出法郎以上。此外，好多食粮，尤其最必须的（鸡蛋，牛奶，肉，奶油等）价格还更昂贵，至于衣服……

国家似乎能够多给他们一点工资。但若付之消费的粮食数量不增加的话，则工资提高适足造成物价腾贵。至少人们是这样反对着。

目前，工资差异，期望能提高工人的技艺。小工是数量很多的，所欠缺的是专家，是劳动干部。人们努力一切，来养成这类人才；在苏联最足令我钦佩的，也许就是教育制度这一点，现在差不多到处，教育手段早已为最卑微的劳动者所能享受，允许他们（正为他们而设的）得提高地位，离弃原来的无能状态。

波尔塞伏

我游过波尔塞伏城。这城起初是个乡村，大约六年前由于高尔基的倡议，忽然生长出来，现在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城了。

这城有一个特别之点，即是一切居民都是旧时的罪犯、小偷、凶手等等。这城的成立和组织，受了如下一种观念所支配，就是说：罪犯乃是受害者，乃是迷途的人，再经一次合理的教育是可以变为良善的苏维埃公民的。波尔塞伏城证明了这个观念。这城繁荣起来，城里设立工厂，这些工厂不久就变成模范的工厂。

波尔塞伏城一切居民，改过从善了的，除了自己组织的以外，没有别的治理机关；他们从此都是热心的劳动者，守秩序、安静，特别尊重善良风俗，又渴慕知识。所以一切方法和手段，都交付他们使用。使我钦佩的，不仅是他们的工厂，还有他们的开会场所，他们的俱乐部，他们的图书馆，他们的一切设备，这些确是不能再好的了。人们在这些过去罪犯的面貌上，态度和谈吐

上都找不到他们过去生活的一点痕迹，再没有比这城的游历更富于教训，更能安慰而鼓励人的了。这次游历足以使人想到：一切犯罪都不当归咎于犯罪的人，而应归咎于推动他去犯罪的社会。人们邀请他们中间这人和那人，来说话、来忏悔过去的犯罪行为，来叙述他们怎样改过，又怎样认识到新制度的好处，以及顺从新制度之后个人如何满足。这事使我很奇异地连想到二年前在杜恩地方开“牛津运动”大集会时我听到的一些富于教训的忏悔。“我是罪人和不幸者；我做了恶事；但现在我明白了；我得救了；我是幸福的。”所有这些都有一点粗笨，有点单调，使得心理学家渴欲知道得更详细些。但这仍无害于波尔塞伏城成为苏维埃新国足以自豪的一些最非常的成功之一。我不晓得，在别的国家，人类是不是这样容易被摆布的。

流 浪 儿

我希望不要再看见流浪儿了。在塞瓦斯托波尔，有好多的流浪儿。人们对我说：在敖德萨还更多些。这些流浪儿，并不是同革命初年的一个样。现在的流浪儿，他们的父母也许还活着，他们是从诞生的乡村逃亡出来的，一部分由于冒险的志愿，但大部分则由于他们想象不到：别处也是那么困苦和饥荒，同他们家里一样。有些孩子还不满十岁。这是容易从普通孩子分别出来的，因为流浪儿总穿得多些（我不说穿得好些）。这点不难解释：他们所有一切都带在身上了。普通的孩子时常只穿一件简单的游泳短裤（我们在那里时正是夏天，天气十分炎热），他们裸体赤足在街上行走；我们不要以为他们都是穷苦的；他们刚洗了海水

浴出来,或者还要再去洗浴。他们都有一个家,可以安放其他的衣服,下雨天的和冬天的衣服。至于流浪儿,那是没有住所的。除了游泳短裤以外,他们通常还穿一件破烂的上衣。

这些流浪儿怎么样生活呢?我不知道。但我所知道的,就是:他们只要有办法买得一块面包,他们就买来吃了。虽然如此,大多数还是快乐的,但是有些孩子则奄奄欲毙了。我们同好几个流浪儿谈过话,得到他们的信任。他们终于引我们去看他们睡觉的地方,每逢天气不好不能露天睡觉时,他们就躲到那里去的。那就是列宁雕像所在广场附近俯临海岸码头的拱廊底下。当人们从岸上走下海去时候,左边,拱廊凹下处有个木门,不是向内推的,是向外拉的。有一天早晨,行人稀少时候,我就拉过那个门;我怕人多时泄露了他们的巢穴,害得他们另找地方。我看见一个洞,同眠床一般大小,除这木门之外没有别的门窗;里面一个饿瘪的小人,好像一只猫,蜷曲在一个麻布口袋上面睡着。我仍旧关起那门,不愿搅扰他的安眠。

一天早晨,我们认识的那些流浪儿都不见了(他们平时都在大公园近旁流荡的)。以后,我们寻到了一个,他告诉我,警察搜捕他们,别的人通通被关起来了。我的同伴中有二人也看见这次搜捕。警察回答他们的询问说:这些流浪儿都要送到一个政府机关去收养的。可是,第二天,那些孩子又统统在那儿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不要我们!”那些孩子说。也许是他们受不起一点纪律的束缚么?他们又逃出来了么?但警察再捕他们,是很容易的。似乎他们应当觉得幸福,能够离弃这贫困的生活。难道他们宁愿享受自由,过这贫困生活,而不要人们献给他们的丰衣足食生活么?

我看见一个极小孩子，刚有八岁吧，给两个便衣警察拉着走。警察须得二个人拉他，因为这小孩挣扎着，像一只野兔。他哭着、喊着、跳着，又要用牙齿咬人。过了一点钟之后，我在同一个地方经过，又看到那个小孩，已经安静下来了。他坐在人行道上，此时只剩下一个警察，站在他的旁边，同他说话。小孩子并不想逃跑。他对那警察微笑。一辆大车经过，在那里停下来，警察帮助小孩子上去。送到哪里去呢？我不知道。我叙述这件琐细事情，为的是在苏联像这警察对这孩子的热情，能感动我的心的，并不多见：他的和悦的说服声口（我极愿懂得这人对小孩所说的话），他的微笑表现出来的热情，他抱持小孩上车时那种爱抚的温柔情感……我想起了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农奴马莱。^① 为的要看看这个情景，是值得到苏联走一趟的。

^① 见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一个作家的笔记》。

**为我的《从苏联
归来》答客难**

译 序

纪德此书原名 *Retouches a mon Retour de L'. U. R. S. S.* , 其中 *retouche* 一字本是从绘画方面借用来的字眼, 直译为“再触”, 有“修饰”之意, 凡已成的图画加以一番修饰, 有污点的地方洗去, 模糊的地方画清楚, 颜色太浓的地方使它淡些, …… 这种工作就叫做 *retouche*。学西洋画的人一定知道此字该怎么译的。我本来想译做:《对于我的〈从苏联归来〉之润色》。但我想“润色”或其他更适当的绘画字眼, 用在这书名上, 在中国是不习惯的, 不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观念。因为在第一段有“我写这本书为的回答他们(诚意的批评者)”一句话, 我就大胆改译为:《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

法国伟大的文学家中, 二十年前需有罗曼·罗兰的大勇敢才敢表同情于苏联, 如今也需有纪德同样的大勇敢才敢疵议苏联, ——然而纪德的精神是特别令人钦佩的。

他这书中屡次提到斯大林压迫底下的牺牲者, 提到那些整千整万关在苏联集中营里的“反革命分子”。他说:“倘若我的书能到他们手里, 则他们的无言的感激, 对于我, 是比《真理报》的

恭维或咒诅重要得多的。”其实关在或曾经关过不是苏联的集中营里的“反革命分子”(!),读了他这本书,虽然其中没有涉及他们的话,也一样地感激他的。

译 者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我的《从苏联归来》之出版，给我招来许多辱骂。罗曼·罗兰的辱骂令我难过。我从未曾十分爱好他的著作，但至少我很尊敬他的精神人格。我的难过，由于这一点：那些曾经表示其极端伟大的人很少有几个能保持晚节。我相信，《超于混战之上》一书的著者，一定要严厉批评年老了的罗曼·罗兰。这个老鹰已经筑了它的巢；它在那里休息。

辱骂的人以外，还有几个诚意的批评者。我写这本书为的是回答他们。

其中，保罗·尼赞，他平时是很聪明的，此次却向我提出一个奇异的谴责，说我不该“将苏联描写做一个再不变化的世界”。我不知道他何所见而云然。苏联在一月一月地改变，我早说过了。正是这个令我惊吓。苏联的状况在一月一月地变坏。它渐渐离开了我们所期待于它所已成就的，——于它所应成就的。

*

自然，我佩服你们的信任心，你们的爱（我说这话，不是反

语)之坚定;可是同志们,你们仍然是疑虑不安起来了,你们承认吧;你们一天比一天更加惶恐地自问(譬如在莫斯科党狱之前):我们的拥护将到什么程度为止呢?或迟或早,你们的眼睛将睁开来;一定会睁开的。那时你们这些正直的人将自问:我们怎能把眼睛闭得如此长久呢?①

而且正直的人是最熟悉内情的。他们并不否认我说的话。他们只限于寻觅并提出解释。不错,是解释,但同时又是替一种可悲叹的状态做辩护。因为在他们看来,问题并不仅在于显示人们如何走到这个地步(这本是很容易了解的),而在于说明人们有理由走到这个地步,或至少从这个地步经过,先到这里等待更好的情况;他们以为人们离开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理想而走的这一条路,仍然可以达到共产主义的;此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这点,我是毫不了解的,——他们说。

*

皮相的考察,仓促的判断,——人们这样批评我的书。好像在苏联不是初见的外表使我们迷醉的!好像不是更深入进去,眼光遇到更坏的情况!

虫恰正躲藏在果子的内心深处。但当我告诉你们:这个苹果生虫时候,你们却责备我没有看清楚,——或者不爱苹果。

① 呵,这些正直的人,有多少已经惶恐不安起来了!他们还要更加惶恐下去的,直到最后认识了错误。

“我本是共产主义战士,苏维埃公务员,在苏联工作了三年以上,在出版方面,在宣传机关方面,在工厂检查方面,——我经过了严酷的 internal 斗争,经过了有生以来最猛烈的冲突,然后终于得到了与你相同的结论。”鲁朵尔夫,《与苏维埃俄罗斯告别》一书的著者,写信给我说。

倘若当初我只限于赞叹，你们就不会责我皮相了；然而那时候我才应受皮相之责哩！

*

你们的批评，我都知道；这差不多同我的《刚果游记》和《从洽德归来》二书所引起的批评一个样。那时人们反驳我说：

一、我们指出的那些腐败，乃是特殊现象，不能做出什么结论。（因为人们不能否认这些腐败现象）；

二、要寻觅充足理由来赞扬现时状态，只消拿来同以前相比，同未占领前（我应当说：革命前）状态相比，就够了；

三、我所悲叹的一切，都有其深刻的存在理由，这是我所不了解的，这就是：暂时的不幸，为着更大的幸福。

在那个时候，批评、攻击、辱骂，都是从右派方面来的。你们却不能说我“不够资格”，你们左派的人，——当初你们太高兴争夺我的宣言了，当我说的话合于你们的意味，能给你们利用时候。同样，你们今天也是不会骂我不够资格的，倘若我是一味称赞苏联，并宣言那里一切都进行得令人陶醉时候。

调查委员会，在刚果，后来依然证实了我所指出的一切（我所关心的只有这个）。同样，人家给我的丰富的证据，我所能读到的报告，以及公正的观察家的记载（他们是伟大的“苏联友人”，或者曾经是伟大的“苏联友人”，当他们尚未到苏联去观察以前），都来证实我关于苏联现状所说的话，都来加增我的恐惧。

*

我的《刚果游记》的大缺点，使我的证据很薄弱无力的，便是由于：我不能说出证据的来源，不能指出那些应受惩戒的人的名

字,他们信任我,告诉了我,或者给我看那些平时不肯给人看而且不能随我引证的文件。

人家责备我将重大的判断建立在太狭小的基础之上，责备我太仓促从枝节的事件做出靠不住的结论。他们说，我所举出的我所观察来的事实，也许是真的，但那是特殊的现象，并不能证明什么。

从我所观察的，我只举出那些最有典型性的(下面我还要举出若干其他的事实)。我觉得，我的书中若堆满了报告、数字、统计之类，是没有用处的；第一因为我抱定一条原则，凡非亲见亲闻的，我绝不采用；第二因为我不大信任官方的数字；重要的，是因为这些数字，这些“图表”(我自己还是研究过的)，人们可以在别处找到。

但既然人们要我这样办，我就引证一些材料：

费兰·格列尼耶、约翰·邦士和亚历山德里教授，——这三个人，我相信，是一道旅行的：还有一百五十九个同伴，同他们一样。都是“苏联友人”。那没有一点奇怪，倘若这三位原告(被告就是我)提出来的证据是雷同的。他们引证来的数字，为表明我的错误的，都是一个样；那是人们给予他们，而他们不加审查便接受下来了。

我要来解释，这些数字是如何与其他证人所供给的不相符合，——这些人一定更多知道内情，在苏联工作很久，有时间深

入“下层”去，——至于这一百六十二个旅客不过在那里过路吧了。他们的旅行一共只有二十天，其中十四天在俄国境内：从八月十四日到八月二十八日。在这样少的时间内，他们仍是能见很多的，可是除了人家显示给他们以外，没有见到别的什么。其中没有一个人（我说的是我的三个原告）能说俄国话。我希望他们能允许我反过来认为：他们所宣告的话是有点皮相的。

我已经说过了：在法属赤道非洲旅行时候，凡是“有人作伴”的地方，我都觉得一切差不多是异常美妙的。直到离开总督的汽车，决定单独步行游历时候，我才开始看得清楚，在六个月之内我能够直接同土人相交接。

呵，不错，我也曾在苏联见到这些模范工厂，这些俱乐部，这些学校，这些文化公园，这些儿童花园，——这些也曾令我惊叹的；同格列尼耶·邦士或亚历山德里一样，我也曾乐于受人诱惑，为的转过来诱惑别人。诱惑人和受人诱惑，本是很有趣味的事情，那么我希望上面我所指名的人能确信：我之反抗这种诱惑确有重大理由，而我绝非如人们所说是“轻率从事”的。

*

约翰·邦士的诚意是很可钦佩的；他的信任心，如同孩童的天真，是很感动人的。^①他接受人家告诉他的话，同以前的我一

① 至少当他的信任心没有流入于附会可笑的时候，譬如他写道：“在会客厅里……我看见一尊弥涅甫神像，一尊尤比德神像，一尊狄安娜神像。工人们只加以一种修正，便是添加一尊青铜铸的列宁半身像。弥涅甫神和列宁并列，似乎是不可了解的，然而我们看得出二者相接近之处。这就是证明：共产主义乃是好多世纪人类历史之自然的、逻辑的和不可避免的归宿，乃是最高和最博爱的文化之继承者。”（见《旅苏日记》第六十六页）

样,没有检查,没有怀疑,没有批评。

说起他所提出的(或亚历山德里和格列尼耶所提出的)某些数字,譬如一个工厂的出产吧,我认为靠不住的,今摘录《真理报》的若干自承,请这些同志默省一下。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真理报》说:

在第二季当中,雅罗斯拉夫工厂出产的汽车附件之总数内(官方统计所得意夸耀的唯有这个数目),有四千件成了废物,在第三季当中,则有二万七千二百七十件不能使用。

十二月十四日,提起某些工厂出产的钢时候,《真理报》说:

在二三两月中,人们淘汰了百分之四·六的金属物,在九十两月中,则淘汰了百分之十六·二。

“怠工, ”——人们说。最近几次大狱好像就是怠工的一种证据(反之,怠工又是大狱的证据)。然而,我们很可以在这些废物中看出一种人为的和过分的生产紧张之代价。

计划固然是很可赞美的,但在现时“文化”程度之下,某种数目的出产非费巨大代价不可。

伊热夫斯克工厂生产品废不可用的,在四月至八月这个时期内共值四十一万六千卢布;但十一月这个月内已经高到十七万六千卢布。

运输汽车时常失事,是由于司机过分劳苦,但也是由于车子品质之粗劣;一九三六年检查的九千九百九十二辆汽车中,有一千九百五十八辆是被认为残缺不全的。在一段运输路上,二十四辆车子中有二十三辆不能行驶;在另一段路上则五十二辆车子中有四十四辆不能行驶。(见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真理

报))

照一九三五年计划所宣布的,五千万张留声机片子,一部分即四百万张应由诺金斯克工厂供给,但这工厂只能供给一百九十九万二千张。可是废不可用的片子却占三十万九千八百张(这个数字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真理报》给我们的)。一九三六年第一季中,生产只有计划预定的百分之四十九·八;第二季中,百分之三十二·八;第三季中则仅有百分之二十六。

生产既然渐次退减,他方面破损的件数反而日益加增起来:

第一季破损十五万六千二百件

第二季破损二十五万九千四百件

第三季破损六十一万四千件

第四季的完全统计还未发表,但一定是更不如的,因为十月这个月内已经破损了六十万零七千六百件了!那么人们试判断一下,每件可用的生产品究竟费了多少的“成本”。

“劳动英雄”工厂制造,供给莫斯科小学生用的二百万本练习簿中,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可使用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日《消息报》)在罗斯托夫,人们必须丢弃八百万本练习簿。(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真理报》)

家具协作社卖出去的一百五十只椅子中,有四十六只一坐就坏了。二千三百四十五只椅子,有一千三百只不能用的。(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真理报》)外科工具也是如此残破。布登加教授,苏联有名的外科医生,特别诉苦,关于精细手术所用工具之恶劣品质;外科缝针,在行手术时不是弯了,便是断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真理报》)诸如此类。

这些材料应该能使那些喝彩的人稍微审慎一下。但宣传机

关是不管这一切的。

我们还要指出一点：生产之迟缓和恶劣，本是受人攻击之对象，有时还引起诉讼，受法律严重制裁，而且若是报纸公布出来的话，那已经是有了相当改良了。

自我批评，在理论和原则问题是如此难得见的，但在关于已定计划之实行方面，则充分发挥出来；这是《消息报》（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告诉我们：莫斯科有几个区，此时平均六万五千居民只摊有一只药房；其他几区，则七万九千居民才摊有一个；全城之内一共只有一百零二个药房。

这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消息报》告诉我们的：

自从取缔堕胎之法令公布以后，莫斯科每个月出生婴儿达到一万人，同公布以前时代比较起来要增加百分之六十五。生产率既然如此增加，但产科医院的床铺则只增加百分之十三。

育婴堂和托儿所，当是十分美妙的。但在一九三二年，依照瓦尔脱·西特令爵士所估计，^①能在这里面找到位置的小孩子，八个之中只有一个罢了。按照新的计划，倘若这计划能完全实行的话，则此比例数可增加一倍，即八个之中有了二个。那还是不够的，但有了进步。反之，我恐怕工人住宅问题将每况愈下。

^① “……若是每个小孩都容纳进去，必须有二百万位置才行。然而事实上容纳的，八个有资格的小孩中只有一个。一九三七年时又将怎样呢？那时希望工人数目达到二千八百万？就单拿城市托儿所来说吧，那些地方将能容纳七十万小孩，若是大家都进去的话，则应容纳二百八十万小孩。可见每四个小孩中只有一人能得位置，还须假定这计划能完全实行哩！”（见瓦尔脱·西特令爵士著《我在苏联探求真理》第二百九十六页）

新建筑计划,与需求相差仍是很远,因为人口增加了。一间房子住三个人的地方,恐怕不久之后要住四个或五个。此外,最近建筑给工人居住的好多房屋,是如此仓促,或宁可说如此轻忽,材料又如此庸劣,恐怕不久就会不能住人了。

这个愁惨的住宅问题,乃是最感动瓦尔脱·西特令爵士的问题之一。他在巴库附近,不管官方的向导如何阻拦,仍然去参观了石油矿工人的宿舍:“我在这里得见几所污秽房屋的最愁惨的标本,在这国土,这类房屋是不会没有的,”他说,“其中一切都是不堪入目的。”向导告诉他,应当把这看作帝制时代一种残留物。西特令抗议道:“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百万富翁来开发石油井了……革命之后十八年,你们还容许你们的劳动者居住在这类猪栏里!……难道不是很可怕么,你想想有几万个工人十八年来被抛弃在这猪栏里面?”

伊逢在他的小册子《俄国革命之堕落》中,也举出其他数例关于这个可悲叹的问题,他添加几句话说:“这个住宅危机,乃是起因于革命太忙于‘超过资本主义’,太忙于建筑巨大的工厂和组织人类从事生产,而忽略了人类的生活。远远看去,也许现出伟大的样子,在远处看来则是非常可悲伤的。”

三

对于我的《从苏联归来》之责难，最应领受的一个，便是说我太过于注重文化问题：其他更紧迫的问题尚未曾解决以前，文化问题是可以置诸脑后的。这也是由于当初我认为必要，将我在苏联的几篇讲演附在书后，而这些讲演引起了非难。在这样一本小书内，这几篇演说占了太多的位置，引起人注意。此外，这几篇演说是在我的旅行初期；那个时候我还相信（是的，当时我是这么天真）：人们在苏联可以认真地谈起文化并诚恳地讨论它；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社会问题是如何落后，如何受人冷落。

然而，人们若将我所说的话只看作一个文学家的要求，那我仍是要抗议的。当我说起精神自由时候，我指的是另一回事。在卑躬屈节之中，科学也是要败坏的。

某著名科学家被迫去否认他所传授的不大合于正统的理论。科学院某院士“承认他以前的错误”，这些错误学理“能为法西斯所利用”，他自己公开宣布说（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消息报》）。确切地说，是人家强迫他承认《消息报》奉命指控他的话，——《消息报》在他的研究中嗅出了“反革命发昏”的有

害的气味。(见附录戴尼叶博士的来信)

爱森斯坦被阻止工作。他必须承认他的“错误”，自供他做得不对，他准备了两年业已耗费两百万卢布的那部影片，并不适合学理的需求，所以人家有理由禁止它。

还有司法呢！难道人们以为最近莫斯科和诺沃西比尔斯克的大狱使得我惋惜写过这几句令你们气愤的话么？这是说：“我怀疑：今日在其他的国家，即算在希特勒的德国吧，精神能比这里更少自由，更低头，更恐惧的(更受恐怖所吓怕了的)？”

*

既然——因为人们不愿太轻易松手——人们紧紧抓住“已得的成绩”：没有失业，没有卖淫，妇女与男子平等，恢复人类尊严、教育普及……可是，只要检查一下，这类好看的成绩，每一样都要烟消云散的。

我只要比较详细检讨一下教育问题；其他的问题，我们在半途中将有机会来讨论。

不错！旅行家在苏联遇到好多青年人，渴求知识，渴求文化。再没有比他们的热心更能感动人了。于是人们从各方面叫我们去赞叹那些交付于他们使用的文化工具。我们诚心诚意向政府法令喝彩，这法令于一九三六年二月预见“本年度，即一九三六——三七年，将完全肃清文盲，那四百万不会读不会写以及那二百万不全会读写的劳动者，此时都能知书识字”。然而……

一九二三年已经提起“肃清文盲”的问题了。这一运动之完成，应当恰与十月革命之十周年纪念同时(一九二七年)，是有“历史意义”的——人们说。可是，在一九二四年，卢那察尔斯基已经谈起了那种“大灾祸”：能够开办的小学尚不满五万所，但在

革命前旧制度底下却有六万二千所，那时人口还比革命后少得多哩！

人们既然不断地要我们拿苏联现状同革命以前相比较，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过来证明：在许多领域之内，受痛苦的阶级之状况是丝毫未曾改善的。然而我们还是回到教育问题去吧。

卢那察尔斯基指出（在一九二四年）：乡村小学教员薪水常托欠六个月，有时甚至一文不付。他们的月薪有时还不到十个卢布（！）固然，那时卢布比较值钱些。可是，列宁的未亡人克鲁普斯卡娅告诉我们：“面包贵了，小学教员拿着十至十二个卢布的月薪，买来的面包还不如四个卢布时候（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以前月薪数额）多哩。”

一九二七年，规定完成肃清文盲工作之年，文盲仍然存在；一九二八年九月二日《真理报》自己指出：肃清文盲运动“在停顿之中”。

可是，至少，以后有点进步吧？

我们试读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消息报》的记载：“自从新学年开始，好多学校报告我们，说学生们的文盲程度令人惊讶。”

在新学校中，不及格学生的比例数特别高，到百分之七十五。（都是《消息报》的记载）在莫斯科一城中，就有六万四千学生被迫留级；在列宁格勒，五万二千；而且有一万五千学生必须留级二次。在巴库，不能及格的俄国学生数目，四万五千人中有二万人，土尔克斯坦的学生数目，则二万一千人中有七千人。（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巴库工人》）此外好多学生逃学。“在最近三年中，逃学者的数目，在苏俄的一所技术学校中有八万

人。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教育学院，逃学者占百分之二十四；在庶瓦希教育学院中则占百分之三十。”这报纸添加几句说：“各教育学院的学生，其文盲程度是高到令人难以为情的。”

此外，这些学院，在苏俄境内只能征集合格学生百分之五十四；在白俄罗斯境内的，百分之四十二；在达吉斯坦境内的，百分之四十八；在阿塞拜疆境内，百分之四十至六十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真理报》告诉我们：高尔基地方五千个小孩简直没有进学校。此外，第一学年满后逃学的学生有五千九百八十四人；第二学年满后，二千三百六十二人；第三学年满后，三千零十二人。

为取缔逃学起见，有位工人学业预备班主任想出一种办法，即科逃学者每人四百卢布的罚金！（十二月二十三日《东方真理报》）人家没有告诉我们，这罚金是分期付款的还是一次付的；一次付，那是难于办到的，因为负责偿付之家长，其工资每月不过一百至一百五十卢布。

教科书异常欠缺。人们所能使用的又充满了错误。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一日《真理报》很气愤，看见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国立出版社出版一些用不得的教科书。“教育出版社”印行一张欧洲地图，其中爱尔兰岛浸在咸海里，苏格兰岛浸在里海里。萨拉托夫城，从伏尔加河搬移到北海去。诸如此类。

一张乘法表印在小学生用的练习簿上，人们在表中学得了：八三得一十八，七六得七十二，八六得七十八，五九得四十三等等。（见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真理报》）

有名的肃清文盲运动，如此受人称赞的，延迟至今尚未成功，这也是因为那些不幸的小学教师，那些孤立的劳动者，时常

领不到他们的微少薪水之故；为着生活，他们不得不从事于教书以外的其他工作。三月一日《消息报》将这付薪水事情归咎于官僚们办事迟缓（或侵吞公款），——在古比雪夫一个地方，国家就欠小学教师半百万卢布以上。在哈尔科夫地方，则欠至七十二万四千卢布……人们不禁自问：小学教员怎么还能活在世间呢？文盲尚未肃清以前，是否教师要被人肃清掉呢？^①

*

我希望人们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抱着惋惜心情抄录这些无情的数字。我们只是惋惜一种极可悲伤的状况；可是，倘若你们的盲目或你们的狡狴，要将极可痛心的成绩装扮做十分美妙来显示给我们看，那我是要提出抗议的。

^① 《东方真理报》一论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惋惜地指出：肃清文盲计划并未曾造成所希望的效果。在七十万部分的或完全的文盲中，只有百分之三十或四十愿意来上课；“以此使得肃清文盲费用，每个人摊到八百卢布，而非预算之二十五卢布。”在某城中（哥干城），人们自夸一九三六年底以前，文盲将完全肃清，可是五月间有八千零二十三个文盲，八月间有九千五百六十七个文盲，九月十五日有一万一千另四个文盲，十月一日则有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五个文盲。（我们希望这城居民是依比例而增加的，因为乡村人民迁至城里来，否则就须推论说：从前识字的人变成文盲了。）塔什干大城有六万文盲，但登记的七百五十七人中，只有六十人来上课。旅行家所赞叹的就是这六十人。

四

你们铺张太甚，才使得我的信任心，我的钦佩和欢喜，如此深刻而悲哀地下降了。我所非难于苏联的，也绝不在于它没有得到更好的成绩。（现在人们向我解释说：苏联是不能很快得到更好的成绩的，我应当明白这点；苏联是从我想象不到的更低的基础上出发的；现在无数工人所过的贫困生活，乃是旧制度下无数被压迫者所企慕不到的。我相信人们稍微夸张了一点。）不是的：我特别非难于苏联的，乃在于它骗我们说：那里的工人地位是足以令人欣羡的。我所非难我们国内的共产党人的（呵，我说的不是受欺的同志，而是那些知道情况或至少应当知道的同志），乃在于他们无意或有意对工人们说谎，——有意的，即是有政治作用的。

苏联工人粘着于其工厂，正如农村劳动者粘着于其集体农场或苏维埃农场一样，亦如伊克松粘着于其轮子一样。但若他为了某种缘由——因为他希望别处能稍好一点（能少坏一点）——要调换工作的话，那他就要当心！他就有到处找不到工作的危险。即使没有调换城市，只离开工厂，他也要无屋可居

(他住屋本也不是免费的),他的住所是如此难得,有工作才有租屋之权利。工人离开工作,就要被扣留一大部分的工资;集体农民离开工作,就要失去他的集体化劳动的一切出息。反之,劳动者是不能违抗他调之命令的。他不能自由去留于他所喜欢的地方,于一种爱情或一种友谊召唤他或挽留他的地方。^①

他若不是党员,则已入党的同伴要欺压他。入党,求党收容(这不是容易的事,除了有人帮忙之外,还须有完全正统思想和善于卑躬屈节),乃是“成功”的首先而不可缺少的条件。

既经进党之后,就难得出来,^②而不立刻丧失他的地位,他的位置,以及从前工作所获得之一切利益,而不受一切人的欺压和猜忌。因为,你为什么离开党呢,在那里面是很好的,党给你许多利益,只要求你服从一切,再不要有自己的思想?为什么要有思想呢(尤其要有自己的思想呢),既然说过了一切都进行得很好的?有自己的思想,这马上就要成为“反革命分子”。那时就有资格到西伯利亚去了。^③

有一种绝妙的高升手段,就是告密。告密使你得到警察的欢心,警察立刻保护你,但同时利用你;因为人家开始了一次,再没有什么名誉或友谊能够拦阻的:必须前进。此外,这本是容易

① “国家有主权支配经济过程中物质元素,同样它也以独裁的态度支配人力元素。劳动者再不能自由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于他们所愿卖的地方,也不能照他们的意思出卖了;他们没有权利在苏联境内自由流通(国内护照!);罢工权被剥夺去,意图违抗斯达哈诺夫运动方法者都要受最严厉的制裁。”鲁相·劳拉:《俄国经济之一瞥》(《真人》杂志,第三十八号,一九三七年二月)

② 反之却时常为了“清党”原故而被开除。那时就要走西伯利亚道路了。

③ 伊逢说得很好:“入党,就是同时替政权,替祖国和替自己私人利益服务。”完全的调和,而且是幸福攸关的。

调练的事，而当了侦探是无人敢惹的。

*

在法国，政党机关报若是要揭发某人阴私时候，那一定是找这人的仇敌来做这个卑鄙工作。在苏联则是找这人的最亲密的朋友来做的。人们不是请求做，而是责令做。最好的罪证，便是那种愈否认而愈加有力的。这朋友也必须疏远那人们要陷害而他供给证据的那个人。（要陷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尔诺夫时，人们就去找他们的过去好友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先败坏这两人的名誉，然后再枪毙他们。）若是拒绝做这卑鄙工作，那么自己同要救护的朋友都不免于难了。

结果，人们什么都不敢信任。小孩子天真的言辞会葬送你。人们再不敢在小孩子面前说话了。每个人监视着，自己监视着，被人监视着。再没有一个自由说话的人了，除非在床上，同自己老婆，倘若认为老婆是靠得住的话。X开玩笑说：这个原因就够解释结婚为什么变成如此常见的了。自由同居，究竟是没有结婚那样令人放心的。你试想想看：人们看见十年以前说的话，被人告发出来，也要治罪！一整日，甚至日日，挨过如此不可忍受的束缚之后，得在枕头上倾吐心腹，这种需要是一日比一日更加迫切了。

为避免别人告发，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先发制人。何况听到了可疑的话而不立刻报告出来，是要坐牢或充军的。侦探告密，成为公民道德一部分。人们从最幼少的时代就习练起，能够“告密”的孩子是有福的！

要能进入这个波尔塞伏城小天堂之内，一个悔罪的旧时强盗是不够资格的，还须将同谋的伙伴交出来。给予告密的这个奖赏，本是格别乌办案的一种手段。

基洛夫暗杀案发生至今，警察还在收紧他们的罗网。青年们将请愿书交付于爱弥儿·魏发仑(当他战前不久在俄国旅行时候)，这事维德拉克很钦佩而且叙述得很动人，但今天是一定办不到的；同样，“母亲”(高尔基一部很好的小说中人物)和她的儿子的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随你的便)活动，在今日也是不可能的；昨日人们到处得到帮忙、赞助、保护、庇藏，今日所得的只有监视和告密罢了。

改造过的社会阶梯，从上至下，最荣显的就是最有奴隶性的，最卑鄙的，最谄媚的，最下流的。所有那些敢抬起头来的人，一个个不是被杀死了，便是被充军了。红军^①也许能够稍微避免一点吧？我们是这样希望；因为倘若不然，则这些英勇的和值得我们敬爱的人们就只剩下了一些刽子手，一些投机获得者和一些牺牲品了。

于是乎苏维埃工人，若不是在受恩宠的一辈之中，就会成为被迫害、挨饥寒、受压迫、遭践踏的可怜人物，他们再也不敢抗议了，再也不敢高声诉苦了，——那么，此时他们再去发明一个上帝，而且在祈祷之中寻觅出路，这难道是奇怪的么？他们还能向什么人类力量呼告呢？……

我们在报纸上读到，最近一次庆祝圣诞节时，教堂都充满了人，——这事情是没有什么令我们惊异的。拿“鸦片”来麻醉被欺压的人。

^① 我见过好多海军人员(在塞瓦斯托波尔)，军官和普通水兵。他们和平民间以及他们相互间之关系似乎是亲密而简单的，以致我为之感动。报纸上宣传一个故事，说我在莫斯科一个大饭馆中，看见几个军官进来时，全体顾客都站立起来而且很尊敬的行军礼；——这个谣言造得如此荒谬，我认为没有否认之必要。

*

我刚才发现，在斑鸠笼角上，这斑鸠是从巢上掉下来的，我在这里（顾维位尔地方）养着已经有三个月了，——我刚才发现，我喂鸟的麦粒中有两颗已经发芽了，在最靠近笼内小水槽的地方，槽内的水有时溢出一点到外面来，以此供给这些迷失在笼底和笼边夹缝内的麦粒以必需的水分；这两粒麦子忽然（换一句话说，是我忽然看见的）各自伸出一把淡绿色的薄薄的刺刀，已经有四五公分长了。这本来是很自然的，却使我沉落于惊异之中，以致好长久时间我没有思想其他的事情。这不错：人们数算麦粒，称它们的重量，它们在那儿，柔顺地滚动着，差不多球形的坚硬的和可以翻来复去的。忽然，你看，这些麦子中的一粒向你证明：它也是一个活物！于是乎那凭靠在鸟笼横棍上的管理者大大错愕起来，——他从未曾想到这个事情。

然而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①在我看来，似乎很奇怪地缺乏这种幽默，能够使麦粒柔软以至于生芽。固然，这里是无所用其感情的：凡应由正义解决的事情，就不当求助于慈悲心。怜悯贫困，为贫困而流泪，这就是支持而非阻止贫困。（此外，革命所需要的火药，也不应当弄潮湿的。）

人们所称为“心”的那个事物，因为没有用场而注定要“消亡”^②了。由此生出某种“无情”，有点太过于轻易学得的“无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表现一种异乎寻常的宽宏大量，但尤其表现一种迫切的正义要求。

② 这字眼，我是从马克思主义字汇中借用来的，同列宁一样，他说道（见《国家与革命》）：“‘消亡’这个动词下得非常得当，因为一方面可以表示过程之缓慢，他方面又可以表示其自发性。”（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五一五页）

情”：某种因普遍大改善(或期待普遍大改善)而产生的特有的贫乏。……这种观察将使我牵涉太远了；我保留着。

五

费兰·格列尼耶先生征引《从苏联归来》书中我的几句话而加以赞许；我在那里说“至少，这点是得到了的：在苏联再没有为若干个人利益而剥削大多数人的事情了。这是伟大的。”于是，格列尼耶添加一句说：“不错，同志们，这是伟大的！”以此得到听众的拍掌。

不错，这是伟大的。这曾经是伟大的。但这话业已不确切了。我注重这一点，因为这是重要之点。伊逢说得很对：“资本主义消灭之后，劳动者并不一定就得到解放。”法国无产者须得明白此理。或者确切点说：法国无产者能明白此理也是好的。至于苏联无产者，则他们已开始丧失了那个终能为自己劳动而以此获得尊严之幻想了。无疑，再没有什么资本家股东来剥削他们的劳动了。然而他们仍是受剥削的，而且在一种如此狡狴，如此巧妙和如此隐秘的方式之下受人剥削，以至于他们不知道应当归咎于什么人。这是他们的工资不充足才使得别人能有非分的工资。并非他们得到自己劳动利益，得到自己的“剩余劳动”的利益，而是那些受恩宠者，那些“有见识的人”，那些胁肩谄

笑之徒，那些脑满肠肥之辈。就是靠着这个以及从这种微少工资上抽来的捐税，人们才能支付那些一万卢布以上的大月薪。

为征信起见，我抄录伊逢所造的一张表。^① 没有人敢来否认表中所载的数字：

	极端工资	普通工资
工人	从七十至四百卢布	从一百二十五至二百卢布
小雇员	从八十至二百五十卢布	从一百三十至一百八十卢布
女佣(家庭雇的)	从五十至六十卢布	
	(显然是供膳宿的)	
中等雇员及技术人才	从三百至八百卢布	
大负责人,大专门家,	从一千五百至一万卢布 以上,有人举出某些人 每月收入到二三万卢布	
高等官吏,某些教授,		
艺术家和文学作家		

养老金的比较表也是很有意义的：

工人养老金：每月从二十五到八十卢布，没有什么特权。

高等官吏和大专门家的寡妇的养老金：每月从二百五十至一千卢布，此外还有别墅或住宅供其终身使用，又有儿女的教育经费，甚至孙子孙女的教育经费。

以后还有工资扣存的数目(每月工资在一百五十卢布以下者，一部分豁免)，——大约扣存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一。我不能够征引那整章书，但那整本小册子是值得一读的。

一天五个卢布工资；有时还少些。我试拿来比较一下法国工人工资，甚至于失业救济金。面包，不错，比法国便宜些(一九

^① 见伊逢著《俄国革命之陨落》。

三六年，黑面包一公斤价〇·八五卢布，白面包一公斤价一·七〇卢布），但最普通的衣服，最必需的物品，则昂贵得很。卢布的购买力稍稍不及“整理”前我们的法郎。^① 请你们不要太夸耀工人在工资以外所能享受到的种种利益吧：最常见的是工资愈大，享受的利益愈多。

人们自问：工业制造品，甚至于农业生产产品（牛乳、奶油、鸡蛋、肉类等），价钱为什么这样贵呢，国家既然是卖主？但在商品数量尚未充足，而供给远少于需求之时，使需求的人稍微灰心一下，也并不是坏事。商品只给那些能付高价的人购买的。唯有大多数群众感受物品缺乏之痛苦。

这大多数群众也许会不赞成现行制度，所以重要的是不让他们说话。^②

*

约翰·邦士先生看见平均工资渐次增加时，^③ 十分欢喜：

一九三四年：一八〇卢布（平均工资）

一九三五年：二六〇卢布（平均工资）

一九三六年：三六〇卢布（平均工资）

① 在一九三六年，每月平均工资能购买二二五公斤黑面包。在一九一四年，工人每月平均能得三十卢布，照常时购买力计算，这个数目却能买六〇〇公斤黑面包。

② 所以才有近来几次可怕的大压迫。然而几年前斯大林自己说过：“二者必有其一：不是我们放弃了乐观主义和官僚方法，而让非党的工人和农民，因我们的错误而受苦的，来批评，便是群众愿望渐渐增加起来，终有一天用暴动手段来批评我们。”（摘录斯大林一篇演说，见苏瓦林《斯大林传》第三五〇页所征引的）

③ 弗里曼努力将斯达哈诺夫运动说成为增加工资的一种巧妙手段。我恐怕应当将这运动看作是向普通工人要求更高的生产之一种手段哩！

我请他注意一点，就是普通工人小工资仍是照旧，这“平均”工资所增加的乃是由于受恩宠者人数和他们的工资增加之原故。

何况，在卢布购买力减退和一般生活费用提高之下，这平均工资其实是未曾增加的。^①

于是乎发生这种离奇事情：每日五卢布或更少些的工资，使得最大多数劳动者陷于差不多极端贫困地位，只为了让某些特权分子能支领更大的薪水，^②——并为的津贴加紧宣传费用，使外国工人相信俄国工人是幸福的。我们应希望少知道一点俄国工人幸福，为的让他们少受一点痛苦。

① 官方的统计表告诉我们：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五年，重工业工人全部工资增加百分之五十二；但在同时期中，官吏的薪俸增加百分之九十四·八，商业雇员的薪水增加百分之一〇三·三。此外，由于卢布购买力之减退，这种增加工资绝未含有增加生活舒适之意！

② 这里并不是提出工人应享受他的全部劳动生产品问题，无论马克思或恩格斯都没有这个主张。

一部分的“剩余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使得其他少数人们能偷懒，由此形成阶级对抗。这个剩余劳动，马克思说，“是不会取消的”。（马克思由此指示出：工人不应希望以自己劳动全部为个人的享受。）

他说：“剩余劳动中，一部分是要用来预防意外事变，用来……等等。”所列举的一定是不完全的。应该加进去某种积蓄，除了维持机器之外，还要“养成一批为新进步服务之分子”。我们再加上一项：供养红军，既然未曾社会主义化的邻国迫得我们这样做（而这是“一国社会主义化”之必然的现象）。这点，我想，马克思一定容许的。但他要感觉荒唐的，即是：大多数人的剩余劳动使得其他的人能支领过剩的工资。人们便如此走向形成一个特权阶级，而绝非走向那“减缩那用于物质劳动的时间”的。（《资本论》第十四章）

六

没有感觉到受人剥削，这是伟大的。然而明白现在还是受人剥削，不过不知道受什么人剥削，不知道自己的贫困应归咎于什么人，应反对什么人！……我恐怕色林的意见是对的，他认为这糊里糊涂的痛苦状态，乃是最大的恐怖。他很有力地说：

在我们这里，人们还可以寻寻开心！人们不必勉强夸口！人们还是“被压迫者”！人们还可以将命运所折磨的一切记在那些吸血鬼的账上！记在“剥削者”蝎子的账上！此外还可装作老粗的样子，无知无识的！……但到了连破坏的权利都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呢？到了人们连喘气都不能的时候，怎么办呢？那种生活就变成不可忍受的了！……（《吾之罪》）

今天早晨（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日），X 很得意的样子，拿来昨晚的《时报》读给我听：

“在两次五年计划期间，乌克兰的预算增加了七倍以上。^①

^① 这并不引起小工资之增加。总是牺牲小工资的工人，来构成这“积累基金”的。

新预算支出方面最大部分是用于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其中二百五十六万四千卢布用于教育，一百二十二万七千卢布用于公共卫生。”——喂，你对这段新闻有什么意见呢？

打开了路易·费雪儿的书——这书本是很恭维苏联的——在第一九六页上，我读了一段回答 X：

我有一种印象，觉得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正在对竞争者让步了，因为在建筑中的十六个新疗养院（在基斯洛沃德斯克，“世界上最大的温泉浴场”）差不多都是由国家机关建筑的，譬如国家银行，重工业委员会，邮电委员会，真理报馆等等。所有这些机关都雇用着工人；但我想其中官吏比工人更容易获得铺位和浴场罢。”^①

路易·费雪儿是很可爱的，当他说起“工会的颀颀的”时候。听他的话，似乎工会只要愿意，就能够阻止“政府官吏，工程师以及其他占据要津的人，去霸占最好的房间，去夺取疗养院内他们应分的以外的东西……”，不，不；在官僚分子统治之处，工会是没有力量的。无产阶级专政，——人家告诉我们。我们渐渐地离此愈远了。渐渐地成了“官僚分子对于无产阶级之专政”。^②

因为无产阶级甚至没有可能选举一个代表来保护他们的被侵犯的利益了，人民选举，无论公开的或秘密的，都是一种玩笑，

^① 路易·费雪儿关于苏联的书是很有趣味的，非常有利于苏联，然而暗藏着批评，善读者可以看得出来的。

他关于高加索某些小邦之可爱的描写，使人想起苏维埃大树的枝条还是翠绿的；腐化的乃是主干本身。

^② “其实，工会同苏维埃一样，已经停止存在了（在一九二四年）。工人们得不到这个浪费机关的保护或援助，这个机关操在一群约二万五千个官吏手里，严格隶属于党部。”（苏瓦林著《斯大林传》第三四七页）

一种骗局：从上至下都是委派的。人民只有权利选举那预先指定的人。无产阶级受人玩弄。他们被人家堵塞了嘴巴，捆绑了手足，差不多丝毫不能反抗。啊，斯大林这盘棋下得好，赢得好，得到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大喝彩，他们至今还相信，而且将有好久相信：至少在苏联，他们已经获得胜利；他们将那些不喝彩的人认做仇敌和叛徒。

*

官僚分子自从新经济政策结束之后势力大大加强了，钻进苏维埃农场和集体农场里面去。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六日《真理报》调查之后，估量：农业机器站（举此为例）人员中，没有作用的雇员占全体百分之十四。^①

这些官僚分子，起初作为管理工具，后来作为统治工具，而产生出来，斯大林自身就是他们的奴隶，——有些人这样说。再没有什么事情比遣散一些没有个人能力白耗公费的闲员更困难了。鄂终涅启辛在一九二九年就已惊讶于“这一大批的饭桶”，他们不愿意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只为阻止社会主义之成功而工作。“没有方法对付又没有事情需要的那些人，就安插在监察委员会里头。”——他说。但这些人愈加无能，斯大林就更可以依靠他们的附和主义的忠诚；因为他们的特权地位是只依靠恩宠得来的。不用说，他们都是现行制度之热烈的拥护者。替斯大林的幸运服务，同时就是保护了自己的利益。

*

^① 官僚分子所糜费的款项，在战前，占全国收入百分之八·五；在一九二七年则为百分之十九。最近几年的估计，我尚未见。

列宁的防止官吏变成官僚，而提出的不可缺少的三条件：第一，可以随时罢免和选举；第二，薪俸与普通工人工资相等；第三，人人参加监察，使得——他坚持这点——大家暂时都是官吏。而没有一人能变成“官僚”。这三个条件，没有一条履行过。

从苏联回来后，人们重读列宁那本《国家与革命》小书，就非痛心不可。因为今天，在苏联，人们是比昨天离得更远了，我不仅说是离开梦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且说是离开那个能走到社会主义的中间阶段。

在列宁那本小书内，我们还读到如下一段：

考茨基的话总括起来是：只要有选出的雇员，就有官吏；可见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仍旧有官僚政治的！这话再错误没有了。马克思拿巴黎公社做例，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执行公务的人，就不成其为“官僚”，不成其为“官吏”了，这是要看人们于选举之外还设立随时罢免制，要看人们将薪俸缩减到一个工人的普通工资，要看人们拿劳动机关来代替议会机关，即制定法律并执行之。^①

于是乎人们自问：考茨基今日是否要反唇相讥呢？考茨基和列宁两人中，斯大林究竟要监禁或枪毙哪一个呢？

^① “工人革命之第一阶段，乃是无产阶级之构成为（高升为）统治阶级，乃是民主政治之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有名宣言中说。“民主政治之胜利”——不错，但民主政治并没有战胜人，而是被人战胜了。（列宁的这段话，中译文又见《列宁全集》第二版第三十一卷第111页。——中译本编者）

七

新宪法中有好多处表示它立意来预先回答人家的批评；来闪避那些它心里明白是应得的攻击。当权的人完全明白政治机构的指导权已经离开民众之手；明白民众和那自称为代表民众的人中，已经断绝了一切真实的联系。这正是他们所要的。所以更加需要使人相信：这种联系将是最密切的，“群众对于苏维埃机关之监督将更加强，苏维埃机关亦将更能对群众负责，”如三月十三日《人道报》所说的。《人道报》还加几句话：“新选举制将巩固那被民众选举的人与选举者群众之联系。”不错！好得很，那篇论文接着也能不掩饰人们的意图，即人们要来“指导选举，要来批评那些恶劣的候补人，不等待他在无记名投票失败之时，就先出来反对他们”。这种聪明的预见确是值得钦佩的。你想想，重复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九日之错误，是如何令人不快！那日给了民众可能机会，选举出（譬如在基辅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一些本党仇敌，今日才揭穿其假面”。由此可见必须迅速于选举以前“扑灭一切足以妨害党的活动核心之发展的”。完成此工作，然后选举才能是“自由”的。

我害怕某报编辑要受处罚，它——我不说明何报，怕会陷害它——虽然完全尽忠于斯大林的苏联和新宪法，却敢在赞美之中提出这个畏葸的责难（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我们恰恰害怕，在现行制度之下，国家机关会不与劳动者群众相合一，如在当初苏维埃制度之下一样，却反而倾向于离开群众。”

“——为什么？……”

“——正是因为选举人中间有距离，选举人和他们的代表中间也有距离。”

这个不谨慎的批评还敢提醒这件事：“最近的统计表示六十个公民中平均曾有一个在某级苏维埃当代表”，而“这苏维埃，无论怎么样，当初总是金字塔中一块石头，而能施影响于国家政治的。”然而恰恰是这个成了眼中钉呵。恰恰是这个必须整顿一下：“下层的常设的政治细胞已经不存在了。”^①

所以，我们不能不完全赞同瓦尔脱·西特令爵士的宣言，他说他“确信苏联同其他独裁制国家一样，是少数一群人统治着，广大民众对于国政完全无份，^② 或只有很小参与一部分。”

*

归根到底，都是人民付钱，即令是间接的。这个方式或那个方式，——由于将民众最大需要的粮食输出国外，或使农产品的价格与同此物品付于消费的价格相差甚远，或由于直接征

① 我绝不相信什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智慧；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容许这最大多数人受痛苦时候能使人听到他们的诉苦声音，而且代他们说话的人，人们也愿意留心听他。

② 西特令原文是“自今以前完全无份”；但他在一九三五年说的这句话，现在新宪法实行之后，他仍可以重说的，而且更有把握来说的。

税，——总而言之，都是牺牲工农阶级利益，牺牲他们的消费黄金，以构成必需的而且不断欠缺的积累基金的。从第一次五年计划以来就是这样了，以后仍是这样。这个积累基金，除了应供推动全部机器之用以外，还做些实际的、有用的、慈善的事业，那还是可以原谅的。医院、疗养院、文化机关等等，人们还相信，民众蒙受其益，或希望民众将蒙受其益。然而在这样的窘迫时候，这个积累基金却拿来建筑一座“苏维埃宫”（已故的苏维埃之宫），使得约翰·邦士同志大为惊愕。你试想想！一个四百十五米高的建筑物（他说：“纽约人要相形见绌的。”），顶上安着一尊七十米至八十米的列宁像，用不锈钢铸的，像的一个指头就长十米。^① 好呵，那时至少工人可以知道：他们为什么事情饿死的。他们还能这样想：这是值得的。虽然没有面包，却有可供夸耀的东西。（拿来夸耀的，也许是其他的人。）而最可钦佩的，将来人们还要叫工人投票赞成这宫殿，你看罢；而且还是一致赞成哩！人们将问他们，俄罗斯民众：是生活更舒适些好呢，还是宫殿好呢？于是乎没有一个人不回答，不得不回答：还是宫殿好。

“我看见首都一座宫殿建筑起来，我就觉得看见全国居室沦为破屋了，”卢梭说过这话。（见《民约论》三卷，十三章）苏维埃工人的居室“沦为破屋”么？呵，谢谢斯大林！他们现在还是住在猪栏里头哩。

*

这一切，我在苏联旅行时候，还不知道，正如我在刚果旅行

^① 我们绝不敢怀疑约翰·邦士所征引的数字，此处所说的尤其不敢怀疑。但一尊七十至八十米高的像，有十米长的指头？……至少我们希望，列宁是坐着的。

时候不知道那些大专利公司的作用一般。这里同那里一样，我看出了那些悲惨的事实，却还不能彻底明白其原因。到了写完我的关于苏联的书之后，我才研究清楚。西特令、托洛茨基、麦西耶、伊逢、维多·绥奇、列格、鲁朵尔夫以及好多其他的人，供给我以他们的证据。他们所告诉我的，以及我所推测到的，都来证实并加增我的恐惧。现在正是法国共产党应当睁开眼睛的时候了，正是人们应当停止对它说谎的时候了。不然，劳动者群众就要明白他们是受共产党人欺骗的，正如今日共产党人是受莫斯科欺骗的。

八

三年以来，我太沉溺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以致到了苏联反而觉得在异乡异俗过生活似的。他方面，我也读了太多的旅行记，赞叹的描写，辩护的文章。我的大错误，就是太过于相信夸奖的话。也是因为凡是能够警告我的话，都是以怨恨的口气说的……爱比恨更能得我相信。不错，我曾有信任心。此外，那边令我烦恼的，却不在于那些缺点，而在于立刻又遇着我所讨厌的那些利益，我所希望取消的那些特权。固然，人们设法来尽可能地款待一位宾客，到处拿最好的事物给他看，——这我觉得也是很自然的。然而使我惊讶的，乃是在这最好的事物和普通的事物中间有如此大的差异；在如此平凡或如此恶劣的普通事物旁边，那特权却显得如此过分。

这也许是我的精神及其新教徒教养之一种怪癖吧：我不信任那些有利可图的观念和那些“附和”他人的意见；我的意思是说：传播那些观念和意见而希望从中图利的一些人。

我看见苏维埃政府拿许多特权给予艺术家和文学家，给予所有那些能够向它唱赞美歌的人们；而这不一定是意图贿赂的。

然而我也看见：文学家拥护政府以及那有利于政府的宪法的时候，所能得的特权未免太多了些。我立刻就当心注意了。我害怕给人家诱惑过去。在那边，人家献给我的过分的利益，使我恐惧。我不是为重见特权而到苏联去的。在那边等待着我的，是确确实实的特权。

为什么我不应当说这话呢？

莫斯科各报告告诉我，在几个月中间，我的书销行了四十万本。请你们计算一下，作者应得的版税有多少。我的论文稿费又付得如此之多！倘若我写一本赞美苏联和斯大林的书，我将获得多么巨大的一笔财产！……

这些顾虑并不能阻止我称赞苏联，但也不能阻止我对它的批评。但我得承认，凡是能够执笔的人，只要他朝好方向写去，都能获得这种异常优越地位的（比在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更加优越），而这情形却不少警告我。文学家是最受所有苏联工人尊重的。我的两位旅伴（每人都有一本书译成俄文，在印刷中），在古董店，在珍品店，在旧物店，跑来跑去，不知道如何花费那几千卢布，那是他们刚预支来的版税，他们知道是不能带出国外的。至于我，则我仅仅能够用去一笔大款的零头数目。因为那边什么东西都是献给我的。不错，什么东西都是：从旅费起以至于香烟。每逢我拿出钱包来付饭馆或旅馆的账时，来开发货价，购买邮票或报纸时，我们的向导的美妙的笑容和威严的手势便阻止我说：“您开玩笑啦！你们是我们的贵宾，您和您的五位旅伴。”

自然，我在苏联旅行，自始至终，我个人没有一点不如意的地方。一切恶意的解释，造出来减弱我的批评力量的，其中最无理的一个便是企图将我的批评说做我个人不满意的表示。我从

来未曾在如此奢侈的条件之下旅行过。我们坐的是专车或最好的汽车，住的总是最好的旅馆中最好的房间，最昂贵的，最华丽的，选择得最精致的。而且何种的接待！何种的照应！何种的欢迎！到处受人欢呼、恭维、优礼、庆贺。拿来献给我的，人家是没有一样觉得太好，太可惜了。我若拒绝这类款待，将惹得人家不高兴；我做不出来；我由此保持了一种绝妙的纪念，一种热烈的感激。但这类款待本身令我不断地想起了特权，想起了差异，而在那里我原想见到的是平等。

我勉强摆脱了官方监视，便去同小工往来，他们的工资每天只有四或五个卢布，而用来款待我，我非到临不可的那种宴会，——你们要我作何感想呢？差不多每天都有一个宴会，点心小菜之多已够人吃了三个饱了，而正餐还未开始哩！六大盘的盛筵，足足有两个钟头之久，使得你不耐烦。何等的浪费！我从来没有能看见一张账单，可以让我确知一餐的代价。但我的一个旅伴，很熟悉物价的，估量每次宴会，每客须费三百卢布，连酒水在内。我们一共六个人，连我们的向导七个人，时常还有同样多的主人和陪客，有时还多得多。^①

在整个旅行当中，确切说，我们并不是国宾，而是有钱的苏

① 我摘录我的旅途随笔一页如下：

“宴会约定在八点钟，八点半钟开始入席，九点一刻钟尚末端完餐前小菜。（我们在文化公园洗过浴，赫巴，达比，柯尔佐夫和我；我们肚子饿得很。）我吞食多量的小点心。疗养院有人等待我，九点半钟，我看见端来汤匙的时候，就退席了；一种蔬菜汤，里面有几块鸡肉。人们宣告有虾尾，有香菌，有鱼，有各种烧烤及蔬菜。……我离席去收拾行李，以后又写“几行”给《真理报》关于今日典礼的。我回来时还得吞下一大块冻肉。我不仅害怕而且厌恶这种盛筵（我须得同柯尔佐夫说去）。这种盛筵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反社会的。”

维埃作家协会邀来的客人。每逢我想起这个团体款待我们的费用时，我不禁怀疑：我的著作权金矿，即使完全送给它，是否足够赔偿它的损失。

显然，他们如此慷慨接待我，是希望收回另一种的利益。我想《真理报》对我的气愤，一部分是由此而来的，即是：我是不十分有“出息”的。

*

我告诉你们，在我的苏联游历中有种悲剧的成分。我以一个热情的人，一个虔信人的资格，来到苏联，为得欣赏一个新世界，而人们却拿旧世界中我所厌恶的一切特权献给我，藉以诱惑我。

“你不明白的，”一位优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告诉我，“共产主义不过反对人剥削人制度。——这话我应当向你重说几遍呢？这事办到了，你便可以同阿列克西·托尔斯泰或大歌舞院的一位歌人同样富有，只要你是凭靠个人劳动获得财产的。你对于金钱、财产之轻视和仇恨，我认为是你的当初基督教观念的一种很可惋惜的残留物。”

“也许是这样。”

“那么你应当承认，这类观念是不合于马克思主义的。”

“可惜得很！……”

我很知道，而且人们反复告诉我：某些性格，有时是最可爱的，譬如那种忽然的亲密，那种不经思虑的慷慨，立刻获得我的同情的，以及那些无可遁逃的错误，以致败坏了良好成绩的，——这一切应归咎于俄国人的半东方性的气质，而不应归咎于新制度；这一切，优点或缺点，我在俄国帝制时代也可见着的。

同样，我也相信，若期待或希望社会环境不同，便可彻底改变人性，那就是一种错误。请大家听我说：重要的、足够的，乃在社会环境不同可以容许人性之改变；而这是了不起的。但那绝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这里没有机械的东西；而且没有个人预先改造的话，我们就会看见：资产阶级社会又形成起来了，“旧人”又出现了，而且又扬眉吐气了。

当某人还在受压迫的时候，当社会不平的束缚使他屈服的时候，人们有权利希望他的身上蕴藏着许多力量。犹如人们期望某些神童，但他们以后时常变成了非常平凡的成人。人们时常有这种幻想，以为某民族包含着比其余使人失望的人类中更良好的人物。我则简单相信这民族是较少“腐败”罢了！但金钱也能使之腐败，同其他民族一样的。你看在苏联发生的事情：这个正在形成起来的新资产阶级，具有——我们的资产阶级的一切恶德。它刚从贫穷地位爬上来，就已经看不起贫穷的人了。它贪图那好久没有的一切好处，它知道应当如何去获得并如何去保持起来。“这些人果真是实行过革命的人么？不是的，这些是享用革命利益的人。”——我在我的《从苏联归来》中写过这几句话。他们可以加入共产党，然而心里没有丝毫共产主义者的气味。

九

然而这点仍是确实的：俄国民众表现快乐。这里我完全同意维德拉克和约翰·邦士所引证的事例。我每读他们的旅行记，都要怀恋不已。因为，我也说过了：没有一个地方能像在苏联一样，人民本身，街上所遇见的人（至少青年人），所参观工厂的工人，以及拥挤在休息、文化或娱乐场所的那些群众，是如此笑容满面的。这种外表和可怕的贫困，怎样能够调和呢？——人们知道最大多数人今日是陷于那种贫困之中的。

那些在苏联游历过很多的人，告诉我：维德拉克、邦士和我自己将会懊恼的，倘若我们离开了大中心区和游客大道以外。他们说起了整个的区域，那里一眼就看出穷困状态。此外……

在苏联，贫困是不容易看见的。贫困隐藏起来。人们说它是有罪的。它不引起怜悯，引起慈悲救济，反而惹人轻视。出来给人看的，正是那些牺牲此贫困而获得舒适的人。然而，人们还是看见好多其他的，甚至挨饿的人，他们仍是微笑着，他们的幸

福，我说过，乃是由“信任，无知和希望所构成的”。^①

“如果我们在苏联所见的一切都是表现快乐的，那也是因为所有不快乐的人都成了可疑人物，愁苦的人或至少现出愁态的人是极端危险的人物。俄罗斯不是诉苦的地方，要诉苦须到西伯利亚去。

*

苏联生产率是相当高的，多残杀些人也不容易见得出来。贫乏愈麻木，就愈加悲惨。那些失踪的人，那些被致使失踪的人，乃是最有价值的人；在物质的出息上也许不是最有价值的，然而恰是他们能不同流合污，能表现与群众有别，而群众之统一，其整齐性，是全靠一种庸俗性维持着的，这庸俗性愈变愈下流了。

在苏联，所谓“反对派”，其实就是自由批评，就是思想自由。斯大林只能容受颂赞；一切不喝彩的人，他都认为仇敌。时常，他把别人提议的改革，当作自己的东西；但倘若他占取了那种观念，那么为使之成为他自有之物的原故，他就先铲除那提出此观念的人。这便是他的做到时时刻刻都“正确”的手段。如此，不

① 然而还须提到俄罗斯民族的一种神奇的生活力。“一只猫的生命力”，陀思妥也夫斯基谈论自己说，当他惊异他经过种种难堪的磨难，虽然痛苦，却仍未受挫折的时候。一种对于生命的爱，战胜了一切，即令是由于冷淡或无情，但宁可说最常见的是由于内心的丰饶，娱乐，抒情，一种未为人所解释的，不可解释的快乐之奔放；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以什么方式，无论于什么地方。……我应当说：一种对于幸福之非常的能力和趋向。不顾一切。正为这个原故，陀思妥也夫斯基才是如此足为代表的。也正为这个原故，他才如此深刻地，如此友爱地感动我，而整个俄罗斯民族经过他，同着他一起，来感动我。无疑，没有一个其他的民族，能够如此宽宏地去忍受这样悲剧式的试验。

久之后，在他周围将只剩下那些不会派他错误的人了，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观念的。这就是专制主义之本性：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不是有价值的人，而是那些吮痂舔痔者流。

无论为了什么罪案，送了无论哪个劳动者到无论那个法庭去，无论这劳动者如何无辜，倘若上头要处罚他时候，律师起来替他辩护，这律师就要遭殃了。

*

还有那些充军的呢，那些几千几万充军的呢，他们当初不知道，也不愿意，在应当低头的时候低下头来。

我绝不需要，同某日 M 那样思想：“他妈的！终有一日轮到我……”这些被害的人，我见着了，我听着了，我感觉他们就在我的身边。这是他们的被堵住嘴巴的叫喊，昨晚唤醒了我；这是他们的缄默使得我今日写这几行字。正在想着这些殉道者，我才写下这惹起你们抗议的几句话；倘若我的书能到他们手里，则他们的无言的感激，对于我，是比《真理报》的恭维或咒诅重要得多的。

没有人肯出来为这些被害的人说话。右派报纸至多利用他们来攻击右派所仇恨的制度；至于那些衷心藏着正义和自由观念的人，那些为援救台尔曼而奋斗的人，那些巴比塞，那些罗曼·罗兰，则一声不响；而团结在那些人周围的，是被人蒙住眼睛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

然而当我气愤起来时，你们便向我解释（而且以马克思之名解释！）说这恶现象是确实的，是不可否认的（我说的不仅是充军，而且是工人生活的贫困，工资的不够或薪水的过分，特权的再得，阶级的巧妙恢复，苏维埃的消失，以及一九一七年所得的

东西的逐渐烟消云散等)；你们很聪明地向我解释说，这恶现象是必要的：而你们这些有知识的人，这些用惯了辩证法论证(狡辩)的人，容受了这恶现象，认为是暂时的，是能造成一种更大幸福的。你们有知识的共产党人，你们同意承认有这恶现象存在了，但你们以为宁可对那些人隐藏起来才好，他们知识不如你们，也许会气愤起来的。……

让人家去利用我的著作罢，我不能阻止，即能亦不愿阻止。但对着政党而写些东西，让人家可以利用去，——这我做不到，这是别人的事情。我已经警告过我的共产党新朋友，自从我们发生关系时候起就警告过：我将不是一个叫大家完全放心的新同志，一个一成不变的新同志。

“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者，党应视之为“动摇分子”，可以利用他，但应当时时刻刻留心他，——我曾在什么地方读过这几句话。哦，这是何等的正确！我曾屡次同瓦扬·古久里说这话，但他不肯听。

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束缚我，能够阻止我去爱真理，去爱真理过于爱党。一到说谎话的时候，我就不惬意了；我的责任就在揭穿谎话。我所依附的乃是真理，党若离开真理，则我立刻离开党。

我很明白(你们也告诉我很多次了)：“在马克思主义观点上”，“真理”是不存在的，至少绝对意义的真理不存在，有的只是相对的真理；但这里所关的正是相对真理啊！你们伪造了的，正是相对真理！我相信，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要想欺骗别人的时候，已经是在欺骗自己了。因为这里，你们所欺骗的，恰正是你们自以为为之服务的：即民众。一面令民众盲目，一面就不是好

好替民众服务的。

必须如实地观看事物，而不应当以希望其所应成就的态度来观看事物。

苏联不是我们所希望于它所应成就的，不是它允许我们的，不是它此时还努力装扮着的；它已经违背了我们的一切希望了。我们若不容许这一切希望落空的话，则应寄托之于其他地方。

但我们的眼光并不从你转移开去，光荣的和痛苦的俄罗斯！假如当初你做了我们的榜样，那么现在——可惜！——你就显示我们：一种革命能陷落于何种沙地之中。

附 录

旅 伴

害怕一个人不够，我于是邀来五人和我结伴。这也是为着要让他们分沾此次旅行的种种非常便利的条件。他们预先就快乐了，简直是欢喜若狂了；他们同我一样地热心，倾心于苏联及其所预计的整个未来时代，都是这种政制的热烈的崇拜者，然而与我又是差异很多的；就他们的年龄说（都是比我年轻得多），就他们的气质、教养和环境说；他们相互间也有很多差异；虽然如此，我们互相仍是非常地了解。是的，我想，为看得明白和听得清楚，六对耳目是不会太多的，而且为的能够相互交换各人的一定不会相同的感想。

这几个旅伴，你们都认识的，就是：耶夫·拉斯特、雪夫灵、欧珍·达比、彼尔·赫巴、路易·季友。

这五位旅伴中，有二个是很老的党员，很忠实的，很积极的。

有二个能说俄国话。此外，耶夫·拉斯特这番是第四次苏联旅行。彼尔·赫巴则最近六个月就在莫斯科居住，他在那里主持一个宣传杂志，《国际文学》，每期用四国文字出版；这就使他很熟悉那些阴谋诡计，很通达内情。此外他又特别地精明。他指教我不少，我的意思是说：他给我解释了好多事情，没有他我自己一定不了解的。我举出小小一例如下：

我们到莫斯科第二天（彼尔·赫巴和我是从巴黎坐飞机去的，那时他刚回巴黎来，住了三天；我们比其他几个旅伴先去，他们坐苏维埃轮船，十天之后才到列宁格勒），布哈林就来拜访我。那时布哈林还是很受人尊崇的。最近一次，我不记得那个会议上，他出台时候，群众热烈地向他欢呼。然而已经有某些排斥他的征兆阴险地露出来了。彼尔·赫巴为要在他主持的杂志上登载布哈林一篇很可注意的文章，竟遭遇很大的反对。这都是值得知道的，但我后来才晓得。布哈林是一个人来的。但他刚踏进首都旅馆人家给我居住的华丽房间的小客厅内，就有一个自称为新闻记者的混进来，参加我们的谈话，弄得谈不成功。布哈林差不多是立刻就起身走；当我送他到候见室时，他告诉我：希望再同我见面。

三天之后，我又看见他，在送高尔基下葬时候，确切点说，在下葬前一天，那时民众得到允许，好几个钟头列队在大停床前经过，停床铺着花，高尔基尸体尚未烧化，就停在那上面。在一个小得多的邻近厅堂内聚集着那些“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也在其内，我尚不认识他，现在我向他行礼。布哈林就在他近旁。我离开季米特洛夫以后，布哈林就拉着我的臂膀，靠近我身边说：

“一个钟头之后我可以去访你么，在首都旅馆？我有话同你说。”

彼尔·赫巴陪伴着我，他听到了这几句话，于是低声对我说：“我敢打赌，他一定做不到这个事情。”

果然，柯尔佐夫看见布哈林曾靠近我身边，就立刻把他拉到旁边去。我不知道他能对布哈林说什么话，但在我居留莫斯科的时期中，我就未曾再见布哈林一面。

没有这个小小的指教，我就不明白的。那时我一定以为是冷淡，是疏忽；总之我将以为布哈林并不重视再同我见面的，但我永远想不到他是不能再见我的面。

*

彼尔·赫巴和我到列宁格勒码头上迎接了季友、雪夫灵、拉斯特和达比，然后我们坐了专用车厢回莫斯科来。几天之后，同一个车厢把我们拉到奥尔忠尼启则地方去，以后三辆很舒适的汽车载我们穿过高加索，第三天到了梯弗里斯。我们到这格鲁吉亚首都，照预定的行程迟了一天，以致很客气地到山中他们的国土边界汽车站上来欢迎我们的那些格鲁吉亚诗人等候了我们二十四个钟头。我趁此机会，在这里说说：我何等感受他们接待的好意，他们的恳挚，以及他们的礼仪的自始至终的殷勤。倘若由于什么奇迹，这本书能到他们手里的话，那就愿他们知道。不管别人能对他们说些什么话，我仍旧是深深感激他们的。

二

梯弗里斯这地方，起初使我们大大失望，但以后一天比一天更迷诱我们了。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星期。我们就是从那里出发到卡黑底做了四天旅行，很好；而且各方面都是最有趣味的；但很辛

苦，以致不大习惯于旅行疲劳的雪夫灵和季友两人回来后，宣布说：他们看够了，种种情绪也感受过了，他们渴想回法兰西去。

我们离开了他们两位，很觉惋惜，因为有他们做伴是很有趣味的。但以后我们也庆贺他们两人幸而未曾经受因渐渐炎热而增加的疲劳。

然而我们旅行的第二部分是最富于教训的。没有以前那样死板，那样受束缚，我们还能更直接同民众接触；仅仅是从梯弗里斯开始，我们的眼睛才真正睁开了。

自从二十年来——有些人说，但其他的人则说：自从十五年来——此地没有今年这样热了。但我们未曾因热而衰疲，而且没有一点征兆能使我们预见三星期后使达比丧命的那个病症。我要抗议而且要气愤愤地抗议某些关于达比病症的恶意的暗示。诊断错误，——那些最少恶意的人说。在苏联，人们将好多因各种成串的球形菌致成的类似的传染病，都称之为“猩红热”，——这本是可能的。我以为真正猩红热一开始要呕吐的，达比并没有这个特征。我回巴黎以后一个时候，偶在一本医学杂志上看见一张病症统计表，我很惊讶：在苏联，“猩红热”占的比例数如此之大，无论同其他国家比较，或同苏联其他病症比较；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使我猜想：这个病名，在苏联比在我们国内，更富于弹性和更常使用的。但这点说过以后（这里说不上诊断错误，——这种事情也可以在巴黎发生的，我有两个可痛惜的例证：查理·路易·菲力和杰克·里维叶两人，病初起时都被当作一种简单的流行性感冒来医治，到了认出是伤寒症时已经太迟了），我就坚决说：达比是受了最细心的最周到的医治的，由于塞瓦斯托波尔地方三个最好的医生，而且由于女同志波拉，她在这

里还是表现十全的恳挚。

同样，我也必须抗议另一种恶意的暗示，关于达比的笔记的。这些笔记以及其他属于他的一切稿件，都由我经手送给他的家庭了；不错，被扣留了一个时候以后才送去的。其实里面绝对没有使检查官为难的地方。达比是非常谨慎的。他不止一次告诉过我：他要把说话之责托付给我。^①他很担心，不愿加入那

① 最后几时，耶夫·拉斯特和彼尔·赫巴两人轮流地和他同房间，他有机会同他们谈话，比同我更多而且更亲切地。他们两人知道这个。为此原故，他们出来抗议彼尔·西采先生对于我的这个攻击（这个攻击，后来弗里曼也拿来用了，虽然是一种很有礼貌的声口说出来的），即说我滥用了达比之名，献我的书给他，写道：“我在他旁边，跟着他，所见闻的，所思想的之反映。”

摘录彼尔·赫巴一篇论文。

“我要告诉弗里曼——回答他关于《从苏联归来》上给达比的献辞的话——以我同达比在塞瓦斯托波尔一次谈话，在他死前不久。他表示非常担心纪德回法国后要公开发表与他在旅行中时常有同感的那些恐惧。‘他将会说得好的，’他说，‘人们将明白他是以友人资格说话的。’

无论人们对这种献辞的感想如何，但我认为绝不能反驳纪德将我们的朋友的名字连结于他对苏联的感想的那种权利以至于义务。

（《星期五》，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还有耶夫·拉斯特这封信。

我的亲爱的弗里曼：

我十分惊讶读到你的论文中如下一条小注：

“但达比不会比纪德更进一层，批评，完成这些印象么（他打算延长在苏联居留期间，说起还要再来的话）？他不会更胜于纪德认识心理学价值以外发生的事情么？他曾允许给予这些印象（当我们在黑海相遇时候，他自己曾对我说这些印象是不充分的）以这样大的政治意义么，而且在这样一个时候？

“这些问题是可以提出来的，只要是提出出来，我就没有权利默而不言。”

这话，我认为不很确切。

在梯弗里斯，达比就已开始感觉旅行无味了，一种令人为难的态度。我同他有好多次的谈话，但他从来未曾表示要更长久留在苏联，或再来一次。恰好相反，他固执地反对延长旅行计划去游基辅。他要立刻回莫斯科去，由那里坐飞机回巴黎。达比屡次表示愿在西班牙一个小乡村中安静地工作，完成他的关于希腊人的著作。苏联有好多事情使他不喜欢，但我们对这些事情感想，始终是很差异的。达比时常同纪德谈论这些事情，他自己既然不是一个有战斗精神的人，他便将说话之责托付给纪德。我敢说，纪德写的那本书，正是达比所期待并要求于他的。

耶夫·拉斯特

足以扰乱他的安宁和工作的辩论。在最后几天，他差不多是唯一地顾念着这个工作，即他同我说了好多的那部小说，他计划再写，完全改写，现在他更看清楚了他要写的是什么；我想，他出发旅行前所写的一百页左右稿子，将差不多完全抛弃了。

“回国后，我即将从头写起，”他屡次对我们说。而这个内心要求如此逼迫他，以致他说：他要单独回去的，倘若我们在归途中还要耽搁的话。那时正有人提议到敖德萨及基辅去的。

达比同我一样，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也表示对好多事情很痛心，虽然他也看到那些能使人欣喜的东西，因为他同我们一样希望在苏联只见着这些使人欣喜的东西。达比是从下层民众出身的，他的心和精神都深深关切于无产阶级利益；他方面，他的气质是很少战斗性的，与其说他接近于吉诃德先生，毋宁说他接近于桑科·邦札；他自立一条蒙田式的箴言，认为生命是比任何理想更可宝贵的，人们不值得为任何理想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表示很担心西班牙事变，他的忧虑也可以从这里看出来，即人们若有个时候怀疑政府军之胜利，他也是受不住的。这个胜利，他不以支持之或相信之为满足：他不断地需要将这胜利看作是有保证的。但他激烈反对耶夫·拉斯特，当拉斯特说起要到西班牙去，加入民军作战（他以后不久果真这样做了）时候。某天晚上，在塞瓦斯托波尔，即我们在一起过的最后一日之前夜，我看见达比真正发气起来了，而他平时是如此恬静的。耶夫·拉斯特刚宣布说：他宁可看见他的儿女死，不愿看见他们受法西斯统治。

“你这话说得岂有此理，”达比于是叫喊说（这是第一次，我听他用如此声调说话），一面用拳头捶桌子，我们刚在这桌上吃完了晚饭。“岂有此理！你没有权利为一种观念牺牲了别人的

生命,也没有权利牺牲你自己的生命。生命是比一切都更宝贵的。”

他还说了好多,忽然有了一种非凡的口才。耶夫也是雄辩滔滔的。我只限于听他们说话,有时赞成这个,有时赞成那个,随着那一个人在说话;或宁可说:倘若我比较地钦佩耶夫和那鼓动他的热情,那么我是特别赞成达比以及他的反抗起来的良知的。尤其我想:人类中有这个人 and 那个人都是很好的,好在这个可以调剂那个。但忽然我来干涉了,当耶夫回答达比谈起了“怯懦”时候。我抗议说,“怯懦”这个字眼在我们中间是不能行用的,倘若时常需要一种大勇去战斗的话,那么有时也需要同样的大勇来宣告说:不战斗。

在写这几行字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卓诺和他的《拒绝服从》。达比很喜欢卓诺,而且在某几方面很像卓诺。这两个人是很有兴味和有“菜汤感觉”的(同有此感觉的人才能懂得这话的含义)。^①我们在格鲁吉亚时常说起卓诺,我们以为这个洪荒的和饶沃的国土是非常能使他喜欢的,我们又以为他将感受很多痛苦,在那些失却了“菜汤感觉”的地方。

并非达比完全感觉旅行无味,而是他终于比我们较少兴趣去注意旅行;他渐渐地爱好独处了,专心于读书或写字。^② 那时

① “他们撒谎。他们都撒谎,”X告诉我们,在梯弗里斯,谈起了苏联当权者时候。那时只有赫巴和我听他说话。“他们完全失却了和真正现实的联系。这些都是理论家,都迷失在抽象观念里面。”他的声音因兴奋而颤抖了。最后就说了这句话,起初我没有大注意,以后赫巴时常向我提起,因为他认为这话妙得很(本来是妙得很),时常征引来说:“他们都已失去了菜汤感觉。”

② “我是何等愿望寂寞和安静!”死前不久几天,他在他的秘密笔记中写过这句话。

他读孟果译的《死魂灵》，这书是我带来的；他时常读一段给我欣赏。尤其果戈理诗集第二卷头上附的《四封信》中几行字，即我在我的《从苏联归来》书中所征引的。还是因为有几行，就使得我们怀疑：是否真如人们所常说的，俄国帝制的时候没有或差不多没有给民众做一点东西；至少没有可供人们夸耀的东西？

差不多一百五十年过去了，自从彼得大帝开了我们的眼睛，叫我们学习欧洲文化，并将一切实行手段交付于我们之手……

自从那时以后，“政府不断地活动，由这些可以证明，即是：几大本章程，法律和命令，好多新建的房舍，出版的书籍，设立的各种教育、慈善、赈济等基金，至于那些外国政府设施中找不到的东西还不算在内哩。”

不管苏联如何铺张，我们由此可以知道，这手段不是今日发明的。

旅途随笔摘录

那个永远殷勤的柯尔佐夫表示要同我说机密话的样子。我明白他只能告诉我，他认为告诉我不碍事的事情，但他装作这个样子，使得他的信任能获取我的欢心。对于你，我是没有什么隐藏的那种态度，他开始说：

“你想象不到我们每一步遇到的那些希奇古怪的问题；我们必须发明一些新办法来解决那些问题。你试想想，那些最优秀的工人，那些斯达哈诺夫运动者，一大批一大批地逃开工厂……”

“你们怎么解释这个呢？”

“哦！这是很简单的。他们得到很大的工钱，即使他们想花也是没有办法花费掉；因为市场上还只有很少的东西买得到。这个正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于是他们积蓄起来，到了有几千个卢布时候，他们就结伴到我们的里维拉过快活的阔绰的生活去了。我们挽留不住。既然是优秀工人，他们知道人家一定要再用他们的。他们回来了，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之后，……总之到了他们囊空时候。人家非再安插他们不可，因为离不了他们。”

“如此，你们就难于处置了。他们人数很多么？”

“几千几万的。你知道，每个工人有权利休假，假期费用由公家支付的。这种休假，人家于适当时期容许他们，而且不是做一次容许他们，因为不用说，怕妨害工厂工作。但这里就完全不同了。这里，付钱的是他们，如此得到的假期，可以随他们的便，爱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而且大家一齐去。”

他温和地笑着。我不说出来，但心里仍在想：倘若这恶现象是严重的，他说时一定不是这个态度。但这是为的接着恭维斯大林的一种巧妙的新发明。他不是想出提倡妇女艳妆，敷脂涂粉和戴首饰么？^①

“去吧，同志们，去照顾你们的太太吧！把她们装扮起来吧！为她们耗费你们的钱吧！”

近来开了好多新商店；而这也使我惊异不小，即是开了好多

^①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真理报》发表集体农场分子的信，关于服装问题的。信内说“我们也能够穿得漂亮些，因为我们有爱美观念，我们要学时髦。至于我，那我不喜欢钟样的裙和飞机式的短衣。但因没有新的样式，我们只好穿这类衣服。我们是有钱的。”

修指甲店，而且各方面（不用说，主要的是在得意的一方面）遇到了染红指甲的女人。

*

“你每月薪水多少？”女同志 H 问一个主管 X 旅馆“美容所”的女人。

“一百五十卢布。”

“供宿的么？”

“不；也……不供膳。至少要付二十卢布房租。”

“那么你只剩一百三十卢布了。伙食呢？”

“哦！我非两百卢布不够吃饭的。”

“可是那么你怎么办呢？”

愁惨地微笑着：

“太太！……总有办法啊。”

*

耶夫在塞瓦斯托波尔，同一个大学生结交了友谊，这大学生并没有什么很值得注意的地方，但最使耶夫感兴趣的，恰正是因为他极像多数其他的学生。耶夫可以经过他知道一些事情，然后转过来告诉我们。

X 是现行制度之热烈的崇拜者。他满含信任和希望。他是大学第一年级学生，每月支领六十卢布。他很高兴想到明年可以支领七十卢布，后年可以支领八十卢布。他本可以住在学生宿舍里，那里每餐饭卖一个卢布或二个卢布；但他不愿离开他的老母亲，一个无技艺的厨娘，每月赚九十卢布。母子两人住在同一个房间内，每月共付十卢布房钱，他们差不多是只能买黑面包来吃的，而且不能吃饱（一天四百克）。但这是一种“完全的食

物”啊，他说；而他不发一个怨声。他深愿邀了一个女伴到这已经住两个人的房间里住。他的母亲要他邀来，要他结婚。然而取缔堕胎的新法律使他恐怖。

“你试想想，我们已经很难得生活了。要养一个孩子，那就更加……哦！我知道你要告诉我什么话。但那些避孕的东西是找不到的，即有，质料也很坏，不能信赖。至于防备受孕方法，则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之内是不容易做到的。”

以后他的乐观又占据上风了，他快快活活做结论说：他吃得那么坏，宁可节欲好些。

倘若那边某医生的话是可信的，那么苏联是手淫最普遍流行的国家。

*

新建筑计划在研究之中。建筑师 N 提出一些房屋图案。

“这个地方做什么用场？”

“给娘姨住的房间。”

“娘姨？……可是你知道，我们已经没有娘姨了。”

既然理论上已经没有了娘姨，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叫娘姨住在走廊里或厨房里或无论什么地方。

预见一个给娘姨睡的房间，这是何等老实的供认！在苏联，倘若仍有婢仆存在的话，则做婢仆的人更该倒霉的。

在莫斯科，为得每月五十卢布工钱找娘姨做的，差不多都是穷苦姑娘，从她们的乡村跑来，希望在城里、工厂或其他地方找到工作。她们暂时做娘姨以等待工作；这是候工的一种办法。我的朋友 H 的同楼邻居雇的娘姨是个孕妇，那邻居是大发慈悲才雇用她的。她睡在一间小房里，没有位置给她伸直睡。至于

饮食……

她时常来请求我的朋友：

“请太太莫把面包屑丢掉。”

她就在垃圾桶内捡面包屑吃。

*

说实在话，我绝不认为那些官方的判断，那种意见的制造，能得到每个人诚心同意。有些名字，尤其叶赛宁之名，只能低声说出来，然而还可以说出来。我应当说：还是有人称道的，然而低声称道。我很少知道叶赛宁的诗；但我就要叙述的那个小故事，使得我渴想去读它。叶赛宁自杀了，同马雅可夫斯基一个样。为了恋爱，——人们说。也许。随我们的意去想象更深刻的自杀原因吧。

某天晚上，在索契，一顿很好的晚餐之后，我们都倾心相向。葡萄酒和烧酒亦有相当助力。X 喝得尤其多，他动了诗兴。我们的向导表示有点不放心。X 要饶舌了……他竟至于宣布要诵叶赛宁的诗给我们听！向导立刻干涉他：

“你醉得糊涂了。你不晓得说的什么话。莫作声吧。……”

于是 X，很自觉地，虽然醉仍能自持，便暂时不作声了；然后利用这醉态，请那位向导出去替他弄一包香烟。向导一走之后，X 便开始诵一篇非凡的诗，这诗自从被禁止印刷以后，便由人们口头传诵起来。叶赛宁写这篇诗，是为回答一篇谩骂宗教的论文而发的。

叶赛宁在这诗中大意是对这论文的著者说：你若反对教皇，我们一定赞成你；我们同你在一起，当你嘲笑天堂和地狱，圣童贞和好上帝；可是你若说起耶稣，那就应该当心，你不应当忘记：这

为人类而牺牲者并非结合尘世间的大人，而是与那些贫穷的和卑贱的同盟，他认为人家称他神子，不如称他做“人子”那般光荣。^①

X 声音颤抖了，当他朗诵这篇诗的时候，以后他的面孔流满了眼泪，——这不仅由于酒醉之故。这晚上我们本只说些不相干的话。然而不然；写这句话时，我觉得对不起 X，也对不起我们自己。X 渐渐地使我们兴奋起来，我们听他叙述他在中国奇异的冒险，他的屡次被捕以及他的逃脱等，不觉神往。不能说他是美丽的，但有一种狂野的精神使他勃勃有生气；他的声音本是既嘶哑而又热烈的，可是当他给我们诵诗的时候，忽然异常温和起来，同刚才说话时那种犬儒主义和粗暴成为最奇特的对照。好像他要人家发现他身上有秘密的温柔区域，一种未为人知的区域；忽然我觉得：那是最真实的，而其余一切，犬儒主义和粗暴，在我眼中不过是一种假相，来保护着他身中最好的事物罢了。这个景象不过露了一瞬间。向导回到我们身边来了，谈话又恢复了原来状态，喧闹的，而又空洞的。

面对面在一个坚硬的车厢内坐了七个钟头长久，那位俄国青年才肯同我的女友 H 同志说话；H 告诉我，这青年从旅行开始就引起她的注意和同情了。

他年纪不过三十岁，但看来已经为生活磨折得很衰老了。我用了何种力量才能使他不至敷衍回答我的问话，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我留心告诉他，我不过是一个外国女

^① 我曾请求几位能读俄文的朋友替我找叶赛宁这篇诗，无疑我上面所录的是很不完全的。他们找不到；于是我怀疑，最近几版官印的著作中，人家也许没有把它删去。这是可以考查出来的。此外，有人告诉我：流行了好多诗篇，假冒是叶赛宁所做的。

人，他丝毫不用怕我，无论他说什么话我不会去报告的。……他的妻同他在一起，他们还带了一个三岁的儿子。我听到他还丢了两个小孩在X地方，为的节省开销并恐怕在莫斯科不一定能找到事情做。

他的妻以前一定是好看的，此时好像大病后痊愈的一样。使我大惊讶的，即是看她几次喂小孩子奶，这小孩早就应当断奶了。那奶悬垂着，像空心的皮袋，我不知道小孩子能够吮出什么东西来，但在整个行程中小孩子并没有得到其他的食物。他的父母似乎比他更加饥饿。当男人终于开始说话的时候，那个年轻女人就流露一种说不出的忧虑。她东张西望，看邻近旅客能否偷听去。但我们的房间内只有一个在睡觉的老醉鬼和一个蠢笨的乡下女人。好像道歉一样：

“他总是爱饶舌的，”她对我说，“总是因此害了我们。”

于是男人告诉我他们的生活：基洛夫暗杀案发生以前一切都是很好的。以后，他不知道，什么人告他，使他蒙了嫌疑。他既然是个优秀工人，而又无疵可指的，人家没有立刻将他辞退他所做工的工厂。但他看见，他的伙伴们，他的朋友们，渐渐疏远他了。每个人同他说话时候都害怕受他连累。最后工厂经理叫他去，并非辞退他，因为没有理由，而是“劝告”他到别地方找工作去。从这天起，他就流浪了，从这工厂到那工厂，从这城市到那城市，渐渐地更被猜忌，更受驱逐，到处都被人怀疑，拒绝，排斥，不得任何扶助，任何救济，更加得不到什么东西给他的孩子们，而陷于极端贫困之中。

“你看，这样的生活过了一年多了，”女人说，“我们再支持不下去了。自从一年多以来，无论到什么地方，人家从未曾容留我们到十五天以上的。”

“即使，”男人再说，“我能知道人家控告我的罪名也好。一定有人说了反对我的话。我不知道是谁。我不知道他能说什么话。我只晓得一件事情，就是：人们找不到我的错处的。”

于是他向我解释他到莫斯科的用意：为的请求调查，洗刷嫌疑，倘若这些可能办到；否则，在抗议这无理由的猜疑之中索性完全断送自己的命运。

*

有种香烟每包卖八十戈比，甚至六十戈比；这就是所谓“无产阶级烟”，不堪入口的。我们抽的香烟，——外国人只知道有这一类，其中有几种被称为“旅客烟”——则每盒二十枝值五个或六个卢布。还有更贵的哩。

不知道卖烟商人在那里（在戈里地方，我们在那里停了几个钟头），彼尔·赫巴便请求那与他在河边谈话的工人替他去买一盒这类香烟。

“多少钱的？”

“五个卢布的。”

那工人非常幽默地笑起来，说道：

“一天的工资啊。”

*

X太太在莫斯科郊外游玩，一位“负责人”（那边对当权者的称呼）和她做伴。这“负责人”遇着所有的工人总是表示非常亲

切：“我喜欢他们能感觉是与我平等的。我同他们谈话，好像对朋友，对兄弟一个样；而他们从来不害怕同我说话的。”

路上遇着一个填土工人；为证明刚才说的话起见，这“负责人”便说：

“好么，我的朋友？你好么？你快活么？”

于是工人说：

“同志，你容许我问你一个问题么？”

“问罢，我的朋友，我很情愿回答你的。”

“你是知道很多事情的，你一定能够指教我。我们何时才能按照我们的力量做工，尽着我们的肚皮吃饭呢？”

“这‘负责人’怎么回答呢？”我问 X 太太。

“他给工人做了一次理论讲演。”

*

坐汽车到巴顿去的路上。我的旅伴们赞美公路两旁新植的树，这些树几年之后将能遮荫路面。我为什么要提醒他们，所有这些树当中没有一株不是死的呢？无疑是在不合适的时期植下的；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不利于树的生长的季节；我猜想是本着服从上头下来的一个命令，必须遵照实行而不许批评。这是要自然界来屈服的，不管是树，是人。

*

这里（在苏呼米），人们养了好多猴子，为各种试验之用的。我要知道这些动物的来源。但这里同在殖民地一样，关于一事的说法有种种不同而且是互相矛盾的。大多数人以笼统浮泛为满足，尤其是那位替我们当翻译和向导的可爱的女同志。总之没有什么事情能为难她的，她回答一切的问题；她愈加无知，回

答的口气愈加坚决。但她不知道自己无知，她使得我明白这点，即：不自知的无知造成了确定的表示。这类人的精神装满了“差不多”，“类似”以及错误的知识……

“可以知道这里养的那些猴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么？”

“自然。那是最容易的事情。”

（她于是转问那陪伴我们的人）

“这些猴子大部分是生在这里的。不错，差不多都是生在这里的。”

“但据人家告诉我们的话，这地方并不出产猴子。一定是先从别处弄来的。”

“自然。”

“那么究竟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呢？”

没有转问别人，她就迅速而果决回答道：

“差不多是从各地方弄来的。”

我们这位女向导是可爱而又十分尽职的。但这个有点令人讨厌，即她指教我们的话，除了都是错误以外，没有一件说出所以然的。

*

——回归巴黎

“他妈的，你从何处见出这些当权大人物享有特权？”那位 C 对我说，他从那边回来，完全被迷惑了。“我同 K 往来很密切，他是如此可爱又如此朴质；他叫我去访他的住宅，里面我没有见到什么奢侈阔绰的东西。他的妻，他给我介绍了，也是可爱而朴质同他一样……”

“哪一个妻？”

“什么？哪一个妻？他的妻，总之……”

“哦，不错，他的正妻。……你不知道他有三个老婆。还有两个别的住宅，至于乡居休养之便利还不算在内。他有三辆汽车，你所见的是最朴质的一辆，为平常家务用的……”

“这是可能的么？”

“不仅是可能的，这是事实。”

“可是，党怎么能容许呢？斯大林怎么……”

“你不要如此天真。斯大林所害怕的，乃是那些纯洁的人，那些瘦子。”

书信与凭证

给 A.G., 尼斯“苏联之友协会”副书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先生，亲爱的同志：

我很感谢你寄给我的东西。人家的确通知过我，而且允许给我彼尔·亚历山德里在尼斯的讲演稿；但直至今今，我什么都未曾收到。现在我读这讲演稿带着很浓厚的兴味，虽然其中没有一点出我意外。所用的论据，所引的数字，没有一件是我所不知道的。这些数字，我固然难于辩驳，正如我难于毫无不信任心而接受之一样。我希望这些数字是始终正确的，我也全心祷祝彼尔·亚历山德里的话有道理。这就使得我陷于不愉快的地位来同他辩论。我感谢他能明白：我无论如何终是苏联友人，而我的忧愤是很难受的。不错，我愿意我是误会了，在这我不得不做的难堪的反证里头，这种反证恰同瓦尔脱·西特令爵士，工党大

领袖，所做的一个样。^① 我认为他有资格来审查彼尔·亚历山德里不加考虑接受来的那些统计数字是否正确。西特令也是钦佩那边人们的努力和多量成绩的；他也认为由于内外环境关系苏联也许不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但他所气愤的乃是人们距离成功还远得很，——他咒诅一种夸张和虚诞的宣传。“那些不利于你们的统计，你们就删去了，”他对他的向导说，“那些不足以证明你们的人民生活比其他一切国家都更幸福的统计，也是如此。苏联人民的生活状况究竟是怎样呢？若非亲身去非常细心地调查一下，就没有可能知道的……”

彼尔·亚历山德里的批评是最客气的，他的显然的诚意使得我告诉他：我也许是比我的书中敢于发表的知道得更多、更正确（由于切实的原因不能发表的）。首先，我不是一个人旅行的；五个旅伴之中只有两个人于第一个月旅行之后离开了我——大家出发时都是同我一般热烈的——；有二个俄国话说得很好，第三个则刚在莫斯科生活和工作过六个月，在这期间他能够看见并了解好多事情。这几位旅伴个人的见闻，不断地与我自己亲历的相符合；若是没有他们，尤其没有那位在莫斯科生活过六个月的人的精明，则我无疑差不多不知道一点那隐藏在迷人外表下的东西，而我从苏联归来也一定要同着亚历山德里合唱赞美歌了。反之，我也不能相信，倘若亚历山德里，以他所透露的完全的诚意，见过，听过和惊讶过我所能见，所能了解的一切事情，而不会变成同我现在一样。我所能征引来作证的那几件事实，绝不是什么孤独的，特殊的，例外的，如亚历山德里所说；我征引这

^① 见他的《我在苏联探求真理》。

些事实，只因为那是可为典型的，可为代表的。我还可以举出好多其他的事实。只因恐怕连累了那些告知我的人，我才不请他们出来作证。

苏联状况无论如何不如人意，如何糟糕，我一定会默而不言的，只须我至少能确信那边是向着更好的情况走去。正因为我不幸深信苏联是在梯子上一级一级下来，而非如我们所期望的一级一级上去，它一个个抛弃了大革命辛辛苦苦得来的利益（我承认总是有很好的理由，或至少有似是而非的理由抛弃这些的），正因为我害怕看见它拖带法国共产党走向那不可挽救的错误去，——所以我认为我有不得而言之责任。

你若认识彼尔·亚历山德里，就请告诉他，我如何感谢他的批评的完全客气的态度。再说一遍：我祷祝他的话是有道理的。

*

在顾维位尔，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日

我的亲爱的 X：

去年我曾在波林那奇住过十天，下过矿，混在工人尤其失业者群中。里尔地方，你的伙伴们的困苦是不会更甚于他们的。相信苏联，这并不能使这种困苦减轻难忍的程度。你将说：这至少给他们一点希望。那么天堂生活以及来世报偿的希望还好些哩。

在我的书中，我太注重于“文化价值”之损失了。一个民族正在挨饿受冻时候，人们首先设法要保存的就不是“文化价值”了。我也同意，在一段长期间内，若是民众的物质状况能有更好保障时候，“文化价值”也不妨损失下去。可是，在苏联，这两方面都要损失的，而这是可怕的。

这是可怕的，看见革命千辛万苦得来的利益，一个个被抛弃

了。此时正是应当睁开眼睛的时候了，来看这悲惨的破产，我们的希望有在其中熄灭的危险。此时重要的是不叫我们被拖带进去。照苏联现在这样进行下去，则资本主义制度下最受我们指责的东西，不久就要恢复起来了。工资差异愈变愈大，社会阶级重新形成，官僚分子得到胜利。再说一遍：我同意那边的精神不妨同在德国和意大利那般不自由，只要至少群众的生活舒适是有保证的；然而我们离此还远得很哩。人们对我说：容忍现时状况吧；恶现象是暂时的；这是扶梯起头，是扶梯上的一级。然而这个扶梯，苏联并不是爬上去，而是走下来；不久，十月革命就要从头做起了。现在正是呼喊：“停住！”的时候了，正是警告的时候了。

*

在巴黎，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

先生们：

你们寄给我的集体书信，^① 可惜没有一点出我意料之外。

① 在巴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第七区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俱乐部用笺
致安德烈·纪德先生

先生：

细心读了你的新著《从苏联归来》之后，考虑过其中各种论据以及所谓凭证之后，我们现在向你表示我们的气愤和深刻的厌恶对于那种对苏联的阴险的攻击。

在这样一个愈加需要我们保卫苏联的时代，我们看见你的转向以及法西斯报纸上褒奖你的话，是十分恶心的。

我们有个时候希望过你会出来否认黎巴同志十一月十八日在幻城戏院青年大会上所宣布的话；不幸你未曾出来否认，于是我们可以做个结论说：你的书不过是一件好买卖罢了。

现在我们认为你不配做我们的名誉主席了。

我们感谢你于八个月之中给予过我们的援助；现在，先生，我们请你接受我们的敬礼！

但其中含有一种重大的侮辱，是我不能放过的。

为什么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到拿你们所说的什么“好买卖”去同苏联献给我的罕有的利益，丰富的金钱以及所有一切荣誉的事情，相比较比一下呢？

为什么你们献给我你们的团体的主席位置时候，是如此不认识我，以至于不知道这类顾虑是不可能打动我？

倘若我同意跟别人一起说诬语，那时你们就真有权利说起一件“好买卖”了！然而那时你们甚至没有想到来审查我是否诚实的。当我看见你们如此轻易地提出如此荒谬的控告时候，你们其他地方之见笑于人就不怎样使我惊异了。

你们的信是手写的，也许未曾留下底稿，现在我用打字机打了一份给你们，凭着你们的光明态度，请你们将这原信向你们那些尚未知道此信内容的同志公开宣读；我这封回信也请你们宣读。我不能相信你们当中没有几位同志肯看清楚这件事情，肯明白事物之真相。我不怀疑你们将有一天仍旧要信任我，而且更加尊敬我；现在同以前一样，我仍是你们的忠诚的朋友。

A. G.

*

彼尔·西志先生在一篇论文中猛烈攻击我，这论文很可以拿来同不久之前亨利·伯洛攻击我的那些文章相比。

我并不重视这类攻击，此次攻击，倘若不含有那我认为必须指出的事实错误之处，我也是要放过的。

西志先生在他的文章开头上叙述两件小故事，两件“实事实事”，他说，足以显示其人品性的。底下是第一件：

彼尔·路意士，我初从事文学时时常往来的友伴，约我在圣

苏比士广场相会。那时是冬天。冷得很怕人。在半点多钟内，我冒着雨，在泉水旁边呆等着，路意士则舒舒服服躲在一家店铺玻璃窗后看我挨冷以取乐。

西志先生叙述的故事本身是正确的，而且与我叙述的相符（见我的《倘若一粒麦子不死时》，第十章）。不过他，干脆地，毫不顾忌地，调换了人名：旁观的是我，挨冷的却是路意士，——不管情理如何不符，不管心理如何不合。但我不肯同西志先生一样，将这事情看作一种无聊行为。在我眼中看来，这只是而且只能是这无数的恶作剧中之一件，彼尔·路意士那时最会玩的，为的看看他能作弄我到什么程度。不是，西志先生，你信我的话：彼尔·路意士不是一个无聊的人。

底下是第二件“实事之实事”：

爱弥儿·魏发仑和他的朋友，威利·史洛巴赫、比利时画家，动身到布鲁塞尔郊外建筑师奥克塔夫·凡·黎塞伯格——画家的兄弟——家里吃饭去。魏发仑负责去购买车票，回来遇到查票时，他寻来寻去只寻到一张，他喊道：

“上帝在上，威利，我失掉你的车票了！”

这话，西志先生派做是我说的，他认为这是卑鄙的自私自利之表示，而其实当时是宣传人口的，而且成为魏发仑诸友说笑的资料。魏发仑是第一个笑这话，而且很高兴常常提起来说。但凡认识魏发仑的人，都明白他的慷慨是如何超出他的自利之上。不是，西志先生，你信我的话：魏发仑毫没有一点小家子气。

靠着这种张冠李戴手段，西志先生替我画了一幅肖像，我自然要认为与我不相像的。他的论文其余部分也是一样的无耻，这更加显得他的激昂了。他提起了“风化”问题。当我从刚果回

来时，波拿狄为破坏我的作证的信用，也是使用这个手段。但这里，我只能归咎我自己：我供给敌人以武器。倘若我悲叹一件事情，那就是：这类攻击之卑鄙，在文艺界中，将有使人不敢坦白说话之危险。西志先生用的是斯大林的方法：威吓真理。然而请他允许我告诉他一句话：这里，在他的侮辱当中，他仍然犯了一件大错误。但他很荣耀地告诉我们：他是看不起一切的。我却相信，他的读者当中一定有些人没有他那般傲慢。

在这无证据，无审查或无诚意（由他选一样吧）的论断面前，人们对于他的拥护莫斯科不祥的党狱之判决，是不以为怪的了。彼尔·西志先生自夸“不晓得什么叫做难为情的”；而他也证明了这个。

*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七日

我的亲爱的格贤诺：

在二月十三日《人道报》上，读到安德烈·吴谟则致你的信，我有如下几点意见：

吴谟则在那封信开头上引了你的论文中几句话，这论文名为《无益之死》，是你为最近莫斯科党狱而写的。你在里面说：“至于我们，则我们不愿做斯大林主义者，也不愿做托洛茨基主义者，这纯粹是属于俄国的事情。”请允许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你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迟早总要表示态度的。但我以为人们可以不赞成斯大林，却不因此立刻变成托洛茨基主义者。

以后吴谟则又从我的《从苏联归来》中摘录了几句话：“一个国家单独的错误也决不会败坏一种国际的大同的事业之真理。”我写这几句话，绝非如吴谟则所欲证明的，是反对革命事业；恰

好相反,这是为着救护革命利益,当斯大林的苏联放弃了这些利益时候,——这点现在我更加觉得有事实证明了,这点,凡有诚意而不肯更长久让人蒙蔽眼睛的人也一定即要承认的。我相信(而且必须坚持这一点):现在将革命事业和苏联联系在一起乃是极端危险的事;我再说一遍:苏联正在败坏革命的事业。

正因为揭破了这个败坏,托洛茨基才被人视为公敌(其实他不过是敌对斯大林的败坏革命罢了),且因之被人当做法西斯的,——这的确是太简单了。其实他比斯大林自身更加是法西斯的敌人,他正是以革命者和反法西斯者的资格来揭破斯大林的败坏革命的。可是你试拿这点向那被人蒙蔽眼睛的民众说明白吧!

我也不能赞成你这几句话:“似乎不能怀疑被告之犯罪。……这些人是有罪的。”倘若这话合乎事实,则无论这死刑执行如何使我厌恶,我仍是要说:斯大林消灭他们是对的。但所有这些亲供的真实价值,在我看来,是最成问题的。我请你读克列伯·列格这封信,关于那些指导西伯利亚卡美洛伏地方矿山工作的工程师和技工,被告怠工而受判罪的。他们也是“供认”了,而且互相控告,虽然所有在他们手下做工的工人和所有派去勘验地方的技工都证明他们无罪。

恶劣现象是如此深刻,使人迟疑不敢去认识。这是果子中心生虫,而果子皮面则还是很好看的。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在马德邻巴志

我很注意很热烈读过你的文章,关于辩护莫斯科法庭所判决的人,尤其是此时正在受审判的人。理由如下:

我刚从俄国回来，你知道的；在我们考察过程中，我们曾同很熟悉本案的人谈了几次话。

此时受审的被告中，有两个人，当我们在俄国时候曾听人说起起的。

这是两个副人民委员，一个属于重工业委员会的，一个属于农业委员会的。

十一月二十三日早晨，我们的翻译斯默林同志，到火车上我们的房间来，告诉我们如下的话：

法国同志们，我要读一张起诉书给你们听，登在《真理报》上，那是控告在西伯利亚卡美洛伏地方指导矿山工作的工程师和技工犯怠工罪的。他们于一九三五——三六年间在其指导下的矿井内积聚炭瓦斯，使之不断地爆发。所有被告在审问时候都承认他们的罪，互相控告，而且说他们为此工作与两位副人民委员发生关系。

第二天早晨到沙赫特时候，我们听说八个被告被判死刑了，当时心里很惊讶。

我们那时是五个人：维痕，法国矿工全国联合会书记；西诺，卡谟矿工工会书记；卜兰克，魏默斯矿工代表；季纳，共产党国会议员。我们同听翻译斯默林读报和解释。

我还清楚记得，我的朋友维痕，气愤起来，向斯默林呼喊说：“奇怪得很，你们的被告都自承而且互相控告那些最不可相信的事情！”

我们没有相信而且永不相信所控告之罪，我们也对斯默林说了。原因如下：

人们（工会负责人）切实告诉我们：有一种最严密的检查机

关存在，保护矿山安全。

这机关由如下人员组织之：

- 一、工程师一人，由人民委员会选任；
- 二、地方工会主席数人，由工人自己选任；
- 三、矿井代表及矿区代表数人，亦由工人自己选任。

这些代表似乎有完全权力。他们可以停止一个矿穴，一个矿区或一个工厂的工作，倘若认为那里有危险或仅有危险可能性的话。

我们不明白既然有这样的检查机关存在，那些工程师怎能安安稳稳准备下这种罪过呢，而且时间有一二年之久？

我是矿工，我完全熟悉矿山工作的困难，我做了三十年以上这个工作，其中十二年充当代表，在负责工人安全的检查机关，在法国最多炭瓦斯的一个矿穴内；我不相信无论如何精明的技工，能够有系统地准备使矿穴爆炸而不为劳动安全检查员所觉察，——即令这些检查员是最愚蠢的。

若是卡美洛伏矿山安全检查机关没有觉察到那事情，那这机关不是同谋便是不存在的。

它若是存在的，则它比其他被告更加有罪；既然莫斯科流行的是枪毙方法，则它第一个应当枪毙。

它若是不存在的，则人们关于保护工人安全的话就是欺骗我们。在此情形下，那些当权的人对于如此重大问题也来欺骗他们邀来的宾客，人们为什么还能容忍呢？

即使安全检查机关是不存在的，我仍旧要说：存心使矿穴爆炸而不为人所觉察是不可能的。

有工头，有监督，有几千工人在矿内工作，他们一定看得出

来。

那些知道自己生命有危险的人，难道会默而不言，只为得更加确定搜集被告犯罪证据么？——倘若有此危险，则他们随时都可以丧命的。

不，从技术观点看，所有的人都认为：以积聚炭瓦斯方法使矿穴常处于爆炸状态，是不可能的事。

最不熟悉矿山情形的人，也会同我们一起呼喊：无论如何不能叫我们相信这个可能性。

还有另一件事情使我们难解：斯默林告诉我们，卡美洛伏托拉斯经理，一九二八年那次有名的沙赫特矿山五十三个工程师被控案中——有十一个判处死刑——曾被同一个检察官起诉过。当年他被赦免了。知道他能够自愿地使千万人生命于危险，以后苏维埃政府又安插他在矿山托拉斯经理的位置！人们对此有何感想呢？

他在卡美洛伏又干这把戏，同德国工程师雪克林在一起，他又被赦免了。这是可能的么？

人们颤栗着想起了这件事也许是可能的。人们自问：为这个不祥的滑稽戏要付多少代价。

读过了你的文章，关于苏联几次党狱的，我如今写这些东西给你，我要说你做得对的，为真理利益而大声疾呼，而且继续大声疾呼。

我愿这类案件，每次都有独立的辩护人参加，替那些不幸的人说话，他们受人控告，受人枪毙，而舆论不大明白为的是什么。

我允许你利用我这封信去支持你的努力，为了人们所审判而太轻易枪毙的那些同志。

倘若你怀疑我的报告，那请你去问我的旅行同伴维痕、西诺和卜兰格，他们一定会肯定我所写的。

我不说起第五个旅伴，他不能反对目前当权的那些莫斯科偶像，这些偶像也许明天也要被人枪毙的。

因为，谁晓得呢，照这情形下去，俄国革命的最优秀分子不会自相残杀同归于尽！

同志，请你接受我的最好的工会的敬礼。

克列伯·列格

全国矿工联合会副书记

（发表于二月二十五日《工会报》）

克列伯·列格宣言（发表于巴德加勒《启明报》，转载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时报》）

我写过文章，说俄国妇女所做的那一类工作，在我看来，丝毫不是我们在法国所要的社会主义的。我不怕有人来否认俄国妇女专从事于这类工作。

好像是我说谎，好像我在毁谤俄国革命。

在卡尔文，虽然我起初拒绝，人们仍迫我说出我所见的。我说过的话原文如下：

“俄国工人现在地位，比起革命以前进步得多。”

我说过，俄国矿山工作方法——我曾举出两例，并加以称赞——我们的矿工是不肯接受的，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有最好的方法。于是我又被告毁谤俄国革命和信口胡说了。我们生活在这个愁惨的时代，真话遭人唾骂，谎言则受人尊崇。各地矿工中共产党同志都起来抗议我所说的真话。是一个口令么？我公开

说,我开始疑惑这个,而这绝不会使我惊讶的,因为在某些方面,人们并不忘记我在工会组织中占据一个负责任的位置。

是的,人们在俄国做了些好的事情;是的,人们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是的,人们在那里建设俄国式社会主义;不,法国工人,在其劳动,安全,生活,自由及文化条件,并不逊于俄国工人,恰好相反,是好些,我要说:好得多。

*

戴尼叶医生用笺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

先生:

高尔基下葬那日我正在莫斯科,我听到了你的演说,我很难过,因为我知道你是诚实的,我害怕你在此居留期间只成了一种长久的骗局。我刚读了《从苏联归来》,于是松了一口气。我到俄国去研究某些生物物理学问题,我自由地同那边同道们生活在一起,没有官厅和翻译的干预,我同他们心心相印,——而我感觉痛苦了。你说得很好:非附和主义者是被排出生活之外的。我的所有的同道,那些“肚子内有汁”的,都将思想和著作隐藏起来,一举一动也须不断地受抑制。我的有自由观念的朋友,有些是医生,有些是著名教授,都被迫而有两种人格:外表的,人家看得见的,说话的,表示出来的,这是一种;其他的,则他们深藏起来,非过几天亲密的生活之后不肯显示于人。

请接受我的敬礼。

戴尼叶

摘录一九三六年十月在医科大学的一篇演说
在苏联谁能做医生呢?工作后来随班听讲的工人或每月领

一百十个卢布的学生。他们住在十卢布至十五卢布租金的房子内。

人家随着考试成绩如何或增或减他们的津贴。大学毕业之后，他们被派到乡村去，当医生助手或看护。现在大约有十万个医生，此时需要有四十万个。

直到两年以前，医生每月只能收入一百十个卢布，这个数目是不够的，所以有些医生宁愿去做技术工人，收入可以比较多些。那时要找人做医生是很困难的，妇女尤占多数。于是人们看到，医生在计划中虽然没有出息，却是国家所需要的，于是增加工资为四百卢布。以后人们又提高研究人员的报酬，医生助手的报酬。

……一九三〇、一九三一、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各年毕业的医生，知识都不够；他们被迫回大学来补习六个月。

……这个工作时间好像是很有利的，但我刚才所说的乃是理论，因为做了六个钟头的人是很罕有的。普通工资不过四百卢布，不够生活，一个医生做两种或三种职务，为的能得八百至一千二百卢布，因为必须注意到卢布的购买力：一件很普通的衣服值八百卢布；好的鞋子，二百至三百卢布；一公斤面包，一卢布九十；一公尺布一百卢布；此外直至一九三六年，每年必须拿一个月工资去购买公债；医生和他的家庭共住的一间房子，同时做饭厅、寝室、书斋、厨房等等用的，每月须缴五十卢布租金。他若没有小孩，还是幸福的。

那边同道们的物质条件是很困苦的，但最难忍的还是精神上的压迫。他要留心他的看门人，那是格别乌的密探，他不能将他整个思想告诉他的医院同事。大战时，我们法国张贴的标语：

“莫做声，你要当心，敌人的耳朵在听你们！”在那边是实实在在的情形。

……某同道，科学院院士，刚坐了两年牢；人们对外国人说：他生病了。另一位被剥夺了讲座和实验室，因为他曾发表一种科学意见，不合于共产主义理论，他被迫写一份公开的悔过书，同伽里略一样，为的免被充军。为什么我没有看见那位我应会面的有自由观念的同道呢？我的电报直到我过后一个月才到他手；我去看他时候，人家对我说他不在，其实他在那里。

*

在巴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先生：

当我在索契瞥见你时，我很害怕你受了欺骗，一种党派精神——进步之最可怕的敌人——会使你去赞美苏联新政；所以你的《从苏联归来》给了我一种真正的快乐。

我很能说俄国话，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你所见所闻的事情，我完全承认你所说的，而且感谢你敢于说出来。

为表示我的微不足道的谢意，请你允许我寄给你我在那边所得的若干感想。

望上帝保佑我们法国能均衡而明达地走它的新路！

X

这是第三次，隔了三年时间，我又到俄国来。

由于低层及其野蛮性的侵占，这制度一开始就让艺术、文化、感情受人糟蹋。

这是蛮族侵略之近代形式。

革命之后二十年了，仍旧有二等车和三等车。在最近建筑的一只俄国大轮船上，旅客之比例：三等占百分之七十五，二等占百分之二十，头等占百分之五。饮食、衣服、旅馆，也是这样。能付钱的人，就享受最好的位置。

工人每六日中有五日共做四十小时工作，一年之中有五个休假日，正式每年比法国工人多做四百个小时工作，法国工人每星期做四十个小时。但工资是如此之少，迫得工人每天做一天半或两天的工作，即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做十二个小时至十六个小时的工作。

计件工作制比前更加盛行。有能力做此工作的人所得比同伙更多，同伙因为较不灵巧而欣羡他。

没有工作可做的时候，工人便闲着，而且拿不到工资。国家是没有感情的，有工作就交给工人做，工人应当做得快而且好，没有工作就让工人自寻出路，做别的事情，免致饿死。

小气，嫉妒，到处仍是一样的。小心伶俐的工人叫做“乌达尼克”（突击队员），赚得比伙伴更多，他们的不扣工资的假期可以达到一个月，他人只有两星期。

努力的人一般是受人抬举，得到报偿，但优遇亲信风气仍是盛行的，有好多微贱的有本事的人，离中枢目光远的，则仍完全不为人所知。

有些狡猾的、有野心的、很聪明的，或有亲戚奥援的，则能够造成享有非分特权的地位。每月工资在一百五十卢布至五千卢布中间。有些人比这少得多，有些人比这还多得多。

做了二十五年手工艺工作之后，到六十五岁，工人每月可得三十七卢布养老金。

那些以前不能或不知储蓄的人，此时不愿成为儿女的负担，就继续做工：这样的人占最大多数。

国家复兴期间，造成一种努力，可以同我们战后情形相比；但努力，尤其在俄国，并不一定含有舒适或富足之意。

额外钟点到处都有，因为一切货物是贵到令人难以相信。

至于大小工头，则他们奉到命令，于指定时间内做完某种工作。底下的工人或雇员若努力不够，则剩余工作应归工头包办，他们必要时每日须做十八个钟头工作，因为他们负有工人待遇及工作成绩之全责。

这不是容易的事情，他们的夹在中央政权和工人疏忽中间之地位有时是很难应付的。

经过三次预先警告之后，任何工人都可随时开除，无须赔偿损失，亦不用先期关照。

我参观过的一个工厂内，有一张布告通知工人：从九月一日起，凡不能生产规定的件数者，将毫不通融地被开除。

大小工头虽然多做了工，他们的工资仍是照旧。但他们可以希望得到双倍的休假期间以及一种奖励金。这是常有的，但这不是国家的应尽之职，而是随人高兴的。

国家财政困难时就增加捐税，那是用扣除工资方法直接征收而不能规避的，或者强迫购买公债，也是用那个方法。

为赔补一般费用，国家就抬高货价。最普通的绸缎，一米卖一百六十五法郎。对于这方面新发迹的商人，那些虚费财富的人，则没有人敢抱怨一声。

八月八日政府颁布一个命令，说要扣除工资以援助西班牙之反法西斯斗争。这是国家的权利，没有人敢说话。至于个人

预算上有亏空，则无人来过问。

反一方面，国家设立学校，工厂，医院，托儿所，疗养院，非常美好的休息机关，为某些工人休假时之用。国家以死刑或充军严厉禁止盗窃和犯罪，维持风化，鼓励生育，到处取缔卖淫，普及教育至于前所未知程度，俄国人民现在有百分之八十穿鞋子，而帝制时代则有百分之八十赤足的。

出版自由却是完全禁止了。普通刑事案在报纸上得不到地位登载。反之，政治案件之审判则连篇累牍，而且登了好多日，公众意见是随人操纵的。

政府伟人，航空家，科学家，政治家，一点点事业，能占报纸篇幅几星期之久。这是一种催眠术，斯大林是他们的神。

群众所得利益足够补偿一九一七年流血辛苦么？虽然有好多进步，到处可看见很好的努力，但造成了什么真实的平等呢？

到处已有新的差等，代替旧的差等了。这种代替一步一步来的，没有停息，正如这一波浪代替那一浪波那样的势所必至的。

我敢打赌，不到十年，所有旧时社会差异都将重新出现了。

*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

亲爱的纪德先生：

我刚才读完了《从苏联归来》。我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基洛夫暗杀案发生之后，在大压迫的印象底下，从那边归来的。自从归来以后，我都留心关于苏维埃俄罗斯的一切新消息。几星期前读过维多·绥奇致你的信，读过伊雅楚·西仑在莫斯科的信，现在又读着你的书，我是幸福的，虽然一面心里难过。我是幸福的，因为你的书又一次给我证明了那条我认为做生命意识基础

的根本原则，即：真理只有一个。我本是共产主义战士，苏维埃公务员，在苏联做了三年以上工作，在出版方面，在宣传机关方面，在工厂检查方面，——我经过了严酷的内部斗争，经过了有生以来最猛烈的冲突以后，终于得到与你相同的结论，你却是出身于另一个国家，另一个环境的；同我们在一起，还有维多·绥奇哩，还有西仑哩，还有那部分不肯接受你书中所说的“附和主义”的人哩。

我的关于苏联的著作也许能使你感到兴趣。我连这信寄给你我的小书《欧洲之再发现》和我的小册子《莫斯科党狱》。他方面，我请出版我的书的苏黎世“瑞士之钟”书店寄给你以前出版的拙著：《与苏维埃俄罗斯告别》。

请允许我问你一个问题，这问题不断地缠住我。这是你的书的末段：因苏联发生可悲叹之事，有使革命事业为之负责之危险。这危险我认为是很大的，因为苏维埃宣传机关没有你所要求的那种勇气来停止玩弄字眼（见第六十七页），来承认：“革命精神已不合时宜”。但因缺少这种态度，好多诚实的革命分子仍继续将苏联和社会主义，将斯大林政策和一种更合理的社会制度之基础混为一谈。这个错误，我应当说，将麻痹、将摧毁人类进步的最好的力量。怎么办才能帮助避免这悲惨的结果呢？

我不知道你的态度如何，关于最近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案件，关于大批的枪决，关于整千整万“反革命分子”关在白海、西伯利亚和土耳其斯坦集中营里的问题。那里除了俄国同志之外，还关着外国同志，还关着“自卫团”分子，他们两年之前在奥塔克冷防御物上为更好的未来时代而奋斗；那里关着一些曾在彼得堡炮垒内涅瓦河水面下坐牢的人。在苏维埃监狱中有

成奇廖三，她的丈夫(何等有意义而可悲痛的巧合!)死在希特勒的集中营内。那里关着——也许已经死了，也许是活着的死尸——不仅我的好多的朋友，而且好多的革命家，各派社会党和共产党，各派知名的进步分子。

但舆论，“人道意识”，似乎已不存在了。这次复演莫斯科党狱的悲剧，诺沃西比尔斯克党狱，得到何等微弱的应声！六个人被枪毙了，经过二个钟头审判，没有其他的证人，只凭被告口供做证据。

死了的人，救不活来。但人们可以阻止其他的人如此死去，可以使那些还在冰海滨、西伯利亚无限荒原上，格别乌有名地窖中，有一丝气息的人活转来。

至于我，我是尽我的力量奋斗的。但我的力量有限，我的呼号只能达到少数人耳朵，不能够冲破监狱的墙壁。

但是你，人家认识你。那些假借人类最伟大观念之名来行此悲惨罪过的人，一定不敢漠视你发出的呼声的。

人家将奥谢茨基、希特勒压迫下的牺牲者，解救出来了。

请你帮助解救斯大林压迫下的牺牲者罢！

允许我握你的手。

鲁朵尔夫

*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

先生：

我刚带着感激的心情读完了你在《星期五》上发表的著作，现在冒昧写信给你。你是应得那些人感谢的，在他们看来，革命首先就是社会正义和一切人类的尊严。我知道，作家们涉足于

这未知世界(革命乃是他们未知的世界),是如何难于敢继续注视真理,敢高声宣布他们所见到的真理。但我也知道,“要始终一贯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个志愿只靠完全诚实,才能真正满足的。这种诚实,纪德先生,决不会妨害工人事业的,能妨害的是那些审慎,那些姑息。

我重读你的著作,我想无疑你现在明白了那些人感到何等的痛苦,他们自始就拥护十月革命,他们感激十月革命,因为它是他们的反战斗争之继续,他们把所有的能力贡献给它,他们又看见它渐渐地(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是从列宁死后就开始了)受了旧世界的传染,而且为图久长之故,也许败坏了它的真正的存在理由……

马塞尔·马丁纳

*

在巴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可否批评苏联?——对这问题,我回答:可以的。

应当分析俄国革命经验,必要时批评它,——列宁曾经这样要求过他国的共产主义者。但是在什么时候呢?一个共产主义者不能拒绝分析现实,拒绝就是否认马克思主义了。共产主义者正因为是代表工人运动的未来,所以没有权利借口怕无产阶级灰心,而将一种革命经验之错误掩藏起来。恰好相反,他们的义务,他们的责任,正在于分析俄国革命所遵循的道路;尤其在法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成熟,使得工人们可以明了是人家做错了,而不是人家有意欺骗他们。这个分析将证明社会主义并没有实现于苏联,但也将显示俄国革命斗争,成绩及其条件,对于无产阶级未来斗争是极可宝贵的教训和鼓励。这种态度并非替

资产阶级变把戏，乃是使无产阶级意识明了，使它的斗争革命性质加强，同时消除危险的幻想并防止虚夸的乐观。

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比较起来，苏联经济代表一种巨大的进步。但不应当忽略了其中资本主义萌芽：自由市场和差异工资及因之而起的一切效果。

潜

纪德答爱伦堡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的巴黎的一种周刊：La Flèche《箭》上，载有安德烈·纪德答复苏联名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对他攻击的一个声明；因其内容相当有趣，我们将它译出，附在纪德《答客难》的后面。——译者

十一月三日的苏联《消息报》上，载有伊利亚·爱伦堡的一篇文章，上面记着十一月一日的日子，波尔多的地名。一位懂俄文的朋友，替我翻译出下面这一段：

恐怖开始了。我见一个矿工，在十月二十二日那一天，打吉庄逃出来，这时吉庄业已被法西斯军队占领了。他告诉我说：在头一个晚上，法西斯们在劳伦佐广场上枪毙了一百八十名工人，十六个妇女。这还不过是开始罢了，所有的民军，成万的阿斯吐拉人，都有死的危险。

这儿，我一定要表示我为有一个人所感受到的羞耻。正当法西斯们枪杀阿斯吐拉妇女的那一天，在法国的刊物上登载着一则反对非正义的“抗议”。这抗议有以下一些作

家的签名：安德烈·纪德，杜哈美尔，罗哲·马丁·杜·喀特，毛略克，与保罗·立威教授。不过这班人所抗议的并不是阿斯吐拉的屠夫，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这政府对于阿斯吐拉濒死的人们，拒放一汽轮，一渡船，甚至一小艇以济之的。不是，这班软心肠作家们所抗议的却是西班牙共和国的政府，因为它敢于逮捕法西斯党徒与马克思主义联合党的挑拨离间者。我且不谈毛略克，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一位具有右派观点的人。但他对于法西斯党人在巴士克所实行的残暴行为，在右派报纸上，曾勇敢地高呼他反对的声浪。但在我们的眼前却见有安德烈·纪德，他高举了拳头，对成千个天真的工人嗤笑。我听得了他的声音。（一年前他对我说过。）“我老是想到西班牙共和派的人；这使我觉醒。”不过这是叫人讨厌而且可怜的。无论如何，这些自由思想的杜哈美尔们，与那“极端共产主义者”纪德之流，总还是与他们的阶级一体的。统治阶级固然也逼害他们，污损他们。而他们在有时，也会克服了自己的懦怯，举起他们的小拳；但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办，只为了在日后可以用他们那人道主义的伪装，再度匍伏于屠夫的足下。昨天，在阿斯吐拉屠夫们的机关报 *Diario de Navarra* 上转载了这位摩洛哥兵与黑衫军的新同伴，这个恶毒的老人，这个黑良心的叛徒，这个莫斯科的啜泣者——安德烈·纪德的“抗议”。

从法西斯营垒中出来的侮辱，我认为是一种荣耀。至于那过去同志所给我的侮辱（尤其是约瑞·盘加朋的），开始使我极其痛苦。但当这些侮辱超过了某种无耻的程度时，我也就无动于衷了。这些侮辱改变不了我的感情，也不能使我成为那些侮辱

我的人们之敌人，这难道还需说明么？每当恐怖横行之时，人们常能有权假定：人之所以要侮辱人，为的要保护他自己，那末这些侮辱自然失却了一切价值。

爱伦堡因见我对于“摩洛哥兵”的弃绝正义，残暴与惨酷，对于佛朗哥营中更甚的暴行，不表反对，却向共和派方面提出抗议，所以惊骇，愤怒。这是真的：虽然我对于这些暴行，怀着多么深刻与悲痛的愤慨，可是我总觉得：像我这个与佛朗哥誓不两立的敌人，向他提出呈文，那是没有用的；佛朗哥方面所发生的非正义的事情，只能使我心硬，可是在我们这方面如果也发生了这种事情，那就叫我心痛。我之参加于反法西斯的事业，因为是太彻底了，所以一切能污损我眼睛的事物，都能忍受而无怨。惟在实行上，假使我们这方面也应用那为我们所深恶痛疾的法西斯式的行动，我认为是最有害的，我们不得不表示抗议。爱伦堡所说及的“抗议”，乃当马克思主义联合党诸领袖被审判的时候，杜哈美尔、毛略克、罗哲·马丁·杜·喀特、保罗·立威与我向西西班牙的共和国政府提出的，请求立即尊重被告们的辩护权。抗议表示我们对那政府存着尊敬。这样的一种文件，我个人是从不曾梦想过可以送致佛朗哥的。不过现在，最真实的感情，已被报章杂志扭曲到这种程度，即：那些因热爱共和国与无产阶级事业，而不愿它受到污损的人们，却被称为共和国与无产者解放事业的敌人了。